

2935  
2nd set

(LCS)

# 歷史教學

23 APR 1958

4

6  
APR 1958

1958

# 世界歷史參考圖片(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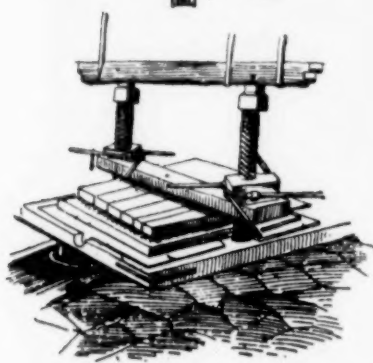
## 中世紀歐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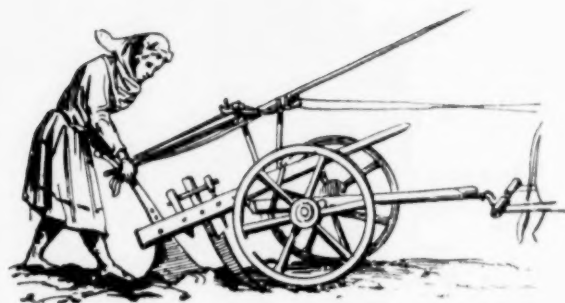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 說明

圖一 中世紀的主教穿着禮服，手持牧杖，坐在宝座上執行職務（十三世紀）。采自拉維斯：“中世紀史圖譜”頁116。

圖二 歐洲中世紀的戲劇。歐洲中世紀的戲劇故事多取材於新舊約。圖為聖誕節日的演出。采自拉維斯：“中世紀史圖譜”，頁119。

圖三 中世紀的農具。自右而左：1. 耕犁，2. 鐮刀，3. 軋葡萄機（釀酒工具）。采自拉維斯：“中世紀史圖譜”，頁157。

圖四 十三世紀時法國香濱地區的庙会。在左邊後方台上舞蹈者系表演技藝的藝人。采自拉維斯：“中世紀史圖譜”，頁155。



## 历史科学和历史教学也要来个大跃进

郭沫若院長題詞.....	(2)
叶聖陶副部長題詞.....	(3)
林礪儒副部長題詞.....	(4)
要作一个又紅又專的史学工作者.....	陈 垣 (4)
兴无灭資, 发展历史科学.....	翦伯贊 (5)
必須有一个史学战綫上的大跃进.....	呂振羽 (6)
我們的倡議	
——北京天津部分中学历史教师的跃进倡議书.....	(7)
× × × × × × ×	

在历史科学战綫上乘風破浪.....	巩紹英 (8)
-------------------	---------

### 理 論 学 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續完).....	孙定国 (13)
--------------------------	----------

### 教 学 参 考

太平天国后期的商业政策.....	娜琳高娃 (23)
倭馬亞王朝的統治与哈里发王朝的分裂.....	納 忠 (29)
資 料 略談明初的屯田.....	郭厚安 (35)
料 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选輯 (八).....	耿淡如 譯注 (39)

### 讀 史 参 考

花紋与实物史料.....	韓寿萱 (43)
--------------	----------

### 教 学 問 題

在世界近代現代史教学中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教育的体会.....	黑龙江綏化一中 李恩錫 (51)
我校开展“乡土研究小組”活动的情况和輔導体会.....	苏州第九初中 陶俊升 (54)

× × × × × × ×	
---------------	--

圖 片 中国历史参考图片 (四十)、世界历史参考图片 (二十七).....	(封底里、封底; 封里)
---------------------------------------	--------------

問題解答一則.....	刘心显 (56)
-------------	----------

## 历史教学

• 月 刊 •

一九五八年四月号

(总第88期)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  
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錦州道六号)

發行者 天津市报刊推广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30元

### 預 定 价 目

三个月三期 0.90元

半年六期 1.80元

全年十二期 3.60元

历史发展是辩证式的发展，  
历史研究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才能成为科  
学。历史教学是要以经过科学整  
理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中国的史料  
是汗牛充栋的，要加以科学的整  
理正大有可为，史学工作绝没有“所  
为无米之炊”的顾虑。史学界是应  
该来个飞跃的，集中力量来实现  
史学方面的这宗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和这宗规划配合着，制订个人计划  
进行比赛也有必要。 郭沫若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



歷史科是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學科之一。歷史教師必須拿科學的、基本的歷史知識傳授給學生，使學生逐漸學會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看社會的一切。學生學會了這個，一輩子受用不盡。他們將永遠感激老師。這是老師的無上光榮。

歷史教師的任務是艱巨的。要完成任務，做好教學工作，教育者先得受教育。歷史教師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積極參加各種政治運動，參加一定的體力勞動，鑽研教材教法，結合教學實踐研究歷史科學，真正做到又紅又專。我相信在社會主義大躍進的今天，歷史教師一定會這樣要求自己，使咱們的教育事業隨着時代不斷躍進。

葉聖陶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

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  
者，歷史知識是寶貴的營養，  
因而歷史教師只能是紅色  
史家。  
林礪儒

要作一個又紅又專的史學工作者

陳垣

我們既然研究歷史科學，就應懂得歷史發展規律，就要在歷史的前進中，作一個促進派，站在革命最前綫，貢獻出自己的知識。

過去我們有些人只憑興趣，不顧需要；只願單幹，不願集體；只愛專門，不愛普及；只重材料，不重理論；只願自講，不求人懂；只講往古，忽略現代；只願研究，不願教課；只重著作，輕視講義。這種種毛病，都是資產階級留下來的壞風氣，很多都是個人主義的壞風氣，不是社會主義的風氣，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風氣。這情況我們要改變，尤其是“尊古卑今”的情況更要改變，我們要作到“厚今薄古”。要認清研究古人是為了今人，研究古代是為了現代；要讓古人為今人服務，不可使我們這些今人都去為古人服務。

在當前的革命新形勢下，老年人不當有暮氣，青年人更不當有暮氣，我們史學界也朝氣蓬勃的來一個大躍進，打破常規，在教學與研究上奮勇向前；在思想意識上徹底改造。今日不同往日，今日研究歷史的條件比往日好得多，讓我們共同來尽早儘快的把自己改造成為又紅又專、更紅更專的史學工作者吧。

## 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

翦伯赞

据我看來，历史学的跃进，首先是扫除思想障碍，障碍跃进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就是陈伯达同志指出的“厚古薄今”的倾向。伯达同志说，现在学历史的人“言必称三代”，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批评。当然，伯达同志也没有意思要我们不研究古代史。我国历史悠久，古史也应研究；但是研究古史，也不是为了古人，而是为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社会主义服务。由于“厚古薄今”，就使得史学工作者看不见当前伟大的历史变革，造成了严重脱离实际的现象，从而使我们的历史学走回了抱残守缺的经院派的旧路。

资产阶级思想也突出地表现在厚资料而薄理论的倾向。这里所谓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好像只要有了资料没有理论也可以成为史学专家，反之就不能成为专家。学历史的人是要占有史料，而且占有的史料愈多愈好，但是如果不如马克思主义甚至轻视马克思主义，即使占有史料，也不过是一个白色专家，甚至还有变成右派的危险。由于厚资料而薄理论，就使得我们的历史学丧失了战斗性、创造性，走回了寻章摘句的烦琐主义的旧路。

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表现在厚专史而薄通史。我们不反对专史，并且应该鼓励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上的某一时代、某一部门甚至某一问题、事件、人物进行专题研究。但是任何专题研究都必须要有通史的基础，否则就等于在沙滩上盖大楼。由于厚专史而薄通史，历史学工作者就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了。而且也使得我们的历史科学走回了支离破碎的考证学的旧路。

必须把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反掉，才能提高历史学的思想性、科学性、战斗性，才能使历史学沿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向前跃进。要反掉资产阶级思想，就必须在历史学领域内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替历史学的大跃进开辟道路。

最近召开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个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对于历史学提出了十五项重要问题和二十三项重要著作，实现这些项目，就是历史学的大跃进。为了历史学的大跃进，我想提出下面的一些建议：

一，要坚决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例如组织一些历史问题的讨论会、座谈会和专题讲座，先把历史学的空气活跃起来。

二，恢复史学会的活动。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提出历史学上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交流全国各地史学研究的成果，把历史学的队伍更好地组织起来。

三，建立研究与教学交流的制度。建议历史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三年五载之后到高等学校教书一年，传播他们的研究结论。高等学校的教师教书三年五载之后，到科学研究机关研究一年，提高他们的科学水平。

四，在最近期间，用集体的力量编出高等学校用的中国史、亚非史、世界史教科书，让各高



等学校的教师从编写同样的讲稿工作中解放出来，把力量投入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

五，重新讨论高等学校历史系的专业设置问题，把培养干部的目的和新的历史科学事业结合起来。努力在最近几年培养出一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的、经过劳动锻炼的和受过历史学基本训练的红色的历史科学的青年队伍。

六，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民国史，建议国家档案局提前整理民国时代的档案。

七，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议成立一个机构，专做此事。并且使这个机构成为常设机构，专管现代史的纪录，先按年编出长编，再写成各种专著。

八，重视档案工作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替历史研究提供资料。为了推进这种工作，建议把国家档案馆及分馆当作高等学校历史系师生的试验田的一种。同时积极组织外国史名著和资料的翻译的工作，替外国史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此外，组织力量，编出各种必要的工具书如年表、地图、词典、索引之类。

九，做好历史科学的情报工作。建议出版史学通讯，报道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情况。

十，加强历史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工作，有计划地和与我国有文化协定的各国交换教授、专家、资料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多介绍苏联的先进的历史科学研究的成果。

## 必须有一片史学战线上的大跃进

吕振羽

目前在全国范围各个战线上展开的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正是我国劳动人民以极大的革命干劲，来创造历史的一个无比宏伟的生动场面。这一均将载入辉煌的史册，我们的后代将会以何等仰慕和感激的心情来叙述、阅读和歌颂这段辉煌的历史。

历史科学战线是文教科学战线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战线上同样必须有一个大跃进。在大跃进中，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必须鼓足革命干劲、力争上游：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水平，对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进行无情的揭发和批判，使它在群众面前无所遁形；通过具体历史，提高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研究和教学质量，生动地具体地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大跃进的客观规律去教育人民，把党的正确领导所反映的客观规律去教育人民，把工人阶级领导人民革命的艰苦传统、光荣伟大正确的传统去教育人民等等，去鼓舞革命干劲；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自身，必须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必须置身于群众的队伍中去进行锻炼，从根本上解决红与专的问题。



# 我們的倡議

——北京天津部分中学历史教师的跃进倡議书

亲爱的中学历史教师同志们：

在全国人民大跃进的洪流里，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跃进奇迹的鼓舞下，我們京津两地二十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决心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教育方針，本着兴无灭資、又紅又专、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精神，鼓足革命干劲，在自我思想改造和教学工作上来一个大跃进。并向全国中学历史教师同志们倡議如下：

一、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把心交給党。苦干两三年，把自己改造成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識分子。拿出革命的干劲和鑽勁，努力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坚决做一个又紅又專、紅透專深的历史教师。

(一) 积极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認真学习时事和党的政策，带头参加社会活动和党所领导的各項政治运动，做运动中的促进派，目前特别要积极投入整風运动；参加体力劳动鍛炼，虛心向工农学习，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呼吸。

(二) 深入鑽研历史科学知識，不断提高业务水平。首先要掌握教学大綱和教科书，胜任自己当前的教学工作，并进而普遍掌握中外历史知識的基本綫索，在两三年内成为本科教学的高手。

(三) 努力学习教育理論、历史教学法以及与本門业务有关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学习苏联和本国的先进經驗；在本校教研組中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两三年内，要在教学中做到能恰当地运用教育科学原則和教学方法；并在教学实践中發揮創造性，不断地积累經驗，每学年至少总結出一两个專題来。

二、坚决貫徹毛主席指示的教育方針，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三勤”（勤儉办学、勤工儉学、勤儉生产）、“三結合”（理論与实际結合、教育与生产結合、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結合）的原則下，使历史課的教育質量来一个大跃进。

(一) 历史課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突出重要的学科之一。我們要通过各种形式突出地加强“兴无灭資”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在两三年内使他們能站在工人阶级立場初步学会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認識和分析問題。目前要突出注意联系实际，着重进行工人阶级立場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和劳动教育。要充分发掘乡土教材，以本乡本地人民的光荣历史进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二) 在課堂教学中，要講深講透。既反对堆积史料忽略对历史的分析綜合，也反对只重理論分析而忽略运用具体史实的两种偏向。要使学生牢固地掌握系統的历史知識，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規律，确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我們要打破常規，充分挖掘潜力，保証管教管导、保証質量。

根据以上倡議，我們要在最短期間內，訂出个人规划，保証坚决执行自己的倡議，和全国中学历史教师同志们比紅专、比先进、比干劲、比鑽勁！

北 京：四十一中	王佩青	女十二中	刘占文	一〇一中	刘占武
女八中	朱仲玉	女二 中	宋毓真	五十六中	吳雁南
六十五中	金啓琮	一 中	高博彥	八 中	高自謙
四 中	徐健竹	女五中	景慧灵	实验中学	張静芬
二十八中	趙恒烈				
天 津：十五中	白进文	六十中	余和驥	二十一中	肖英華
一 中	高仲君	十六中	唐世珍	一 中	郭云峰
鉄 中	張丕安	女一 中	韓克讓		(以姓氏笔划为序)

# 在历史科学战线上乘風破浪

巩 紹 英

## 雨过天晴，看清前进的道路

一九五七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应该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它的光辉的位置。这一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右派，看准了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在我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进军的道路上，掀起了一场风浪；但是，一转眼，发现他们已经陷入重围，在人民力量雷霆万钧的重压之下，万丈狂涛竟变成了可怜的泡沫。现在，雨过天晴，一时是风平了，浪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事实的教训使我们看清了：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复杂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斗争，虽然斗争的形势是一起一伏的，而且斗争的营垒也会有许多变化。

历史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广大的历史教师，作为历史科学战线上的一支战斗部队，应该从一九五七年取得这个教训。

## 历史科学的两条路线

历史科学战线是社会主义思想革命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科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经济学一样，会“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在历史科学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武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这个阵地，建立了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通过它，向广大人民和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历史科学知识把他们武装起来。这就触怒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仇神”，在他们发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进攻的时候，竟企图从这里寻找火力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历史科学是根本上敌对的，是不能和平并存的。这次斗争已经给我们指明了这一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有的放矢”，不得不借重一下雷海宗先生；因为他在这次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右派营垒里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已经是名满天下了。

雷海宗所扮演的角色之所以与众不同，是他利用了历史科学家的地位，披着学术的外衣，却当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策士和尖兵。在学术的外衣下，掩盖着他的反动的政治目的：企图篡改历史科学的方向，从根本上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地位，夺取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阴谋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有些深入，却并不是孤军。

在雷海宗散布的反动言论里，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中一些最基本的反动观点。他否认历史科学的客观规律性，否认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线索，同时也是原始公社崩溃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还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基础。

对于雷海宗的反动言论，略加一点解剖，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资产阶级历史科学的面貌和反动实质。

雷海宗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企图把社会发展规律归结为自然规律。他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讲演里（见“历史教学”1957年7月号），把生产工具（马克思把它当作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从社会经济的复杂结构中单独抽取出来，盗换掉生产方式，当作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他根本抹杀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客观存在，把它当作“海国”的特殊现象，说“在历史上真正的奴隶主国家只能是例外的，不可能形成通例”，说学术讨论中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问题，只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关于五种生产方式的科学理论，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

资产阶级否认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把历史看成一片历史事实和事件的混乱堆积。看成一笔偶然现象的糊涂账，是企图弄混了水，利用历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行投机和欺骗；掩盖历史的真实面貌，掩饰资本主义“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前途，抵抗人类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进军。

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当作一个虽然十分复杂，十分矛盾，但终究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列宁说：先就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一个是“没有捉摸

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性”。(另一个是“没有包括到人民群众的行动”，参见列宁著“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第25頁，“卡尔·馬克思”一文。)为了更鮮明地比較馬克思主义同资产階級反动的社会科学在这个問題上的根本的不可調和的对立立場，我們还可以举出下面兩段話作一个对照：一个是列宁說的：“从科学中排除規律，实际上不过是偷运进宗教的規律。”(“列宁全集”20卷，轉引“簡明哲学辭典”)一个是法西斯主义的保护神尼采說的：“只要历史当中存在着規律，那么这些規律就一文不值，历史本身也一文不值。”

资产階級反动思想家是那样明目張胆地反对客观規律，仇視客观規律。有些人虽然在表面上承認規律，却把規律看成一种主观的虛構，看成为了方便而假定的公式，这就墮入了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泥坑。有些人把社会規律归結为自然規律，例如生物学的規律，这只是偷梁換柱，實質上还是一样。雷海宗的“生产工具决定論”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生产工具决定論”或“技术决定論”，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或創造，而是资产階級武器庫里早已生了锈的廢銅爛鐵。可是，我們却可以看到它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們制造的所謂“原子社会学”，有着血緣的联系。这种“原子社会学”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原子洞吓政策的組成部分。它崇拜技术，把技术偶像化，把技术看成超乎社会之上的，主宰一切的“真正的上帝”。它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成技术的历史。美国的反动资产階級似乎从这里找到了救生圈，但是，現在誰也看得清楚，这仍然挽救不了它沒頂的危險。

同美国资产階級的命运一样，雷海宗的另一反动观点，所謂“历史形态学”或“文化形态史观”，这一純粹主观唯心主义的推背图式的游戏也早已破了产了。

雷海宗的反动观点，还表现在技术和社会經济关系的割裂，生产工具和使用生产工具的人的割裂，以为社会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是“当然的”，人的生产經驗和劳动技能“只是一个假定数”。这就貶低甚至抹杀了人的存在意义，否認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偉大作用。

历史是物質資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历史上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科学、文学、艺术)都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来自人民的創造性的劳动；如毛主席所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頁)早在一八四四年，馬克

思主义的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觀剛剛形成的时候，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里，就以他特有的深刻的闡述方式，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 and 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業，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3—104頁，列宁在“哲学筆記”里特別摘引了这几句話)。这样，就给历史唯物主义放下了一块坚固的基石。如前面說过的，列宁把这一点当作历史唯物主义与先前一切历史理論的根本区别之一。

这几乎是没有什么例外的，先前一切历史理論，从来沒有把人民群众放在应有的地位。我們所熟知的，如俄国民粹主义“積極英雄”与“消極群氓”对立的理論，梁啟超的“英雄造时势”的理論，都是这样。梁啟超認為“历史为少数偉大人物之产儿”。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同意罗素的話：“一部世界史，試將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他自己說：“試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顗，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淵，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顧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飲水室合集”專集，第16冊第113頁)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編)”中，他更毫无掩飾地說：“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問題了。譬如欧洲大战，若无威廉第二、威尔遜、路易乔治、克里孟梭几个人，历史当然会另变一个样子，欧洲大战或者打不成，就打成也不是那样結果。又如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凱、孙文、吳佩孚……等人——甚至于連我梁啟超——沒有了去，或把这几个人抽出来，現代的中國是个甚么样子，誰也不能預料，但無論如何，和現狀一定不同。”(同上，第23冊第29頁)还有，尼采的“超人哲学”，把人类当作“供实验的材料”，“多余的廢品”，就更不必說了。

当然，雷海宗的“生产工具决定論”和美国资产階級的“原子社会学”，是从另一方面否定人民群众，把劳动人民看作在“技术上帝”的主宰之下，“假定为当然的”一群影子，这就实际上把劳动人民当成一个多余的数学符号，从他們的公式里划掉了。表現的形式虽然有些不同，却仍然是“一丘之貉”。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在階級社会里，主要表现在階級斗争中的主动性，所以成为历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动者。馬克思主义把階級斗争当作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錢索。但是，階級斗争还不是馬克思学說



的主要点，階級斗争学說，还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把承認階級斗争擴張到无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承認和了解馬克思主义的試金石（參見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選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189頁）。

雷海宗否認生產力中人的因素，否認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就是企圖否定階級斗争。根據他的荒謬論點和奇怪邏輯，認為奴隸（據他說是指“漢穆拉比法典”中所反映的巴比倫社會的奴隸）“在經濟上沒有積極作用，而只有消極作用，是一種閑人，與貴族同為寄生階級”。“主人對他不會如何虐待”。“以戰俘為奴，尤其是以種族語言及生活習慣相同或相近的戰俘為奴，是極個別的事，……異種異族的戰俘在奴隸制的发展上发生重大作用，是很晚的事，是進入鐵器時代之後的事，並且確切知道的只有羅馬一例”。至於農民，“一般是不能奴役的”。這就在根本上抹殺了歷史上奴隸主和奴隸，地主和農民的階級對立；而且在土地所有制問題上，“不能由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現象向前推論，前此各地各時的實際情況（不管理論如何）極不一致，並無簡單的公式可尋”。

（以上引文均見“歷史教學”1957年7月号：“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那麼，請問：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成了什麼社會呢？中國近百年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多少人流血犧牲，不都成了多餘的沒有意義的蠢事嗎？從雷海宗的“歷史形態學”的黑色眼鏡看去，一切都顛倒過來了。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本來就站在不同的立腳點上面，“樓台倒影入池塘”，在資產階級右派製造的五里霧中，雷海宗簡直想用頭倒立着跳舞了。

然而還不止此，雷海宗還更躍進一步，在機器時代生產工具“一致”的烟幕下面，偷偷地塗掉了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分界綫。這樣，他的進攻的鋒芒就一直擴展到無產階級專政了。

此外，他還含沙射影，反對“古代東方”的說法，企圖借以動搖向蘇聯先進歷史科學學習的正確方向。但這只算是一支暗箭。

雷海宗給我們上了一課，使我們能夠分清歷史科學中的兩條路綫。但必須指出，雷海宗是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的反動營壘里，放出那些謬論，這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思想問題，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在這裡，我們只是把它當作這一課的標本，至於對他的政治觀點和學術觀點進行深入的系統的批判，那是另一個任務。

### 破資本主義，立社會主義， 是長期的斗争

在歷史科學戰綫上，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是一個重要的勝利。這不是單純的學術思想的斗争，而是一場政治斗争。但這次斗争顯然有它更為深遠的影響。這次斗争的勝利，不僅直接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陰謀，而且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於資產階級反動的學術思想的斗争，對於資產階級的學術批判，廓清了道路。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中，還充滿着複雜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這些斗争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補充和繼續發展。只有經過這些斗争，才能完全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徹底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在歷史科學戰綫上，作為思想革命的重要一翼，鞏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陣地，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的陣地，是長期的經常的斗争任務。

工人階級對於歷史上的文化遺產是珍視的，毛主席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給以總結。馬克思主義不是離開世界文明大道凭空臆想出來的，它是“人類知識總匯發展的必然結果”。“只有確切通曉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文化，只有改造這種已有的文化，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列寧著“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第438頁，“青年團的任務”）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上一切科學文化成果，都要用批判的態度，吸取其精華，仔細選擇、保護和發展一切有用的成分，當作自己的養料。馬克思主義在學術上也是和宗派主義（列寧稱之為“教派主義”）不相容的。

但是，歷史上的階級，由於階級條件和歷史條件的限制，在歷史科學方面，雖然蒐集和整理了一些材料，積累了一些知識，也創造了某些研究方法和技術，像有些人所說的“沙里淘金”，可以供我們利用；但他們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是狹隘的，錯誤的，不能創立起真正的歷史科學。資產階級在它的青春時代，歷史上的進步時期，當然在科學文化的发展上有過一些業績，但在轉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後，就江河日下，倒行逆施，一天天腐爛起來。特別在今天，帝國主義連一根稻草也要抓的時候，歷史科學就更不能保持住它超然的虛偽外貌，完全墮落成為統治階級手中的工具，道貌凜然的科學家也就成為資本家的公開的雇傭奴仆。在這樣情況下，偽造歷史，歪曲歷史，肆意詆毀馬克思主義，欺騙人民，浸蝕群眾的革命意識，就成為他們的專業。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事情就是朝這個方向發展着的。對於這種偽歷史科學，從原



則上否定，从根本上否定，是應該的，利用某些資料和技术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中国的資產階級历史学家，不完全是雷海宗一流的御用奴仆，有些人在过去的时代里，虽然没有掌握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但在科学的園圃中还培育了一些有益的花朵。可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留戀着半殖民地中国的旧夢，拾起旧社会科学的旗帜，处心积虑，陰謀篡夺馬克思主义在学术上的领导地位，却不能不在人民的銅牆鐵壁前面，碰破了头。

对于資產階級历史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它的反动的思想体系，必須开展深入的斗争，有系統地进行批判，揭露它的真实面貌和反动本質，摆脱它的影响。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688頁）破資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严重的历史任务。

#### 馬克思主义的党性和資產階級的客觀主义

当然，对于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斗争同政治斗争有着一定的分野。两个敌对階級之間的政治斗争，归根結底，是集中在政权問題上。这是階級斗争的最高形式。在当前的历史时期中，一切敌視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們的矛头就是集中在反对无产阶级專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想沐猴而冠，篡夺共产党在各方面的领导地位。一切牛鬼蛇神，都站到这个旗帜下面，无论他們披着什么样的外衣，却說着一种共同的語言。在历史的巨輪前面，螳臂当車，迟早要被碾得粉碎。

学术斗争，在目前的历史时期中，也是階級斗争的一种反映，但却有着不同的情形。因为这是不同的世界觀和思想体系之間的斗争，要經過更長的时期。思想斗争不能靠简单的强制，只能靠自己的理論力量和研究成果一步步地占領陣地，巩固陣地。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要在斗争的風雨中向前发展，要在自由討論中磨煉自己，丰富自己。在香花与毒草同生的情况下，也要有一定的時間，才能辨清是非，驗明真偽。对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斗争，要与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結合起来，最后的胜利才有保証。

还有不直接反映敌对階級的存在和影响的，革命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積極与消極，这些斗争是反映人們的主觀認識和客觀实际之間的矛盾；这些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包括着人与人之間的新的政治斗争，也包括着学术思想領域中的斗争。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斗争是无穷无尽的，否則思想就变

成化石了。

在階級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但只有馬克思主义不隱蔽自己的階級性和党性，也只有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由于无产階級的历史地位（只会失去自己頸上的鎖鍊）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徹底消灭一切階級和剝削）决定的，不像历史上任何階級或集团那样，受着階級狹隘性和反动性的限制。只有站在无产階級的坚定的战斗立場，才能又无反顾，摆脱一切階級偏見，洞悉和真正掌握客觀真理，并且从表面上千差万別复杂錯綜的現象中，找出客觀規律；这样，就使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科学。

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批判性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既然馬克思主义是公开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場上，动员和組織群众去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而不是简单地解釋和辯护現存的一切东西，那么，这一点便是很自然的。但是，作为資產階級思想的一种表現形式的客觀主义却不是这样。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78—379頁）一文里，曾經詳細地比較了客觀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客觀主义以公正的外貌，修談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作辯护，这实际上是隱蔽的伪裝了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历史科学領域里，不要无产階級的党性，就要遮遮掩掩地輸入資產階級的党性，不要革命性的“客觀性”、“科学性”，就是离开无产阶级真正徹底的深刻的全面的“客觀主义”，作資產階級的俘虏。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

罗尔綱先生在“从整風回忆思想改造”一文中，对自己过去客觀主义立場曾有一段自我批評。他說：“拿我自己來說，首先是一个客觀主义問題，实际就是立場的問題。我是深中客觀主义的毒的。在抗日战争期間，写历史，把太平天国与曾國藩同等看待。看政治，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同等看待。国民党宣傳共产党不抗战，我不相信，因为抗战第一場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就是八路軍打的；共产党說国民党不抗战，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抗击侵华日軍的54%及伪軍的95%，我也怀疑，認為共产党的話要打折扣。我自以为是超政治超階級，我自以为是‘客觀’，我自以为这样才能够不偏不倚看出事实的真相。到解放后，我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先懂得了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超政治超階級，根本没有‘客觀主义’这个东西存在。我是一个做历史研究的工作者，我又从封建社会的历史家和資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家方面去檢查，我了解到那个被孔子称为良史的董狐，他之所以头可断，而絕不肯改动他

对赵盾弑君的笔誅，原来是要维护封建的君臣綱紀，替封建統治服务。我也了解到资产阶级的历史家，他们之所以極力标榜客观主义，目的是要遮掩阶级斗争，使劳动人民不去革命，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統治，他们也都是为他们自己的阶级服务。可見古今来的历史家都无例外地在为他們的阶级服务。历史乃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絕无所谓‘客观主义’这个东西存在。我再检查我的著作，我在太平天国史的著作中，热爱太平天国，但我在‘湘軍新志’里面却对曾国藩发生了感情，这样我就提出了是非問題。我問我自己：究竟是太平天国‘是’呢还是曾国藩‘是’呢？如果太平天国‘是’，則曾国藩对抗太平天国便‘非’了。接着是非問題，就是划分敌我，曾国藩既然是对抗人民革命，他就是我的敌人，我就必須痛恨他。于是从攪清是非，划分敌我，最后就解决了立場的問題，使我連根挖掉客观主义的毒害，而紧紧地站到人民的立場上来。我的立場問題，通过大道理的教育，通过自己所学所做的工作的检查，我得到解决了，我对政治，对研究，以至一切事物都逐漸地发生了新的感情，新的看法。古人說过：‘吾道一以貫之’，我在立場問題解决之后，确有这一种体会。”（人民日报1957年六月十三日）

这一段話，对于历史科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师，應該是十分亲切的。看問題必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上，而且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投身到实际斗争中，才会正确。

“噴泉里流出來的都是水，  
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

这就是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魯迅这两句話十分生动地說明了它的必要性。

党要求建立工人阶级的知識分子队伍，培养大批的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紅色專家，当然也把团結和改造原有的资产阶级的知識分子包括在内，这是旧社会遺留下来的重要遺產。在社会主义胜利形势的鼓舞之下，并且經過斗争風雨的震盪，他們的大多数，社会主义的觉悟提高了，开始走上了这样的道路。

但是，作一个工人阶级知識分子，他們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简单地承認和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在表面上形式上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把它当作标签或裝飾品，而是在于罗尔綱先生所體驗到的根本立場問題，就是世界觀問題。“噴泉里流出來的都是水，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这是擲不得假的。有了这种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觀，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发生了新的感情新的看法”，自然就会“一以貫之”，在接触到具体問題的时候，不会模糊和动摇。当然，要有更多的成就，还要加上艰苦的努力，而且完全克服那种左搖右摆的情况，还要經過長期的思想斗争和实际鍛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但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拿出來的貨色总是真实的；否則，在资产阶级偏見的蒙蔽之下，虽然标签是变了，揭开底子，却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私貨。毛主席說：“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资产阶级的道路同工人阶级的道路是南轅北轍，永远不会碰到一起的。

建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一方面要依靠認真地刻苦地理論学习，另一方面，同样重要地，还要依靠实际生活斗争的鍛煉。因为馬克思主义理論与实际有着密切的不可分的联系，它是与生动的群众生活斗争紧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知識分子只有經過实际鍛煉，經過經常的長期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經過必要的生产劳动，和群众在一起，千錘百煉，才能真正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义理論，牢固地掌握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才能从亲身的體驗中，真正了解和掌握历史科学知識所反映的丰富的群众生活斗争的内容。馬克思主义者只有跟着群众生活斗争的脉膊跳动，否則就会在政治上停滯，落后，失去政治生命力，或在敌人面前解除武裝，失去战斗力。理論学习和实际鍛煉，是真正的“基本建設”。

历史科学的特点，是它本身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和实际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一个历史教师，政治思想不提高，科学知識水平就不能真正提高。

当然，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或历史教师，也必須掌握比較充分的科学知識，熟悉自己的業務；但是，只有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場上面，掌握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只有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統率之下，才不致迷失方向。也只有把自己的全心全力，投入社会主义事業的洪流，斬断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葛藤，才能使科学知識成为社会主义建設的实际力量，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而不致被拋出历史的軌道。

作一个工人阶级知識分子，是党的需要，是社会主义事業的需要。走资产阶级的道路，多保留或多培养出一个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只專不紅”或“先專后紅”，正是同党和社会主义事業的需要背道而馳。工人阶级知識分子不是在溫室中培养的，要同资产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也要同自己思想中的资产阶级的傳統影响进行斗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的浸蝕。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 × × × × ×

我們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徹底完成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革命，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偉大事業。我們生逢这一时代，應該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作一个馬前卒。社会主义的灯塔，以万丈光芒照耀着前进的道路。我們要乘馬克思主义之風，破资产阶级之浪，迎接历史科学战綫上的新胜利。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 理论学习

###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續完)

孙 定 国

#### 五 在实际工作中发揚党的群众路綫的傳統，貫徹执行集体領導和党内民主的原則，为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風而斗争

我們已經分析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又分析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果把这两者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就可以明显看出，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鋒队——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綫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了。

现代史的经验、特别是近几年来若干国际事件的教訓証明，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如果不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鋒队——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要想赢得徹底的胜利，那是不可能的。誰都不能怀疑，正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觀、历史觀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是领导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証。

但，还必须注意到，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领导得好，就必须把我們的世界觀、历史觀深刻地貫徹到全部工作之中，就必须在全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綫的原則。我們之所以必須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綫的原則正是从我們的科学的世界觀、历史觀出发的。关于这一点，偉大的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首先创造了光輝的典范。

我們党的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基础，繼承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傳統，使群众路綫的领导方法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重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在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总结；而在八大以后，毛澤东同志又提出了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的報告，尔后在反右派斗争中，我們又创造了大鳴大放大辯論这种嶄新的形式，这样就把群众路綫的领导方法，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从七大到八大以来的丰富經驗，在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中，关于群众路綫問題，又作了一次極為深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概括，值得我們进行深入的研究。

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报告中，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作指針，闡明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我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态度。他說：“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偉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組織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sup>①</sup>

这就很清楚：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不是党的工具，而相反，党是人民群众完成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的工具，为此，党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这一点，正是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次代

<sup>①</sup>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單行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頁。

表大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反复加以阐明过的问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这是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关系以及党对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的主要特点。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所必须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

而要彻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还必须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从而在我们的行动中又坚持着信任人民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的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群众观作到完全分家，和它们的世界观作到彻底的决裂。

在这里有必要引出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两段有名的话，供同志们研究。

列宁在“怎样组织比赛”一文中写道：“……‘他们’（按：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为‘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决办不好社会主义革命所加到劳动群众肩上的那种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真正英勇伟大的组织任务。‘没有我们是不行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这样安慰自己说。他们这种厚颜无耻的打算决不会实现：富有学识的人现在就已分化出来，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群众方面，帮助民众来打破资本仆役们底反抗。而具有组织才能的人物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是很多的，这些人材现在刚刚才自觉有力，醒悟起来，趋向于生动的、创造性的伟大工作，独立从事于社会主义社会底建设事业。

现在最主要任务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主要任务的话，——就是要尽量广阔地发展工人以及所有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自动倡首精神。无论如何都要打破那种荒谬、粗野、卑鄙龌龊的旧成见，似乎管理国家，管辖社会主义社会底组织建设工作，只有所谓‘上等阶级’，只有富人或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胜任。

这是成见。支持这种成见的，则是那些腐敗慣例，頑固守旧，奴才習气，尤其是资本家龌龊的私利观念，这些人正是乐于借管理来搶劫，为搶劫而管理。这样不行。工人们一分鐘也不会忘記自己需要有知識力量。工人们在求知方面表现得非常热心，又恰恰是在現時，这就証明无产阶级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迷誤，也决不会有迷誤的。可是組織家的工作是凡能識字，善于知人，有实践經驗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可以胜任的。这样的才干，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藐視所鄙視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的。这样的才干，

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并且是一个最丰富的泉源。”①

列宁的这一段话，对于群众创造力量的无比信任和对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荒谬、粗野的严厉抨击，正是揭示了两种世界观、两种历史观在同一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和絕不相容的实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说过：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无分店的那种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②

显然，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革命的政治家和貴族式的政治家、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关于群众问题上的两种态度，尖锐地对立起来，这也正是从两种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对立出发的。

深刻地了解这一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不从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上来了解这个问题，就很难了解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和“坚信群众的创造力量”的观点，提到首要的地位上来，从而也就很难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根本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上来，并且把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对立起来加以分析，其深刻的理论意义，也就在这里。对于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特别是在这个运动的胜利基础上所焕发起来的全国人民在生产战线上那种空前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就更容易了解它的重要性了。

可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地提出：在認識方法上来解决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他说：

“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7—3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二版，第868页。



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主观主义者给我们党的损失，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胜数的。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得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因此，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sup>①</sup>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因为他把群众路线的问题提到认识论的原则高度上来解决它。他在这里所说的认识方法上的问题，也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事实证明，如果不是从认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极为通常的现象：我们党内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对党、对阶级、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的，经得起监狱、战争极端困难情况下的严重考验，并且是晓得我们共产党员的最高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可是有的同志却没有把党的工作做好，不是给人民服务得很好而是服得很坏。像这样就不仅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而且在我們同志的内心里引起极大的痛苦。甚至于在工作中又往往重复错误，批评检讨之后，旧病复发。这倒底是为了什么呢？显然，这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没有从认识论上解决问题的缘故。

正为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从认识方法上解决问

题，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应明确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在领导方法上的具体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又受实践的检验。而这种实践也就是群众在生产斗争中的实践和阶级斗争中的实践。离开群众的实践，我们就无法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一般地讲来，人类的认识史，自始至终是和人们的实践，首先是生产斗争的实践，而后是阶级斗争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而具体地讲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和发展，也正是和我们所领导的群众斗争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正为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提纲”的第三条里提出了“教育者本人是必须受教育的”的著名的原理。也就是说，教育者而不受教育，是无法进行教育的。共产党人是群众的教育者，是群众的先生，而同时又是受群众的教育者，是群众的学生。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是先生又是学生，只有坚持了这一条辩证法，才能够更有效地把我们的认识论贯彻到我们的领导工作中去。任何天才的领导者都必须是如此。

例如马克思坚信法国工人阶级的创造力量，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又例如列宁坚信俄国工人阶级的创造力量，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总结了工农兵苏维埃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新条件下的新形式。这就显而易见，不论是公社的形式还是苏维埃的形式，都不是马克思和列宁在自己头脑中凭空创造出来的，首先是他们总结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经验，然后才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反转过来又用以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天才的马克思和列宁，他们的领导艺术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妙之处，他们也正是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的。他们所以被公认为是群众最好的先生，又正是因为他们和群众最好的学生的缘故。而斯大林同志还正确坚持列宁的原则的时候也是如此，斯大林同志总结了斯达哈诺夫运动而指出它的重大意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在历史上领导工作的经验，曾亲自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深刻地揭示了群众路线的实质，并揭示了群众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的联系。在决定的第四条中写

①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37页。

道：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毛泽东同志不论是在过去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在今天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论是在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方面，都是把这个万能的认识论贯彻到底的。即以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而论，从1949年以来，革命是在不断发展着的，毛泽东同志总是密切注意革命的每一发展，总结群众的创造、群众的经验，来丰富和推进党的领导工作，从而群众在斗争实践中日益提高了，党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实践的艺术也日益提高了。远的不说，就以近年来的几次重大运动，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今天的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生产的新高潮，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中央在总结群众经验、提高领导艺术方面所进行的巨大工作，就足够说明这一点了。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最根本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者丝毫也不能对群众中间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淡然置之，认为它是分散的无系统的东西而轻视它。必须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恰恰就是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的基础。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已经包含着反映客观事物各方面的真理的碎片，它好像是分散在各处的宝藏一样，任何贵重的金属都离不开它，离开这些分散的但又是丰富的宝藏，而想要提炼出贵重金属来，是任何冶炼师都办不到的。当然，任何天才的领导者如果是抛弃了蕴藏在群众中间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也就根本谈不到什么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了。所谓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就是领导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这些群众的实践、群众的经验、群众的意见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中国古语所说的“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等等，都是指的这个道理。事实证明，如果不是从群众中来，那就无法再回到群众中去，从而也就无所谓领导。正为此，刘

少奇同志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②

为了保证这条基本领导路线的彻底贯彻，毛泽东同志又集中了我党工作经验提出了极为重要的两个领导方法：一个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一个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通过一般号召来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而又通过具体指导，在广大群众的行动中，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来丰富一般号召的内容，继续指导广大群众前进，这就是我们党所经常使用的“典型示范”的方法。这个方法，在我们国家的革命工作中被广泛地运用着，例如：军事工作，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统购、统销，扫盲运动……等等，几乎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是依靠着这个方法而取得重大的胜利。这就是因为这个方法有力地解决了领导者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因为领导者抓住群众的实践而取得了经验，这就有可能把自己的领导方法，科学地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从而才有可能使革命工作按照辩证法的发展规律而日益获得胜利的保证。显然，没有人会怀疑这个方法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所起的巨大的推动工作、指导工作的重要作用。即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而言，当高潮到来的时候，是这个运动的普及全国，而在这个高潮还没有到来之前，河北的王国藩的合作社，辽宁的刘玉如的合作社，安徽的开明义的翻身合作社……对于全国来说，都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三户贫农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其意义也正在于此。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了个别城市、个别行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典型，它的示范作用，也同样是极其伟大的。在近年来的整风反右派斗争中，也同样看出这种领导方法是一切工作都必须使用的。而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大发展，在近来所出现的试验田的领导方法，再一次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试验田的领导方法，一经广泛地应用到各项领导工作中，我国将无疑地要在经济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二版，第901页。

② 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页。



錢、政治战錢、思想战錢各方面，都会取得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关于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又是充分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而高度地发挥群众创造力量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是领导骨干，一方面是广大群众，只有把这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持久，群众的创造力量，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扬，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的基本分析方法，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同志又指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sup>①</sup>，这显然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所必须遵循的方针。

违背了这个方针，也就谈不到真正的具体的群众路线。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正确地估计积极分子的作用和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的问题。关于积极分子的作用，首先是因为他们是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是革命工作中的模范和先驱者，因此党必须依靠他们自然而然地形成领导骨干。显然，正是由于他们是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本身就负有着紧密联系群众、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的天然职责。正如我们在前边所已经讲过的，革命的深度和广度是决定于广大群众的觉悟的提高和积极的参加。而这个广大群众，不仅是包括着少数积极分子，而且也包括着数目众多的中间分子以及少数的落后分子。积极分子要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在于通过他们自己的艰苦和深入工作，把包括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团结起来，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把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的分子提高到积极分子的水平，也就是把落后提高到先进的水平，这就是党之所以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形成领导骨干的基本要求。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积极分子要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的具体表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的实际意义就在于此。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的致词中又深刻地阐明了这个领导方法的重要意义，他说：“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先进生产者不但是人民群众的先锋，而且成了人民群众的核心，成了国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先进生产者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先进生产者，也就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领导。”同时他在报告中特别地强调了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领导

者的共同努力的意义，这个共同努力的本身，就深刻包含着生产领导者和先进生产者善于吸引和发动普通生产者而且是广大的普通生产者的积极性的问题，没有把这个广大的普通生产者的积极性高度地发扬起来，这个共同努力，就有落空的危险，因此刘少奇同志又说：“……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工作都必须贯彻执行依靠群众的路线，都必须依靠由上而下的方法和由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按：这也就是说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离开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离开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任何少数人的领导都不会是正确的、有效的和巩固的。”<sup>②</sup>

显然，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在发挥着它的重大作用。特别是这种方法，在今天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有名的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这种方法深刻地揭示了在领导方法中的辩证法的精髓。它将推动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生动地运用对立与统一法则，而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显然，要真正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两个基本方法，是缺一不可的。只有坚持这两个基本方法，才有完整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而这种领导方法又恰恰是被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本质所规定的，是我们的认识论所要求的。

由此可见，要完全科学地解决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必须如同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的，从这里树立我们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另一方面是我们的认识是依赖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的，教育者是必须受教育的，从这里树立起领导群众还必须向群众学习、既当先生又当学生的观点。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做到掌握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            ×            ×

但是在这里还必须提一下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问题。这也是在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中所特别加以注意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二版，第900页。

②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十一号，第23及24页。

問題。

集体领导的原则，是列宁主义的原则，是党的最高原则。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人民的集体领袖和领导人，是时代的智慧和良心。党只有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才能够根据集体讨论，集体制定政策指示，才能防止片面性，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曾说过：“为避免发生某种误会起见，必须首先着重指出，只有中央已采取的集体决议，即由组织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业已通过决议的那些问题，党中央书记才加以执行。否则中央工作是不能正确进行的。”<sup>①</sup>

列宁之所以这样重视集体领导的原则，显然也是从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出发的。

列宁曾经说过：“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sup>②</sup>列宁在这里是说的人在认识上的容易产生片面性和必须防止片面性的问题。

列宁又说过：“为了真正地认识对象，必须把握和研究对象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从不能完完全全做到这一点，可是，全面性的要求，就可以使我们免于错误，免于僵化。”<sup>③</sup>列宁在这里是说的人在认识上的全面性的要求，避免错误和防止僵化的问题。

力求全面，防止片面，这是党在领导工作中的最根本的要求，可是在社会和国家千变万化复杂情况中，这是任何个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依靠集体力量。正如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所曾经正确指出的：

“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片面的。”<sup>④</sup>

这就显然可以看出集体领导的原则又是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又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实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具体表现。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党的领导机关是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的。党的委员会的组成分子，是党和国家在各种工作岗位上的最忠实、最有能力、最富有经验的同志。而他们的经验，又是来自人民群众之中的。因此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充分发扬民主，集体地来讨论和决定党的政策指示，这就可以通过这个集体的成员，使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能力直接地联系起来，使党所规定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任务，正确而全面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的要求并获得他们的强有力的支持。而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来集体地讨论问题，就可以加强整个领导成份在政治上的责任感，并充分发挥他们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在这样有强大的群众和党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民主基础之上，是不会不成为党的强大领导力量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不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sup>⑤</sup>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地全面地阐明了这一原理。他一方面指出：“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69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5页。

③ “列宁选集”第十六卷，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85—86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5页。

⑤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sup>①</sup>而另一方面，刘少奇同志又指出：“当然，我们党的民主生活的扩大，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我们党的党员的创造性的发扬，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纪律性。同样，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sup>②</sup>

这样科学地全面地理解党的集体领导、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够正确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能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也就不能够正确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显然，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正是和党的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根本精神上互相贯通而且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本质所要求的。

当我们考察了和群众路线有本质联系的理论基础之后，就不难看出这些理论赋予了我们以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个人突出、骄傲自满等错误作风以何等巨大的力量。显然，要坚持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领导作风，就不能不和这些错误作风作斗争，因为它们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相容的。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反对这些错误作风的斗争，给予高度的注意，同时也给予我们以克服这些错误作风的重大的理论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许多年来，特别是从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sup>③</sup>显然，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干部而特别是领导干部所必须首先加以严格遵循的方针。

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曾经具体地分析了存在于我们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各种形色的官僚主义的表现，同时又揭露了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和克服的办法，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和分析。

官僚主义的表现之一是高高在上，不问下情，不关心人民生活和群众疾苦。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所反映出来这种官僚主义的例子已经受到严厉的批判。染有这种官僚主义习气的人，当然不能走群众路线。

官僚主义的又一种表现，就是坐办公室，守会议室，在公文堆里作长期旅行，在漫无边际的会议中作长征跋涉，而不是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指导群众前进，而在领导和群众之间，造成许多人工壁垒。这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是不可能很好地受到群众的教育。这种领导和群众的隔离，势必窒息我们对群众要求和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而日益使官僚主义的灰尘侵袭着布尔什维克的高贵品质。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反对的。

当然，在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时候，不能不反对那种以左的形式出现的命令主义。这种命令主义，很了解或很少了解毛泽东同志所曾经告诉的“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这一段话的深刻意义。我们有的同志还不清楚了解，任何好事情，只要你犯了急性病，而命令群众、强迫群众去行动，那就一定会费力不讨好，会把好事情办成坏事情。可是，在我们反对这种急性病的时候，决不能使它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借口。因为左的形式的官僚主义，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右的表现。这主要是指的不相信群众。而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官僚主义的表现，主要是保守主义或者说是尾巴主义。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而在今天反对这种害了慢性病的尾巴主义更是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不应忘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曾经出现过的保守主义的教训，而且在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革的高潮之前，这种领导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实际的情况，也曾经一度存在于其他工作之中。而在1956年，本来国家生活日在跃进之中，又骤然吹来一阵反冒进的小风。这由于我们的同志没有充分估计到在社会主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页。

② 同上，第68页。

③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页。

又条件下的人民的觉醒程度、人民的巨大干劲和乘风破浪的精神。这种保守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予以克服。

总之，尽管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它的最本质的东西，却只能是一个，这就是违反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违反了我们的认识依赖于群众的实践的原则。一句话，也就是我们有的同志在领导工作中，还没有自觉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論，違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造成了工作中的錯誤。

在分析了官僚主义的錯誤作风之后，还有必要提一下宗派主义和个人突出的問題。这就是如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党的集体领导是正确地贯彻群众路线的保证，而宗派主义和个人突出的作风如果不加以消除的话，它就必然损害着集体领导原则。

宗派主义是和个人突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宗派情绪的人就容易个人突出，而有个人突出表现的人又容易产生宗派情绪。因此我们共产党人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真理，而戒骄戒躁、克服任何骄傲自满的表现，是我们在思想修养上极为重大的课题之一。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二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个理论，对于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彻底的胜利，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同时，正是由于这个理论的及时提出，也就把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的光辉传统更加发展、更加发扬光大了。应该再次指出，我们在前边所提到的关于群众路线的各方面的問題，在当前情况下都有了新的而且是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从反右派以来，党在全国范围内所采取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大字报和辩论会的形式，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运用这些形式，既有利于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又有利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们反击右派的时候，夺取了并且充分利用了这种形式。通过群众的大字报，通过群众的辩论和群众的斗争，彻底地打垮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的疯狂进攻。在这次斗争中，党正是大规模地运用了群众路线的这一新形式来放手发动群众，因而壮大了左派，争取了中间，孤立了右派，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次斗争中尝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同时也“赏识”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力量，“赏识”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不可战胜的强大威力。当

右派分子拿起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武器向我们进攻的时候，除开暴露了他们反动的凶恶面目之外，是一无所得的；而一旦党和人民把这个武器夺取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他们就陷于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而被打得粉碎。谁都知道，在这场严重斗争中，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所揭示出来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非对抗性的和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和目的的理论；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的理论以及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理论，起了多么巨大的指导作用。中国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武装下，才迅速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

可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著名的报告在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所起的更广泛、更普遍的作用。那就是它更有力地给我们指出了如何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人民的矛盾的问题。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预见到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根据；列宁也曾明白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矛盾是仍然存在的，毛泽东同志的重大贡献是在于他继承了这些思想而在新条件下又根据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根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地把这个理论全面地展开并且系统化了。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我们国家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处于长期的联盟中，由于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可是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又仍然是主要矛盾，而且这种矛盾中的一部分（还应该说是很小的一部分）还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但由于党的政策处理的得当，这种矛盾，却又是更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在国际上史无前例的新情况。而同时，在劳动人民内部，像报告中所具体分析的，也同样地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这样，在我国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里，对于这种矛盾的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了天才的科学分析，这种分析，就成为我们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基础。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不仅可以正确地解决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可以正确地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我们取得了反右派的斗争胜利之后，在全国范围



內，在各級黨組織，在工廠，在农村，在学校，在企业內，迅速地展开的規模宏大的整風运动，党同样地也采用了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法，采用了大字報、辯論会的形式，充分地把群众動員起来，揭发存在于我們工作中間的主觀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風，同时也揭发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民族主义等資產階級思想。誰都看得很清楚，这次整風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就其广度來說，是全国規模的，全民性的，上自領導机关，下至基層組織。就其深度來說，也就是就問題的根柢性質來說，归根結底不是属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条道路的辯論和斗争；就是属于无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思想的辯論和斗争。就辯論和斗争的結果來說，也就是就我們所取得的成就來說，归根結底又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了資本主义道路；无產階級思想战胜了資產階級思想。显然，这个辯論和斗争的結果，已經在六万万人民中間，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社会主义覺悟，同时也極大地增强了全民族的社会主义團結。这种覺醒和團結的力量，已經掀起了朝氣奋发、万众一心来建設社会主义国家的空前未有热潮。这說明了什么呢？这正是說明了我們繼1956年取得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的基本胜利之后，又在政治战綫方面、思想战綫方面的革命取得了偉大的胜利。这說明了什么呢？这正是說明了党的群众路綫的光輝傳統在今天更加發揚、更加光大、更加丰富和发展了。这說明了什么呢？这正是說明了毛澤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已經表現出来了巨大无比的理論指導作用。这真是理論一經掌握了群众，立即变成强大的物質力量。我們完全可以这样說，毛澤东同志的这个報告对于党的群众路綫的光輝傳統的發揚光大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它的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在这个理論的指導下，使党的群众路綫获得了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新形式，而这种新形式，真是好像在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时期苏联人民找到了苏維埃的政权形式一样。它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既可以战胜敌人（像解决敌我矛盾那样），也可以團結人民（像解决人民內部矛盾那样）。众所周知，这种形式，即在大家鳴放、人人交心、打倒官風、去掉官气的口号下，所鼓舞起群众的热情和勇气和負責干部的接受批評、改正缺点的毅力和决心，对于改善領導与被領導的关系这一点上來說，是起了多么难以估計的積極作用啊！

因此，我們在今天研究党的群众路綫的时候，必

須提高到这样一个新的高度上来認識。我們必須在这个更高的水平上，来觀察各方面的事情，才能了解党的群众路綫的新发展，否則我們就一定要落后于现实。可是，生活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它的内容也太丰富了，我們每一个人虽然不能立刻全面而深刻地来把握住它，但是我們也决不敢有任何疎忽和怠慢，而必須急起直追地来从这一方面进行深刻的科学研究工作。

## 六 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必須大力貫徹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原理，为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历史唯心主义和資產階級社会学的反动理論而斗争

最后，我們还不能不談一下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問題。在这一方面，我是外行，但也願說几句话，供同志們参考。

正如前边所已經反复說过的，历史是生产的历史，是階級斗争的历史，当然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創造者。因此，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必須大力地貫徹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根本原理。我們历史工作者必須从历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找寻史料，找寻事实根据，但是我們既然不是司馬光和朱熹，而且也不是司馬迁和刘知几（尽管他們比前者要高些），不管这些人对中国历史著作有多么大的貢獻，但是他們都不能把历史看作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这是为历史条件和階級立場所限制，我們不能苛責古人）。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們必須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实现一个真正徹底的革命（当然这个革命，在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是早已开始了，而且取得了重大成績）。我們不能把历史当作皇帝的家譜或者是名臣的列傳，而必須把历史看作是人民的。一部廿四史（今天已經不是廿四史了）到底應該从何处說起呢？一言以蔽之，應該从人民說起，應該从劳动者說起。應該从周口店的猴子变人一直說到当代的工人階級。應該通过生产的发展，階級斗争的发展，來說明人民群众的創造力量，來說明人民的革命行动，也就是說明人民群众在生产斗争和階級斗争中的历史实践。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須全力地从各方面来表現人民，表現劳动創造历史的光輝業績。只有这样，才能够向全世界表明，我們的民族是勤劳的，是勇敢的，是富有創造力的，因而也是偉大的，用以駁斥在过去不論是中国或外国的資產階級学者对于我們先人的那种可耻的誣蔑。我們不仅对于像帝国主义的歷史学家把我們的民族說成是天然被奴役的民



族的那种謬論，必須給予有力的回击；就是对于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那样把我們的民族說成是沒有抽象思維、邏輯思維的民族，也必須予以堅決的駁斥。只有这样才能够向青年一代表明，我們的先人是勤勞的，是勇敢的，是富有創造力的，因而是偉大的。我們應該像列宁对于偉大的俄罗斯民族所具有的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那样来对待我們偉大的中华民族。而这一点毛澤东同志正是我們最好的典范。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我們的先人在階級社会里，長期地被剝削被壓迫，自己的勞動所得被剝奪得淨光，使着自己的創造力受到嚴重可怕的窒息。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的先人又受着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殘暴統治，長期地处于落后状态，挨着帝國主義的打。而只是在今天，在共产党的領導下，才消灭了階級贏得了解放。我們所進行的事業，是我們先人所沒有（也不可能）進行過的事業，我們的工作条件也是我們先人所沒有（也不可能有的）工作条件，因此，我們必須乘風破浪，奮勇前進，鼓起干劲，力爭上游，大家齊心協力，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偉大幸福具有現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國家。我們不應該有負于先人，也不應該有愧于後人。我們的历史工作者，必須在這一方面作出應有的貢獻來。這是我們首先想到的第一點。

其次，我們不能不看到當資產階級右派向我們猖狂進攻的時候，在社会科学領域里，把历史學也當作進攻的重點之一，向達、雷海宗等人的瘋狂活動就是鐵証。在那時資產階級社会學的反動觀點，例如否認階級鬥爭、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否認人民群眾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也曾經一度迷惑了某些历史學家的頭腦。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極大的注意。因此，在历史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堅持馬克思列宁主義的根本原理來徹底駁斥資產階級的历史觀和資產階級社会學的反動觀點，就不能不是我們的重要任務之一。

再其次，历史工作者要真正做到和資產階級的历史觀尖銳對立起來，要真正做到有力地批判資產階級社会學的反動觀點，同時也就是真正做到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中表現人民、表現勞動者，就必須堅定不移地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因为只有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先進階級，因而只有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才能够對於人民，對於勞動者，具有深刻而濃厚的感情。

這種立場和感情，對於一切知識分子，同時也是對於历史工作者，是一個最寶貴的東西。而這個最寶貴的東西，光是埋頭書房，光是苦讀历史著作（甚至是讀馬克思主義的書），那是不能輕易得到的。要得到這個東西，就必須到人民群眾中去，就必須到工人、農民中去，和他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並且虛心地向他們學習。必須經過這種在生產勞動中的鍛煉和改造，引起世界觀的徹底革命，才能够自覺地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才能够培養起真正勞動人民的感情。而且只有做到這一點，才會使你讀起馬克思列宁主義著作來，能够有深刻的根本的理解；讀起历史資料來，具有科学的历史觀、群眾觀。才能够作到對於任何历史人物的評價，是非了然，愛憎分明。只有這樣，也才能够使我們在历史的研究工作中，拋掉千百年來勝者王侯敗者賊的錯誤觀點，而看失敗了的陳勝吳廣并不低於成功的帝王，看黃巾軍的張角兄弟，并不低於曹操、劉備、孫權，看梁山泊上的宋江、李逵，遠遠高於徽、欽二帝，看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李秀成，遠遠高於所謂“中興八賢”的曾國藩、彭毓鵬等人。而历史工作者如果不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很難在历史工作中表現人民，表現勞動者。因此，历史工作者要到勞動群眾中去，到工廠農村中去，和其他方面的知識分子一樣，也是迫不及待的事情。如果有人說，到工廠農村中去，并不能解決我在历史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所碰到的困難問題，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因為困難是多種多樣的，有屬於史料的，有屬於技術性的，可是立場和感情問題、世界觀和历史觀問題，乃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是無法解決的。當然，在這裡，我們並不是說要求每一個历史工作者，都是積年累月地埋頭農村和工廠，而完全拋棄對於历史科学的刻苦研究工作，或者是完全丟開教學任務。而只是說，這種鍛煉是必需的罷了。

## 更 正

本刊 1958 年 2 月号第 4 頁左欄第 3 行中的“羅素”應為“羅素”；第 7 頁第 2 段第 7、第 9 兩行中的“卜詞”應為“卜辭”。

## 教学参考

### 太平天国后期的商业政策

娜琳高娃

太平天国革命，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所发生的最偉大的一次农民革命。由于所处时代的特点决定，这次革命不同于以前的历次农民起义，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序幕性质的农民革命。它不仅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并且，在它所解放的区域内，曾试图按着自己的愿望去解决城市工商业问题。

在早期，太平天国根据“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人不受私”<sup>①</sup>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商賈皆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sup>②</sup>的商业政策。把在軍中行之有效的公庫供給制度，推广到某些占领的城市中，男女分館，解散家庭小生产单位。城内廢除了私有，禁止自由貿易，一切資本皆归天朝总圣庫典买办，天京城内几乎形成了一个大军营<sup>③</sup>。但这是一种超越时代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作法，十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实际施行过程中碰壁是必然的。从而在他们“第一次实际应用时，它自然要退到为当时情形所许可的狭隘范围内”<sup>④</sup>，不得不由前期廢除一切商賈資本的政策，转变为后期自发地承認自由貿易、保护自由工商业的政策。太平天国后期所实行的自发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太平天国境内的商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为早已萌芽了的资本主义因素，創造了便利条件。由此意义上讲，也可以体现太平天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所以具体地研究太平天国后期的商业政策，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革命性质是很重要的。

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內訌，使整个革命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以后，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由前期的飞跃发展阶段趋向后期的衰落阶段。本文所说的太平天国后期的商业政策问题<sup>⑤</sup>，也就是太平天国后期整个经济问题的一部分。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自发的农民革命，它没有，也不可能明确的、科学的经济纲领。因此，太平天国后期的经济，仍然没有一个系统的纲领指导，只是在前期末所实行的保护自由工商业政策的基础上，自发地执行和发展了保护自由工商业的政策。这是由于

① “天朝田亩制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一册。

② 张德坚：“贼情彙纂”卷十，贼粮科派，“太平天国”第三册。

③ 太平軍在1853年三月十九日攻克南京后，进行男女分館制度，不論男女老幼，都分別編入特殊的組織中，原则上大家都过近于平等的供給制生活，但到1855年初，解散了城内的女館，允許男女婚配，恢复了小家庭的生产单位，天京城内出现了自由經營的工商业。李秀成自述中曾說：“穷苦人家各發洋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嬰領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嬰領米，无力之家，自各領銀作些小买卖改急。”可見这时天京城内已出现了自由經營的工商业是不可怀疑的。

④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生活書店1947年版，第31頁。

⑤ 此处所说后期的商业政策，并不是截然以1856年为界，也不是前期完全是沒收私有后期才是保护工商业。所不同的在于后期采取的各项措施，在前期还不太普遍，也不明显。



太平天国后期革命形势面临严重危机，需要在經濟上作有效的配合来支持对敌的軍事斗争。然而，政策的这种自发发展，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它有着一定的社会阶级根源。恩格斯說：“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斗争（不論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领域中发生的，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态领域中发生的），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阶级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表現，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冲突，則是由它們經濟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質和方式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質和方式来制約的。”<sup>①</sup>所以，想了解太平天国后期商業政策的某些发展，我們不能不从当时太平軍占领地区的經濟状况与阶级关系中去考查。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失去了長江上游的許多重要据点，但是1860年前后，忠王李秀成率軍斗争，又新开辟了一个江浙根据地。江浙地区資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較早，商業資本也很活跃，現在許多历史学者都已承認，明末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在城市商品貨幣經濟发展的基础上，已經出現了資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这在江南諸省的棉紡、絲織、采矿、陶瓷等業方面較显著。这种萌芽中的新的生产关系，清初虽曾遭受过很大的破坏，但在康、雍、乾时又逐漸恢复，并有了发展。随着萌芽的資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恢复和发展，便产生了新兴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前身的中小工商業主。他們从封建社会母胎中孕育出来，却又是否定封建制度的严重的社会力量。經過兩次鴉片战争，由于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自然經濟的破坏，大为促进了資本主义因素的成长。这支新兴的社会力量也显著地增强起来。他們是萌芽着的資本主义势力的代表者，他們要求发展自己的經濟、要求在政治上得到承認和保障。这种要求，在改良主义先驅者龍自珍、林則徐、魏源等人的思想中得到了反映。他們都以不同的形式抨击了清朝統治者的重农抑商的錯誤，主張开发矿业，獎勵工商業。但这一要求却受到当时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阻碍，不得发展。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一旦爆发了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时，他們便必然要帶着本阶级的要求，投入这一斗争。中小工商業者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以販木材做職業，兼販商米”<sup>②</sup>的唐正才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便是一例。这种現象，随着太平天国后期占据江浙許多重要城市而有所增加。他們帶着本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投入革命队伍，企图通过农民阶级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虽然农民阶级不可能自觉地充当其开路先锋，但資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是客观事实。这一客观事实自然要被反映到太平天国的各项政策措施（尤其是商業政策）中来。

1859年由王洪仁玕提出而經洪秀全批准刊刻頒行全国的“資政新篇”，正是集中地反映了上述事实。他明确主張“設新聞館，以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县貨价低昂……商农覽之，得以通有无”；造火車、輪船便利“搭客运貨”；兴銀行“大利于商賈士民”；獎勵新发明，開設各种工厂与矿厂<sup>③</sup>。这一主張，虽然有很大程度的外来成份，但具有进步意义。由于太平天国后期軍事力量的衰落，缺乏充分的、必要的物質基础，他的主張未能实现，但是，对于太平天国革命后期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商業政策，不能說沒有任何影响。

## 二

太平天国后期，境内工商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現了很多繁荣的商業区。比如：江苏洛起的盛况是“帆樯云集，絲船尤夥，閭閻不扰，市廛不惊”<sup>④</sup>；苏州四乡更是“流民雨集，百貨云屯，盛于未乱之时倍蓰……自江浙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sup>⑤</sup>；宜兴大浦商業区的景象也是“商賈云集，交易日数十万金”<sup>⑥</sup>；浙江長兴鴻桥的貿易繁盛是“始則傍岸結茅，繼則砍桑为屋”<sup>⑦</sup>；尤其是常熟“徐六涇港生意極盛，河海之船稠密”<sup>⑧</sup>“春樹万家，喧起魚鹽之市，夜灯几点，搖來蝦菜之船”<sup>⑨</sup>。

上述太平天国境内商業兴旺的事实，就連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面对这种“貨財充斥，增設市廛”、“盛于未乱之时倍蓰”的景象，也不得不驚訝地哀嘆說“初不知其为乱世也！”<sup>⑩</sup>。

江南是盛产絲、茶的区域，在太平天国占领期間，其絲茶的产量也是很可觀的。据呤喇說：“1860年七月——1861年七月間，太平天国产絲区出口之絲，計八万五千包”，“1860年——1863年間，全国絲茶，大半取給于太平境内”<sup>⑪</sup>。呤喇曾参加太平軍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222頁。

② 罗尔綱：“太平天国史稿”卷二十七，唐正才傳。

③ “資政新篇”，“太平天国”第二册。

④ 呤喇：“太平天国外記”（上）。

⑤ 王韜：“上當事書”。

⑥ 宜兴“荆谿县新志”。

⑦ 胡長齡：“儉德齋隨筆”，“太平天国”第六册。

⑧ “漏網鳴魚記”。

⑨ “常熟報恩牌坊碑序”，“太平天国”第二册，金石类。

⑩ 沈梓：“避寇日記”。

⑪ 呤喇：“太平天国外記”（中）。



随忠王李秀成作过战，并往来于太平天国与清朝统治区之间贸易丝茶，其记载是可信的。改良主义者，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也曾在太平天国境内“从事贩茶之事，凡六阅月，前后共得绿茶六万五千箱（一箱重六十磅），然尚不及太平县所有者十之一”<sup>①</sup>。这些记载都非常有力地说明了太平天国境内丝茶产量的丰富，以及丝茶贸易的繁荣。

境内店铺的营业情形，也说明了太平天国商业的兴隆。比如，太平天国总理钱塘县民务的汪姓发给恒兴店的店凭，上面的字号是一〇〇五号<sup>②</sup>，这绝不会是钱塘县发的最后一张店凭，即或是最后一张，在战争环境中，一个小县内就填发了一千多张店凭，其商业繁荣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太平天国境内屡经战争，为什么商业还能出现上述繁荣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打击了境内的封建势力，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购买力增强了；同时，太平天国在商业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后期，在商业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可分成保护与奖励、轻税、抑平物价以及公卖等政策。

（1）保护与奖励政策：这是太平天国后期在商业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太平天国每解放一个新地方，就立即颁发安民告示，要人们“工商者复其工商，各安其旧，无忘故业，公平交易，并无相欺”<sup>③</sup>，“开张者领店凭，有船者领船凭”<sup>④</sup>，对其营业加以承认和保护。对于囤货不售的奸商，则加以严厉的制裁。“花溪日记”记载，太平天国“强令店家开市，有以无货辞，打毁店物殆尽，于是皆畏势作买卖”<sup>⑤</sup>。这虽然是统治阶级恶毒诬蔑的言词，但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对奸商的严厉制裁，也是保护商业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

对于一些缺少资本的商人，则“借其本而资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sup>⑥</sup>。甚至要铺户“无资本者，具呈请领本钱，或呈明何业认领何等货物，仍估定货价，于售卖后缴还钱七成，留三成，俾其永远借以运转”<sup>⑦</sup>。

太平天国除采取上述种种办法外，还给以法律上的保障。在德兴楼执照中，即有明文规定，“倘有过往兄弟，本境匪徒在铺紫馆，以口持强硬买滋事等因，准赴本镇呈控，立拿究治”<sup>⑧</sup>。太平天国并认真执行了这些法令，例如，苏州太平军负责人熊姓，处死了两名买货不偿价的人，并枭首示众，不但使“众皆帖然”，而且“各乡传播，船来日多，售亦日盛，乡民过午，满载而归，奚止利市三倍”<sup>⑨</sup>。

太平军对商业的交易，“极为规则，非出相当代价，虽一鸡蛋不妄取”<sup>⑩</sup>，“有时更多给其价”<sup>⑪</sup>，且“每购什物，倍价与之”<sup>⑫</sup>，以示奖励。结果“以前和满清交易卖一文钱的东西，现在可以卖到三、四文”，所以“乡下人已经不怕到苏州和崑山去做买卖”<sup>⑬</sup>了；一些“上海少数中国人，惊讶于这种情形，已开始回宁波”<sup>⑭</sup>。可见，太平天国的这种奖励措施，已经吸引了一部分外地的商人，到太平天国境内来经商。

（2）轻税政策：太平天国后期，继续和发展了前期的轻税政策。1860年后，在浙江“水陆要路立卡收税”<sup>⑮</sup>，“各乡市均设关税”<sup>⑯</sup>。抽税的税率，因文献湮没，尚难详考，但据现有一些零星记载，可知其税率是很低的。如荆谿“米盈石，布或匹始税”<sup>⑰</sup>，米“每石百文钱，市卡亦如此”<sup>⑱</sup>。当时海宁米价最高时涨到十千文，每石征税百文，其税率仅为百分之一，可见极轻。正如李秀成自述中所说：“各关卡之税，轻收以酬民苦。”这种轻税政策，对扩大市场、活跃商业有着很大的作用。在当时，也只有代表农民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

② 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③ “安民告示”。“太平天国”第二册，文书类。

④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0页。

⑤ 冯氏：“花溪日记”卷下，“太平天国”第六册，第714页。

⑥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19页。

⑦ 潘鍾瑞：“苏台聚鹿记”，卷上，“太平天国”第五册，第276页。

⑧ “盛镇卡凭”，“太平天国”第二册，公据类。

⑨ 同⑦引书，卷下，第300页。

⑩ 吟啊：“太平天国外记”。

⑪ 白伦：“太平叛党记”。

⑫ 佚名：“金陵被难记”，“太平天国”第四册，第747页。

⑬ 艾约瑟：“访问苏州的太平军”见王崇武编：“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⑭ “上海怡和洋行致香港总行的信”，见王崇武编：“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⑮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0页。

⑯ 徐日襄：“庚申江陰东南常熟西北乡日记”，“太平天国”第五册，第433页。

⑰ “荆谿县志”。

⑱ 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第六册。

階級利益的政权，才能做到这一点。它与清朝政府1864年开創的厘金制度，稅率差別極大。例如咸丰十一年在上海附近“德胜港口新設抽厘卡子，……雜貨每千抽五十文，空船三百文”<sup>①</sup>，但实际“所抽之稅，又較法定之額增加數倍”<sup>②</sup>。結果，商貨往返行經一、二百里，所納厘金就往往超过貨价。

和太平天国稅收直接有关的一个問題，是稅收机关的廉潔、公平，征稅手續簡便，严禁苛索。苏州太平軍主將錢姓所发客商卡票中，就曾明文規定：“照凡商家貨船到者，发照应例抽收，毋許浮濫多索”<sup>③</sup>。征稅机构“極為公平正确而簡單。每鎮每村仅一所，貨物之納稅者，給予凭照，不再于他处科斂”<sup>④</sup>。虽然事实上，不可能每鎮每村都設稅卡，但这一材料說明了只要納稅取得凭照后，就可通行各处。又如太平天国发给油坊的凭照上也說：“应納稅油照榨大小額數，每月一解至总油盐衙，过秤查收，領取印揮，以备查核……”<sup>⑤</sup>。这种良好的稅法，非常有利于商業的发展，所以吟喇說：“太平天国絲業之所以发达，未始不由于稅法之良善也”<sup>⑥</sup>。这和同一时期的清朝政府推行的“抽厘助餉”，关卡重重，斗粟尺布，隨身錢物都稅，途中关卡“每二、三里即一所……所征之稅，視法定額增加數倍，任意剝削，小民控告无門”<sup>⑦</sup>的情况，形成显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更有力地說明了太平天国的輕稅政策，是促进境内商業兴旺的原因。

(3) 抑平物价政策：物价上漲，会严重地影响人民生活，損害自由工商業。因此抑平物价是提高人民生活，发展工商業的重要条件。太平天国在这方面，也有許多措施：盛鎮卡凭上規定“自給（卡凭）之后，尔等貿易务宜出入公平，价昭划一，毋得欺詐，致構弊端。”<sup>⑧</sup>恒兴店凭也規定：“务須公平交易，毋得昂价居奇。”<sup>⑨</sup>这些文献是太平天国主張公平交易、抑平物价的有力証明。

此外，太平天国还与境内奸商的囤积居奇、抬高物价的破坏行为展开斗争，当时金匱商凭即明文規定：“一切貨物务須公平交易，既不得奇貨自居，亦不得高抬市价，如敢壟断漁利，有害民生者，准尔鋪戶，指明稟究。”<sup>⑩</sup>采取发动同業互相檢舉的办法来打击奸商，杜絕壟断居奇，这是抑平物价的革命办法。

这些抑平物价的措施，在当时还有它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当时清朝政府由于財政危机，濫发通貨，商人囤积居奇，造成“百物騰貴，斗米值制錢一千二百文”<sup>⑪</sup>，使得广大人民无法生活，商業倒閉。这种現象，不能不影响太平天国境内的商業，所以太平天

国政府在自己的解放地区，采取抑平物价的措施，对安定人民的生活，恢复社会經濟有着现实的意义。例如英国怡和公司分行的格林，在致总行的信上便提到，太平軍到宁波后，米价下落到每石三元四角五分（約为二兩銀子，当时一兩銀約合一千錢），即每石米值二千錢，比“斗米价制錢一千二百文”要賤八倍多。

(4) 公卖政策：太平天国前期，在軍中普遍实行的公营买卖政策，对支援前期的軍事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公卖物品的来源，据禹一宁的归納，不外是人民拥护革命所献納的貢物；繳获敌人的物资；或不遵守定章交稅而沒收的物品<sup>⑫</sup>。他們把这些物品賤价卖给人民。这种公营貿易，在太平天国后期，仍然存在。例如：1861年十月，太平軍在紹兴，对“商人藏盐皆禁鋼，据为己有，別立‘盐师帅’董其事，亦名乡官”<sup>⑬</sup>；次年二月，在常熟“禁开張錢公正盐局，着各职領盐派卖民間”<sup>⑭</sup>，就是最好的証明。不过，这时的公营买卖已不遍普盛行了，交易品的种类也不多了。虽然如此，后期的公卖政策，仍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首先，它直接保证了太平軍后期軍事斗争的一部分軍需供应；其次，減輕了人民的一部分負担，提高了人民的購買力，間接活跃了境内商業；再有，公营买卖本身，又起着調节各地貨物和防止奸商囤积、抬高物价的作用。

綜上所述，太平天国对內的商業政策，虽然是自发的，但因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境内的商業得以迅速发展，从而为早已萌芽了的資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創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太平天国后期的对內商業政策，是进步的，革命的。如果太平天国革命繼

① 姚济：“小滄桑記”，“太平天国”第六册，第486頁。

② 吟喇：“太平天国外記”。

③ “太平天国”第二册，公据类。

④ 同③。

⑤ “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圖錄續編”。

⑥、⑦ 同②。

⑧ “太平天国”第二册，公据类。

⑨ “太平天国文物圖錄續編”。

⑩ 同⑤。

⑪ 李光燾：“劫余雜識”，“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21頁。

⑫ 禹一宁：“太平天国的商業政策”。

⑬ “湖州紀略”，“太平天国”第六册，第769頁。

⑭ 顧汝征：“海虞賊乱志”，“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3頁。



續胜利发展,能实现洪仁玕在商業方面所提出的具体建議,那么,当时的中国定会走上資本主义的道路。

### 三

太平天国不仅对境内商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对于国际貿易方面也主張平等互惠、自由交往。早在拜上帝会教义中,就曾提出,天下人們“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sup>①</sup>主張国与国間,應該友誼相通,和平相待。到南京奠都后,基于这种民族平等的思想,采取了与外国自由貿易的政策。1853年,楊秀清答复文翰的要求說:“准尔英酋,帶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章經營商業,悉听其便”,对于“外国商人,一如兄弟”<sup>②</sup>。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是主張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貿易的。

在后期,太平天国繼續采取了这一政策。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洪仁玕,在他所提出的帶有資本主义性質的綱領——“資政新篇”中,明确地主張:“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許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惟許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毀謗国法也。……一切輕污之字,皆不必說也。”<sup>③</sup>既不排外,也不媚外,洪仁玕的这种思想,对太平天国后期的对外貿易政策不无影响。李秀成和譚紹光复戈登書中說:“你处图利,我处置办,听从通商,原无禁令”;“外邦之人,来去原听自便,既不誘之使来,亦不禁之不去……嗣后尽管前来照常通商,万勿疑虑”<sup>④</sup>。对于守法的外国商人,則发给护照加以保护。侵略者本身,也不得不承認:“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在太平天国領土以内,較在清政府統治的地方为更有保障。我們有很多証据,証明太平軍亟欲和我們发生友好的通商关系。”<sup>⑤</sup>

由于实行这种自由貿易政策的結果,太平天国境内的絲茶出口都有了显著增加。1860—1861年間,生絲的出口为六万九千一百三十七包,次年增至八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包。1862年七月三日,英国斯丹夫雷將軍致英国陸軍部的信中說:“前二礼拜內,上海所到之絲,自太平軍境内来者甚多,其貿易想甚发达。”茶的出口額,在1861年增至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九磅。由于貿易的发达,当时貨船至太平天国境内的日漸增多,自上海来天京貿易的“每日到埠之船只有五十艘之多”<sup>⑥</sup>,形成“自江浙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的繁荣景象。

但是,这种对外自由貿易政策,絕不同于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太平天国对进口的商品完全是按照自

己的需要来选定的,由于当时战争需要槍炮、火药,因此便主动向外国采購这些东西,例如浙江乍浦太平軍守將鴻天福陈姓,在致英国艦長味乐德克照会中就說:“願購英国砲彈”<sup>⑦</sup>。而对于当时不需要的商品,即予以拒絕和限制。太平天国这种主动的貿易政策,不但直接保护了境内工商業的发展,保証了軍事物資的需要,并有阻止中国成为附属于外国資本的殖民地的作用,因此,这种政策遭到了侵略者的反对,他們便从前期的伪装“中立”轉为后期的公开干涉。

太平天国具有崇高的民族自尊心,实行保护民族独立的政策,坚决执行自己的稅法。關稅自主是一个独立国家必备的条件,它直接关系着国家的財政独立。侵略者每时每刻都在陰謀破坏太平天国的關稅自主,太平天国坚决地打击了侵略者的这种野心。太平天国主張对外自由貿易,但必須以按照規定繳納關稅为前提,如果外国侵略者敢于違犯法令,即予以严厉的制裁。有一次,英国亞但孙公司輪船,滿載絲繭路过洛起太平稅局,不肯納稅,太平軍就将船貨扣留,并且向英国外交官提出“今貴国商人之行为,既違背定制,而貴国官長,强为干涉,于国际交誼不合”<sup>⑧</sup>的严重抗議。

太平天国与外国通商,使侵略者最为头痛的,便是太平天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所采取的严禁鴉片的措施。太平天国在初期就規定:“倘有販賣者斬,吸食者斬,知情不稟者,一体治罪。”<sup>⑨</sup>这种严禁鴉片的結果,使上海的鴉片輸入,自1859年的三万三千七百箱跌为1860年的二万八千四百箱。1860年五月,英国在华販賣鴉片的怡和洋行致香港总行的信中說:“由于盛傳南京叛軍节节胜利的消息所造成的惊恐,……在上次信中所說的鴉片市場好轉的傾向,已經无法保持了,相反的是所有的貨品都无人过問。”<sup>⑩</sup>而鴉片貿易,占輸华英貨的很大比重,是侵略者扩大在中国的商品市場,榨取利潤的重要手段。正如馬克思

① “原道覺世訓”,“太平天国”第一册,太平詔書。

②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③ “資政新篇”,“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28頁。

④ “李秀成譚紹光复戈登書”,“太平天国”第二册,第761、762頁。

⑤ 呤喇:“太平天国外記”,引英国駐沪領事康迪乐致英国外相罗塞尔函。

⑥ 同上。

⑦ 同②。

⑧、⑨ 同⑤。

⑩ 王崇武編:“太平天国史料譯丛”。



所指出：“印度底不列颠政府，它的七分之一的收入都是由于出卖鸦片给中国人而得来的。”<sup>①</sup> 食得无厭的侵略者之所以起而干涉太平军是势所必然的。我們可以断定，假设太平天国革命完全胜利了，那么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利益会被根本的推翻，中国会成为独立强盛的国家。

#### 四

太平天国后期的商业政策，直接促进了境内商业的繁荣，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如1860年前后，东南沿海地区先后出现的各种机器制造业；1861年在福州出现的机器制茶场；1862年在上海出现的机器缫丝场等。这些工业的发展，与太平天国革命打击封建势力，实行保护工商业政策，不能没有关系。所以说，太平天国后期的商业政策，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政策，其意义是很大的。

太平天国对外的自由贸易政策，是独立自主、平等互惠的通商政策。这种政策，正是反映了当时萌芽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迫切要求。对外的自由贸易，是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政策，打击了侵略者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野心，从而保护了太平天国境内工商业的发展。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崇高的民族尊严，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们说，从商业政策方面来看，也可以体现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太平天国后期的商业政策，不是自觉的、有系统成套的经济纲领，因而在实行中，各地极不一致。由于小生产者为其生产地位的狭窄、分散所决定，不可能把商业政策和其他政治、军事等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也就不可能制定出统一的、系统的商业政策，这是必然的现象。

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也反映了对侵略者的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曾经错误地因为宗教的形式相同的缘故，把以信奉基督教做招牌的资本主义侵略者看做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其对外自由贸易的政策，也不会是彻底的。

这些缺点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脱离开

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苛求太平天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其积极意义、革命意义是主要的，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页。

（上接第38页）的确是“养军而不困民，法莫善于屯田”<sup>②</sup>。后来屯田制度收坏了，军餉只好加在人民身上，于是，人民负担虽重，但军餉的供给仍很困难，弄得国库日絀，军民交困。

此外屯田对明初边防的巩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沿边重镇都有屯兵戍守，如洪武元年设北平、大宁都司，各置屯田；四年，叶旺、马云屯田辽东；八年，遣邓愈、陆聚往陕西，李谡等往北平、永平，量兵屯田，开卫戍守；二十五年，令馮胜、傅友德籍山西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二十八年，勅周王往塞北筑城屯田；勅燕王出辽东塞屯田；三十年，城开平卫，命盛熙分调北平等都司军马屯守，于农隙讲武，以备不虞。这些屯田士卒，都是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所以边境军储充足，军士生活安定，战斗力也就较强。后来由于将校豪右的侵暴，明代的边防力量也随着削弱了。

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名义上持有近百万顷屯田的所有权，这是明代极端君主专制所能凭借的雄厚基础。与争夺其他官田一样，皇室与一般地主在争夺屯田的直接所有权上，同样展开了剧烈的斗争，明王朝虽然用诛戮、法律条文来保障自己的特权，但效果并不大。不过，从此也可看出屯田对皇权的集中和巩固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总之，无可怀疑地，屯田对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政权、边防的巩固等各方面，确曾发挥过较大的作用。元末农民起义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也是一个明证。不过，屯田也与封建社会其他制度一样，其主要目的是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有时客观效果并不如是。因此，在屯田制度建立不久以后，便由于统治阶级的互相兼并、掠夺而衰败了。

②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户部二，屯田。

#### 更 正

本刊1957年11月号第40页左栏第26行“波伏日耶”应改为“沿伏尔加河区”。

1958年2月号第33页左栏第2行(Tahāfut al-Palā Sifah)应为(Tahāfut al-Palāsifah)，同栏第11行“哲学概要”应为“神学概论”，同页右栏第2行及第4行“方济各派”应是“圣芳济派”，同栏第11行“衰讀”应改为“衰蠹”，同栏第14行“逸乐”应作“娱乐”。

# 倭馬亞王朝的統治与哈里发王朝的分裂

納 忠

阿拉伯人在哈里发奥瑪尔时代(634—644年),对外擴張胜利,統治着埃及、叙利亞、伊拉克、伊朗…等地。阿拉伯人的統治,以掠夺当地的财富为主,但当时阿拉伯人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社会的残余,沒有組織国家的經驗,阿拉伯人的政治組織是一种“神权政治”的“共和国”,是一种“軍事公社”性質的組織。奥瑪尔曾下令禁止軍人在被征服的国家中夺取土地①,依靠当地土層人物管理国家。奉伊斯蘭教者得与阿拉伯人享同等待遇,不奉教者繳納輕微的地租和丁稅;賦稅的压迫,比过去輕微得多②。这个时期,阿拉伯的統治者还保持着粗野的、朴素的游牧生活。

但是居住在埃及和叙利亞的阿拉伯貴族,長期統治着經濟、社会最发展的地方,受到当地貴族的奢侈生活的侵襲,竭力仿效拜占廷的統治方式;对被征服的人民,进行封建剝削,把土地占为私有;攫取奴隶,施行殘酷的压迫。阿拉伯半島上那种粗野的游牧生活,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了。因而在叙利亞和埃及发动反对麦地那哈里发的武裝进攻;叙利亞总督穆阿威雅杀害哈里发阿里后(661年),自称哈里发,以大馬士革为首都,建立“倭馬亞王朝”,并廢除原来的“共和政体”,采取世襲的、东方式的君主專制政体。

倭馬亞王朝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外的軍事擴張上的。七世紀后半期繼續向北非、小亞、君士坦丁堡、努比亞…等地侵略。八世紀初,再大举向东方的中亞細亞和印度西北部以及西方的西班牙进攻。倭馬亞所統治的版图,东达中国和印度的边境,西抵大西洋沿岸,形成一个較羅馬帝国和亞历山大帝国还大的帝国,并建立了龐大的、繁复的政府机构。

倭馬亞王朝实行本家族專政,对阿拉伯人民和非阿拉伯人民进行血腥的軍事統治。倭馬亞王朝八十九年(661—749年)的历史,是一个殘酷剝削、血腥統治的过程,也是一个被压迫的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联合起来不断进行武裝斗争、反抗封建統治的过程。

## 一 浩繁的开支,殘酷的剝削

阿拉伯人开始对外远征的时候,以“圣战”相号

召,出征者一律称为“穆斯林”,沒有“軍人”、“武士”的名称。出征的人,沒有“薪餉”和“俸祿”的規定③,只是分取“战利品”。所有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不論在前方或后方,都可以按照古蘭經的規定,分到战利品,出征者分战利品的五分之四,在后方者分到五分之一:“你們須知,你們所获得的任何战利品,其五分之一归之于安拉、先知、至亲、孤兒、穷困者,出門在外者。”④到哈里发奥瑪尔时代,开始設立了俸祿制度(635年)。每一个出征的人,都有了固定的收入⑤,以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俸祿不多,彼此的悬殊也不大。

到了倭馬亞王朝时期,就大大地增加了俸祿的数目。如对阿里的兒子哈桑,从原来奥瑪尔規定的每年五千个“迭尔汗”⑥增为每年一百万“迭尔汗”,增加了兩百倍⑦。叶基德一世即位后(679—683年),有一个貴族去朝賀,叶基德問道:“你的俸祿若干?”答道:“一百万迭尔汗”,叶基德說:“我为你增加一倍”⑧。这种措施的目的是:一方面对效忠于王朝的王公、貴族加以籠絡;一方面对反对派进行大規模的屠殺后,再用金錢收买人心,使阿拉伯貴族們在享受丰裕的俸祿后,不致再怀异心。俸祿的范围,远达阿拉伯半島的边远地区;如也門地区,曾不断地掀起过反对王朝的运动,到也門的貴族們受了王朝的俸祿后,便轉过来效忠于王朝了。为了鎮压各地前仆后继

① Muhammed Al-Huduri: “回教法學史”,北京同民大眾出版社版,第101頁。

② Hassan Ibrahim Hassan: “伊斯蘭政治史”,卷一,1935年開羅版,第316頁。

③ Al-Fahri: “伊斯蘭歷代王朝史”,1928年開羅版,第60頁。

④ “古蘭經”,8,41。

⑤ Al-Fahri: “伊斯蘭歷代王朝史”,第60—61頁。

⑥ 銀幣名,奧瑪爾時(634—644)開始鑄造。

⑦ George Zeidan: “伊斯蘭文化史”,卷四,1928年開羅版,第74頁。

⑧ 同上書,卷四,第75頁。



的人民起义和繼續对外侵略，王朝只有扩大军队的組織，而军队的給养必然就增加国库的支出了。

同时，倭馬亞王朝的哈里发力图模仿拜占廷帝国的制度规模，除了設置复杂的政府机构外，并在首都大馬士革大兴土木，尽量跟君士坦丁堡和亞历力山大比美。阿布篤馬立克时代（685—705年），扩建大馬士革，兴建皇宫和礼拜堂。他为重修耶路撒冷“圣寺”，从拜占廷和埃及招雇大批工匠，从远方运送花磚千馱；以金銀、珠宝裝飾牆壁，用大理石鋪地。为了修建大馬士革的“倭馬亞大寺”，从拜占廷招聘技師二百人，修建費达五百六十万“底那爾”<sup>①</sup>。倭馬亞皇宮中已經找不到一点阿拉伯人簡單朴素的游牧生活的痕迹；飲酒荒淫之風，深入后宫。自哈里发叶基德一世开始，哈里发本人揮金如土，日夜沉醉于杯酒女色之中，音乐舞蹈、欢歌宴飲占据皇宮生活的大半，各地歌女多被选到皇宮。王公、貴族的生活腐敗墮落。因而国库的开支一代比一代浩繁，財政、經濟一代比一代困难了。

此外王朝对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詩人、学者也給以优厚的俸祿，加以收买；因为王朝需要詩人、学者們写作詩歌和文章，对自己歌功頌德。这一笔开支在倭馬亞朝时代也是非常巨大的<sup>②</sup>。

为了維持巨大的开支，只有向广大的人民进行搜刮。倭馬亞朝的历代哈里发，除了奧馬·阿布得阿基子（717—720年）之外，都鼓励各省总督想尽一切办法从事剝削搜刮。穆阿威雅曾通令各省总督：“你們为我尽量搜求黃、白之物（金銀）。”<sup>③</sup>有的总督一年为自己搜刮了一千万迭尔汗，家財达到一万万迭尔汗<sup>④</sup>。这足以說明中央和地方的統治者是如何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向人民施以惨重的剝削。

在倭馬亞朝时期，向被征服的地区大量夺取土地，农民完全被束縛在土地上，当做农奴役使，征收極为沉重的租稅和丁稅，并大规模攫取奴隶，使負担各种勞役。同时进行普遍的奴隶买卖。

对于丁稅的征收，十分苛刻。伊斯蘭初期，儿童、老弱、妇女、牧师、僧侶可以不納丁稅；而丁稅的数額也很輕微。但是到了倭馬亞朝，特別是到了八世紀初，普遍征收丁稅，不分老幼，而丁稅的数額亦增加很多。各地被征服的人民不堪其苦，乃群起改奉伊斯蘭教；并非誠心信仰，而是希望免納丁稅。伊拉克的总督哈查吉为了多征丁稅，竟下令：各地人民虽改奉伊斯蘭教，亦必繳納丁稅。北非、埃及、伊朗、胡拉森各地的总督亦相繼制定了同样的法令。于是各地已經改奉伊斯蘭教的人民，便又拋棄伊斯蘭教，恢复自己原来的宗教信仰<sup>⑤</sup>，并且掀起了規模巨大的反

对倭馬亞苛稅的起义。这一时期的起义，以胡拉森地区最为激烈，人民拒絕繳納一切租稅，并圍攻阿拉伯人的統治者，占領了撒馬尔罕，几乎动搖了当地阿拉伯人的統治政权。公元710年，哈里发瓦立德改派爱詩勒斯繼任胡拉森总督，对起义的人民进行武裝鎮压，并整頓稅收。爱詩勒斯派部下索伊达为起义中心撒馬尔罕的長官，一面进行武裝鎮压，一面引誘：若願重新来奉伊斯蘭教者，免除丁稅。于是当地人民大多又宣布重信伊斯蘭教，局势得以稍微緩和。但是由于長期的受压迫和剝削，胡拉森、中亞一帶，已經不能再負担任何租稅了。如爱詩勒斯向总督报告說的：“一切租稅都已斷絕了”<sup>⑥</sup>。于是，在不久之后，爱詩勒斯又頒布恢复奉伊斯蘭教者仍須繳丁稅的法令。結果，再度引起撒馬尔罕七千人民的武裝暴动，整个中亞——突厥人、伊朗人、阿拉伯人……，都加入了这场斗争。中間虽数度被統治者鎮压下去；但从此胡拉森地区成为一个火药庫，从八世紀初起，人民起义一直没有停止过<sup>⑦</sup>。

## 二 对异族人民的歧視

倭馬亞时代，阿拉伯統治者对待被征服的人民，异常歧視，阿拉伯統治者認為自己無論在宗系上、智慧上、才能上都比任何民族高貴，認為被征服的人民应当完全服从自己，担負一切义务。并强迫被統治的人民公开承認和頌揚阿拉伯人为世界上“最高貴的民族”。在哈里发政府服务的异族上层人物，都以結識阿拉伯貴族为荣，八世紀时，伊朗著名的文学家伊本木干法尔（公元762年卒）虽然信奉了伊斯蘭教，忠心为哈里发王朝服务，但亦不免受阿拉伯貴族們的歧視，最后終被杀害。倭馬亞王朝的統治者，除以軍事統治、剝削、奴役外族人外，并用金錢收买外族的文人、学者来歌頌自己。这个时代的阿拉伯文学，充滿了这类作品。

倭馬亞的統治者將統治下的人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阿拉伯人，第二等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外族人，

① 金幣名，阿布篤馬立克时（685—705）鑄造。

② George Zeidan: “伊斯蘭文化史”，卷四，第74—75頁。

③ 同上書，卷四，第79頁。

④ 同上書，卷四，第81頁。

⑤ George Zeidan: “伊斯蘭文化史”卷二，第21頁。

⑥ 同上書，卷四，第80頁。

⑦ 公元738年，倭馬亞王朝下令廢除向伊斯蘭教徒征收丁稅的法令，但胡拉森已成混亂的局面了。



第三等是未信奉伊斯兰教的外族人。哈里发穆阿威叶曾說：“在埃及的人分为三等：第一等为‘人’，即阿拉伯人；第二等为‘半人’，即奉伊斯兰教的‘释奴’；第三等为‘非人’，即未奉伊斯兰教的‘被保护的人’。”<sup>①</sup>

倭馬亞人每征服一地，必与当地不奉伊斯兰教的人民訂結和約，宣布他們为“被保护的人”（爱赫勒、金迈），他們的一切土地、財富、船隻、車輛…都受保护，实际上是占有<sup>②</sup>。

外族人虽然信奉了伊斯兰教，亦不能和伊斯兰初期那样跟阿拉伯人享同等待遇。倭馬亞后期，由于長期的对外擴張，战争中的俘虏大量增加。俘虏中不少是外国——特别是伊朗人中具有学識的人；为了得到較好的待遇及免繳丁稅，俘虏中改奉伊斯兰教者很多。信教后变为“释奴”。“释奴”的来源，不仅是战争中的俘虏，亦有大批是从奴隶市場上購買来的，由于兵灾之后，无家可归、无法为生者，或出卖儿女，或出卖自身者非常的多，特别是中亞一帶。阿拉伯的貴族、軍人購買大批奴隶，或再送到市場出卖，或加以釋放后，編入軍隊，或使之为自己服务。倭馬亞朝时代，阿拉伯人的文化还很落后，缺乏各項人才，便利用“释奴”使之担任工艺、農業、教育、行政、翻譯、歌手……等項职务；这个朝代著名的学者、詩人有很多是伊朗的“释奴”階層<sup>③</sup>。但是阿拉伯貴族一方面使用“释奴”，一方面对“释奴”的才能深感不安。

释奴在倭馬亞王朝时期，对学术、艺术虽有巨大貢獻，但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一直受阿拉伯貴族的压迫。阿拉伯貴族經常把“駝”、“犬”、“释奴”三者列在一起，等同齐視<sup>④</sup>。对释奴的歧視，在称谓上也可以看出来，释奴的名又一直保存在他的名字中，即“某人的释奴某人”。并禁止释奴和阿拉伯的自由女子結婚，如果发生通婚的事，亦必勒令解除。

释奴多被編入軍隊，出征四方，仅得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沒有权利分配战利品，亦沒有資格享受俸給，仅不繳納丁稅而已。在战争中的死亡亦特別多，公元687年的一次战役中，释奴死七千人，而阿拉伯人仅死八百人<sup>⑤</sup>。

伊斯兰初期，释奴在軍隊中的数目仅占五分之一，到七世紀末則占軍隊中的絕大多數，超过阿拉伯人数倍之多。同时，释奴在学术上、在政府的公职中，日趋重要，成为一股很大的力量。公元八世紀二十年代以后，阿拉伯統治集团中的傾軋矛盾，日益尖銳，于是释奴階層举足輕重，被各統治集团爭相利用；穆尔威雅时（661—679年）开始給每个释奴十五个迭尔汗，到苏来曼时（715—717年）增为二十五个

迭尔汗，西沙姆时（724—743年）則增为三十个迭尔汗。从俸給的增加，可以看出阿拉伯統治集团利用释奴的情况，也可以看出阿拉伯統治集团之間，以及哈里发中央与地方貴族之間的矛盾日益扩大的情况。他們对阿拉伯部队不信任，故爭相組織释奴部队以自重。但是释奴乃是長期受压迫的階層，又多为伊朗人，并不因此而誠心效忠于阿拉伯貴族，他們反对倭馬亞貴族的运动，从未停止过。特别是从八世紀二十年代之后，释奴部队經常跟广大的伊朗、伊拉克的农民起義結合起来，并且和阿拉伯軍隊和人民結合起来，反对倭馬亞王朝和地方的阿拉伯貴族的封建統治<sup>⑥</sup>。倭馬亞王朝的衰落、瓦解与灭亡，跟释奴部队的起義暴动是分不开的。

### 三 对阿拉伯人民的压迫

#### —“哈瓦立及派”与“十叶派”的斗争—

倭馬亞王朝实行本家族專政后，对阿拉伯其他部族加以極殘酷的迫害，特别是对“哈瓦立及派”及“十叶派”的人。

哈瓦立及派最初属“台密姆”。公元658年倭馬亞首領、叙利亞总督穆阿威叶发动兵变，率領叙利亞的有組織的軍隊企图推翻以阿里为首的、麦地那的共和政府，台密姆人参加阿里領導的民主派軍隊，进行战争（“綏芬之役”）。不久阿里对敌妥协，进行講和，繼而失敗被殺。倭馬亞人篡夺了政权，实行家族專政。这时“台密姆”族人即單獨举起反对的旗帜，不但要反对倭馬亞人，也要反对阿里，認為他們都是自私自利、压迫人民的叛徒。台密姆族人具有濃厚的游牧人性格，反对一切压迫和剝削，反对任何性質的“領袖”，主張“除安拉外，沒有法律”，也就是“除安拉外，沒有領袖”。台密姆族人一开始就遭到所有阿拉伯貴族的迫害，因为反对“領袖”和“法律”对于任何剝削統治者都是有害的。台密姆族人遭到鎮压之后，乃号召一切反对派的人，出走山野。台密姆族人的号召得到一切受压迫者的响应，他們成群

① Magriz: “埃及王朝史”，卷一，第50頁。轉引自 George Zeidan: “伊斯蘭文化史”卷五，第108頁。

② George Zeidan: “伊斯蘭文化史”，卷四，第96—111頁。

③ 同上書，卷四，第46—52頁。

④ 同上書，卷四，第61頁。

⑤ 同上書，卷四，第92頁。

⑥ Hassan Ibrahim Hassan: “伊斯蘭政治史”，卷一，第530—531頁。

結隊，走到荒野沙漠，成為一支流浪的武裝部隊，過着半游牧、半軍事的貧困生活。他們的陣容日益擴大，包括着一切反對統治、剝削的各部族的阿拉伯人——特別是游牧人。後被稱為“哈瓦立及派”（意即“出走派”或“离去派”，又稱“軍事民主派”<sup>①</sup>）。

“哈瓦立及派”人全為游牧民族，性情直率，態度爽朗，在倭馬亞王朝統治的八十九年內，從來沒有妥協、屈服，一有機會，即向統治者進攻，時攻時退，出沒無常，給王朝以沉重的、長期的打擊，使敵人疲於奔命，幾至滅亡。

哈瓦立及派在阿拉伯游牧地區的影響，特別普遍。他們大概分布在兩個地區：一個在伊拉克南部，以巴索拉附近的巴脫伊哈為中心，包括波斯灣北部的兩岸。一個在阿拉伯半島南部，以也門為中心，包括海達拉毛一帶游牧區，並達到麥加附近脫呂府地區。

哈瓦立及派始終堅持武裝鬥爭，反對“領袖”反對“法律”，因此受到倭馬亞王朝殘酷的屠殺。公元八世紀初，在武裝鬥爭失利後，哈瓦立及派逐漸轉變為一個政治宗教學派，由於他們對封建統治剝削者的深惡痛絕，他們在宗教理論上進一步深入地將“除安拉外，沒有法律”的主張提高到哲學研究的領域中去，他們提出：一切犯罪的人都是伊斯蘭叛徒；因此明白宣布一切統治剝削者都是伊斯蘭叛徒，每一個伊斯蘭信徒都應當起來和他們鬥爭，加以消滅。他們是“原始伊斯蘭”的誠篤的信仰者，“由白晝到黑夜，由黑夜到白晝，他們不斷地勞苦着。地面毀傷了他們的兩腿、兩手、鼻端、前額。（禮拜時鼻、額接地）。他們靜心的向着真主，縱使敵人的箭在絃上了，矛頭舉起了，利劍拔出了，而千軍萬馬吶喊着奔騰而來了。因為他們在真主的罪罰之恐怖中，覺得戰爭的恐怖不算什麼了。……”<sup>②</sup>

哈瓦立及派雖逐漸轉變為宗教學派、篤行宗教儀式，但從未放棄武裝鬥爭。他們在阿拉伯歷史中，以勇敢見稱。對敵人鬥爭時，婦女和男子并肩出戰，“歷代詩文選”云：“有一個哈瓦立及派的女子名叫阿母哈康，勇敢而且美貌絕倫，……有人見她出去打戰的時候，口里唱着：

我撐着我的頭顱啊，好厭煩！

沒有功夫梳洗，沒有功夫裝扮！

你們青年人啊！快來拿去我的重坦！”<sup>③</sup>

哈瓦立及派人在不屈的、血淚的鬥爭中，為阿拉伯文學史写出了許多悲壯的、熱情的、有力的而且是文辭美妙平民文學——詩歌與散文。

“十葉派”（宗族之意）產生於“哈里發”（繼承者之意）位置的繼承問題上。穆罕默德死後（633

年），沒有遺囑指定繼承人。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家族主張“哈里發”位置是世襲的“精神的遺產”，以為阿里如果有繼承穆罕默德的物質財富的權力，那末當然也有權繼承其“精神遺產”<sup>④</sup>。十葉派人認為哈里發位置不是大眾的權利，不能由大眾推選<sup>⑤</sup>。但是穆罕默德死後，阿里沒有獲得繼承權，仍由推選產生“哈里發”，經過艾布伯克（632—634年），奧瑪爾（634—644年），奧斯曼（644—656年）三任之後，阿里才得到美索布達米亞和伊拉克的貴族及其家族的擁護繼任哈里發。阿里被殺後（661年），倭馬亞王朝當政，並將哈里發位置世襲下去，對阿里家族，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屠殺。十葉派最初乃是一個貴族宗派，主張本家族（即穆罕默德的“聖裔”）世襲哈里發之位，他們最基本的主張，是“承認領袖、服從領袖”為伊斯蘭信條之一。而他們的“領袖”（依嗎母）是專指阿里及其後裔。這一切主張都是和哈瓦立及派相反的。倭馬亞朝時代，各個宗族為了奪取政權，群起假造“聖訓”<sup>⑥</sup>，一方面維護自己的主張，把自己的政權說成是合法的、符合於穆罕默德意圖的，另一方面攻擊別的宗族。倭馬亞人便籠絡了許多“聖訓”學家，假造成千條的“聖訓”。十葉派人完全否認這些“聖訓”，并同樣假造若干“聖訓”，宣傳只有十葉派人傳述的“聖訓”才是正確的。但是自阿里死後，十葉派奪取政權的目的，迄未實現，并遭遇到慘痛的壓迫。十葉派提出“領袖轉世”、“未來的領袖”等等主張，又在自己教派中宣傳：“未來的領袖（邁赫底）將轉回世間來，消滅一切殘暴的勢力，使公道和正義充滿世間”<sup>⑦</sup>。

十葉派日益轉化為一個受壓迫的集團了，他們的命運逐漸和一切被壓迫的人民的命運聯繫起來。他們反對倭馬亞政權的主張，在客觀上和被征服國家的人民的願望逐漸結合起來。十葉派發生於伊拉克，他們的首領阿里的兒子侯賽尼又和伊朗舊王朝有婚姻關係，故十葉派在伊拉克和伊朗的影響特別深遠。伊朗

① 謝苗諾夫著“世界中世史”中稱“哈瓦立及派”為“軍事民主派”（東北師範大學譯本，第83頁）。

② Ahmad Amin: “黎明時期回教學術思想史”（納忠譯），1939年商務版，第252頁。

③ 同上書，第254頁。

④ 同上書，第256頁。

⑤ 同上書，第257頁。

⑥ “聖訓”（Sunna）是穆罕默德的言語、行為、指示的記錄。有人譯為“聖典補遺”。

⑦ 同②引書，第254頁。



人借拥护“圣裔”、崇奉十叶派为名，实际从事复国的斗争①。

十叶派的斗争和哈瓦立及派不同，哈瓦立及派主张明白地、公开地进行武装斗争，从不作表面的妥协。十叶派则不然，能明战则明战，不能明战则不惜表面妥协，秘密活动，给倭马亚王朝的打击更加深重。因此倭马亚王朝在国内密布偵探網，严密防范。八世纪初哈里发阿布得馬立克曾下令：“逮捕一切稍有反对嫌疑的人，投到监狱治罪。并通令各省地方官，杀尽一切反对王朝的人。”②当时的伊拉克总督哈查吉便是执行这项血腥命令的最凶狠的一人。在他的任内，被杀者十二万人。他大量施行杀头的刑法，处死之前，必施以种种刑法，再砍下头颅，将头颅送到各大城“示众”。八世纪初以后，这样的血腥统治和屠杀，普遍到帝国的各部分，而在伊拉克、伊朗和胡拉森的情况，尤为悲惨。

#### 四 倭馬亞王朝的崩潰，三个哈里发王朝的建立

倭馬亞王朝之崩潰，阿拔斯哈里发王朝（黑衣大食）之建立 阿布得馬立克的血腥的恐怖统治，引起全国范围的骚动，阿拉伯半岛、北非、埃及、伊拉克、伊朗、胡拉森，都发生大规模的起义，最后虽然暂时平定下来，但是全国的税收却大受影响。以伊拉克为例：王朝初期的租税收入，每年为一亿二千万迪尔汗，阿布得馬立克时代（哈查吉任总督期间）减为二千五百万迪尔汗③。政府的财政遭遇到万分的困难。同时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宫廷事变，层出不穷。哈里发中央和地方贵族之间，形成对立。瓦立德即位后（705—715年），为了转移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满足贵族们无止境的要求，为了缓和士兵日益不满的情绪，只有继续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一途。于是在711年大举远征，在东方的中亚、印度和中国边境及西方的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掠夺土地和财富。征服中亚和西班牙后，一切税收、剥削都是直接武力夺取的手段。若有人用“宗教”之名指责战争，必受到迫害和杀戮。早在公元700年时，阿布得馬立克已下令禁止人们说“敬畏安拉”这句话了④。710年，哈查吉为了报复麦加人民用“宗教”之名指责王朝暴行，曾火焚麦加“圣寺”，血溅“圣地”，撕毁古兰经用足踏之，并放縱暴徒污辱妇女，搶劫妇女身上的首飾⑤。

远征之后，虽統治着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但亦未能缓和内部的混乱，而且矛盾更加明显。如远征中亚的大將屈底波，正向东方中国边境进兵之时，却遭

到哈查吉的嫉視，慫恿哈里发苏里曼将他調回，加以迫害。又如远征印度的母撒·宾·納綏尔亦被撤換。远征之后，地方贵族的权力日益强大，哈里发中央的政权已经一落千丈了，各省总督，先后形成独立的或半独立的状态。724年，北非的人民起义，完全脱离王朝而宣布独立。在埃及，宣布阿拉伯文为正式文字之后，引起全国性的骚动。也門、海达拉毛和伊拉克南部的游牧人民——哈瓦立及派人，已经逐渐跟釋奴部队结合起来⑥。伊朗、胡拉森地区成为各种起义的策源地：十叶派人和其他移居的阿拉伯人民，参加了本地的农民起义，而釋奴部队在这一地区的武装起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743年，瓦立德二世即位后，倭馬亞王朝已开始出现瓦解之状。瓦立德二世又是一个殘暴昏庸之徒，对危机重重的局面，絲毫无能为力，在宫廷贵族的包围中，日惟欢歌宴饮，沉溺美色。大馬士革和外省完全被宫廷贵族們遮断，他并縱容亲信为所欲为，以致引起人民的愤恨，终于在744年被刺杀于宫中。叶基德三世繼位后，很想振作一番，但是倭馬亞王朝在内外夹攻之下，已经无法挽回它灭亡的命运了。

在这个时候，胡拉森和伊拉克的起义，已经成为排山倒海之势。伊朗人志在复国，阿拉伯十叶派人志在繼承王朝“正統”，突厥人志在推翻倭馬亞人的統治……，这些势力匯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一强大力量，被当时在胡拉森最有势力的阿拔斯家族⑦所利用。746年，阿拔斯家族派胡拉森人艾布穆斯林为胡拉森地区首領，率領以当地农民为基本群众的起义部队，向倭馬亞王朝的駐軍进攻；攻占默夫城，尽杀倭馬亞的官吏，逐其总督拿速拉丁·舍者尔。于是胡拉森和伊朗的人民都紛紛揭竿而起，响应艾布穆斯林的号召，掀起壮阔的武装起义；从阿姆河流域到伊斯法汗这一辽阔的地带都成为阿拔斯家族的势力。749

① Ahmad Amin: “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第265頁。

② George Zeidan: “伊斯兰文化史”，卷四，第85—88頁。

③ Hassan Ibrahim Hassan: “伊斯兰政治史”，卷一，第476頁。

④ 同②引書，卷四，42頁。

⑤ 同②引書，卷四，第43頁。

⑥ Ahmed Iskandre: “埃及史”，卷一，1920年开罗版，第180頁。

⑦ 阿拔斯是穆罕默德的伯父，与十叶派同为“哈申族”，但在爭夺“哈里发”位置的問題上是分歧的、互相排挤的。



年，阿拔斯家族利用人民的力量，又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下游組織了另一支武装力量，跟胡拉森的起义部队联合起来，繼續向伊拉克的北部和西部进军，迅速地摧毁了倭馬亞王朝在兩河流域和叙利亚的军队，相繼占領庫法、安巴尔……等重要城市。749年十一月直捣倭馬亞首都大馬士革，杀王室家族九十余人，并追殺倭馬亞末代哈里发表尔旺于埃及。倭馬亞哈里发王朝遂亡。不久阿拔斯家族首領艾布阿拔斯在庫法即哈里发位，建立新王朝，是为阿拔斯哈里发王朝。

艾布阿拔斯即位后，立即在全国范围进行军事镇压，消灭异己。大肆屠杀主張“无領袖主义”的哈瓦立及派人和曾經帮助自己的十叶派人。血腥的統治政策，沉重地压在全国人民身上。故人們称他为“血腥的艾布阿拔斯”。阿拔斯王朝之建立多依靠伊朗人的力量，故在王朝初期重用伊朗的上層人物，并模仿伊朗人的習尚，用黑色旗帜和黑色服装，故中国史書称之为“黑衣大食”。

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在位之时（754—775年），深覺大馬士革为倭馬亞家族的余党所居，是“叛乱”的淵藪，又偏在西部，从經濟上、政治上都不能控制全国；而庫法又是十叶派人的策源地；都不适于作全国的首都。故于754年开始在在兩河之間的中部、靠近底格里斯河岸建筑新都，历十五年竣工。初称“曼苏尔城”，后改称“巴格达城”，故又称該朝为“巴格达王朝”。

**西班牙哈里发王朝(白衣大食)之建立** 阿拔斯人攻入大馬士革，屠杀倭馬亞家族后，有王孙阿布篤拉合曼者，得免于难，逃到北非，托庇于柏柏人。后得西班牙倭馬亞族人的支持，于755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入西班牙和当地倭馬亞人联合起来，組織军队，成为西班牙各个阿拉伯部族的首領。原来阿拉伯自715年攻占西班牙后，虽有四十年之久，因为内部复杂，秩序始終沒有安定，也沒有建立起統一的穩固政府。各部族的首領要求把西班牙分为若干小国，各自独立，因此長期陷于紛爭混乱之中。阿布篤拉合曼利用了这一复杂的矛盾局势，借倭馬亞王孙之名，得到本族人的支持，逐漸削弱了各部族封建主的势力，使他們效忠于自己，最后統一了西班牙，以哥尔多瓦为首都。

在阿布篤拉合曼以后的二百年內，经历了七代君主，都未用“哈里发正統”的名号。因为“哈里发”一字，乃是“繼承穆罕默德”之意，而穆罕默德生时的政治、宗教中心乃是在麦加与麦地那兩地，故以后的哈里发必須“繼承”这两个“圣地”的統治权，才是“合法的”政权，才能为伊斯蘭教人承認。西班牙王朝虽建立了統一的政权，而“兩圣地”却掌握在阿拔斯王朝的手里，因此沒有取得“哈里发正統”的“資格”。自九世紀中叶以后，阿拔斯王朝漸漸衰

落，政权落在突厥人的手里。突厥人跋扈專横，視哈里发为掌上玩具，任意廢黜杀害。十世紀以后，伊朗的“布叶王朝”兴起，阿拔斯的哈里发为他們挟持，号令不出都門，各省紛紛独立，阿拔斯王朝已名存实亡。这个时期，正是西班牙中兴之期，阿布篤拉合曼建立了一个包括北非的大国，遂于929年自称哈里发，改称“阿布篤拉合曼納綏尔”。倭馬亞人尚白色服装，故中国史書称之为“白衣大食”。

**埃及法提瑪哈里发王朝(綠衣大食)之建立** 阿拔斯王朝时期，十叶派受到压迫，从伊拉克逃到北非。北非地区距离帝国中央較远，当地的柏柏人对阿拔斯的統治深感不滿，逃亡的十叶派人和他們有結合的可能。因此，十叶派在北非寻到了一个比較稳定的根据地，企图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和阿拔斯王朝抗衡。他們在突尼斯安定后，号召了各处流散的十叶派人，形成一支强大力量。到了公元九世紀，他們的領袖起来压迫柏柏人，夺取土地，占据要津。910年推翻柏柏人的艾阿立布王朝，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拥出一个自称为阿里的后裔迈赫底为哈里发。迈赫底的第四代繼承人木阿茲·里丁尼拉繼位（952—975年）之后，以攻取埃及、擴張領土为他的基本政策。当此之时，埃及处在暴君卡夫尔的統治下，尼罗河堤遭到破坏。962年尼罗河水泛滥，兩岸和三角洲田亩、村庄大半被淹沒，人民流离失所。第二年又遭到空前的大旱灾。在不断发生大飢荒、大疫癘的七年內，人民死亡达六十万之多。这种情况，給木阿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大飢荒、大疫癘的第八年（968年），木阿茲派大將哲奥西尔率十万大軍从埃及西北部进攻，沒有遭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領了亞历山大城，接着占領首都弗斯它特城。

为了要实现繼承“哈里发正統”的野心，哲奥西尔决心把埃及建成一个坚固的堡壘、兵营，俾进可以攻叙利亚和伊拉克，退可以防御多年威胁叙利亚的格拉木特人，遂决定建立一个包括弗斯它特在內的新都。先建筑坚固的城壘、城牆，在城里建筑哈里发宫，和巴格达哈里发宫相对立。又建筑著名的艾資哈尔大寺（今艾資哈尔大寺），使成为伊斯蘭教中心（十叶派中心）。新都、哈里发宫和大寺三个建筑物开始建造于970年，大体完成于972年，以后逐漸完备。

公元977年，木阿茲將北非的財富和珍貴搜刮一空，率領军队和家族，以胜利者的身份来到埃及，开始称新都为：“木阿茲的开罗”，意即“木阿茲的胜利城”。并称自己的王朝为“法提瑪哈里发王朝”，中国史書称为“綠衣大食”。它的版图包括埃及、北非、叙利亚及阿拉伯西岸，和东方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西方的西班牙哈里发王朝，成为鼎足之势，而且在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初成为三个中最强大的一个。

## 資料

## 略談明初的屯田

郭厚安

## 一

在元末明初的几十年中，由于战乱頻仍，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处是人烟稀少，土地荒蕪的景象。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sup>①</sup>；中原諸州，則是“积骸成丘，居民鮮少”、“民物凋喪，千里丘墟”，因此“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河北州县，同样是“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絕”的荒涼地区。其他如繁华的揚州，在朱元璋占領时，居民只剩下十八戶了<sup>②</sup>；江都在兵燹后，民死徙者十七八<sup>③</sup>；濠州到应天一带，則是“百姓稀少，田野荒蕪”、“骨肉离散，生業蕩尽”。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战乱后也成了“居民鮮少”、“故田数万亩，皆荒蕪不治”之区了。至于边远地区的情况，則更为严重，如洪武三年九月，河州衛指揮章正“初至河州时，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將士見之，咸欲弃去”；而云南在洪武十九年时还是“土地甚广，而荒蕪居多”的。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可說是一片荒涼景象。不想恢复这种殘破不堪的社会經济，新政权是难以維持和巩固的。正如洪武元年朱元璋在任命宋冕为开封府知府时与他說的，“今喪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sup>④</sup>。

另外，在洪武元年八月元順帝逃出大都以后的很長時間里，元的殘余势力一直威胁着明朝的北边，直到洪武二十年藍玉平定納哈出、次年又大敗脫古思帖木儿于捕魚儿海后，这才基本上解除了北边的威胁。在四川云貴湖广福建及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則一直在此起彼伏地进行着斗争。这种种族之間的矛盾，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統治，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裝来抵抗外族和鎮压国内的反抗斗争。而且，元末的农民起义，也給了明初的統治者以深刻的教訓。封建政权要能維持和巩固，便不能不适当地滿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并施行一些恢复农業生产的改良措施，以便誘使他們尽力南亩，为統治階級提供稅粮，充当奴隶，以巩固封建政权。

在明初恢复农業生产、巩固封建政权的措施中，屯田是主要的一环。

## 二

明初的屯田分为軍屯、商屯、民屯三种，而商屯实际上是民屯，也可作为軍屯的一种补充形式。

朱元璋早在元末攻克三衢时，因兵食不足，曾使兵士耕田自給，收到很好的效果<sup>⑤</sup>，“并令諸將分軍于龙江諸处屯田”<sup>⑥</sup>。到了明帝国建立以后，由于前面提到的客观情况的需要，加以元代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屯田、官田、貴族庄田和战后出現的无主荒田的存在，就更加促使他講求屯政，“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兼务，国用以舒”<sup>⑦</sup>。因此，在洪武十五年时，便出現了“天下衛所皆事垦辟”的热潮。到了永乐初年，更是“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極于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兵”<sup>⑧</sup>。

軍屯遍及全国各地，有边屯，有营屯<sup>⑨</sup>，而以边屯为重。軍士屯守比例很不一致，因时因地而异，所謂“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土田肥瘠，地方緩冲为差”<sup>⑩</sup>。一般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sup>⑪</sup>，只有个别的例外。

每个軍士屯田的数量也不一致，据明会典的記載

① 顧炎武：“日知录”，卷十。

② “明洪武实录”，卷一七六，卷十六，卷五十，卷二十九，卷五。

③ “明史”，卷一四〇。

④ 同②引書，卷十六，卷一八一，卷五十六，卷一七九，卷三十四。

⑤ 宋濂：“鑾坡集”，卷三，王郎中（愷）墓誌銘。

⑥ “續通考”，卷五，田賦考，屯田。

⑦ “明洪武实录”，卷一九三。

⑧ “明史”，卷七十七，食貨一，田制。

⑨ 顧炎武：“天下郡国利病書”卷三，北直二，屯田：“屯田有边屯，有营屯。边屯，屯于各边空閑之地，且耕且战者也。营屯，屯于各衛附近之所，且耕且守者也。”

⑩ “明会典”，卷十八，戶部五，屯田。

⑪ “明洪武实录”，卷一百。



是：每军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二十亩不等，大概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为常例，其余便要以土田的多少，各个军士屯耕的条件而定。至于土地的肥瘠，地方的缓冲等因素，也可能影响每军受田的数量。

屯田纳税的标准，当朱元璋在位时，并无统一规定。洪武四年“詔河南、山东、陕西、山西、淮安等府屯田，三年后每亩收租一斗”；二十年九月规定“屯卒种田五百亩者，岁纳粮五十石”；二十五年二月，又令陕西临洮等卫军士，屯田每岁所收谷种外，余粮以十分之二上仓，给守城军士<sup>①</sup>。这些规定，大约都在每亩纳租一斗的左右。到了朱棣即位才统一规定为：“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貯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sup>②</sup>。关于余粮的多寡，明史食货志的记载是：“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余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据此则余粮为六石。但明会典的记载则是：“（永乐）二十年，詔各都司卫所下屯军士，其间多有艰难，办纳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石外，余粮免其一半，止纳六石”；又“洪熙元年，令每军减征余粮六石，共正粮十八石上仓”。似此则余粮原为十二石，因屯军无力负担，只好减为六石。这个标准比私田是要轻得多的。但是，如果屯军在交纳正粮余粮外还有剩余时，管屯官员人等便要巧立名色分用，屯军士兵是无法享受的。

屯田所纳税粮的品种，有稻、谷、粟、蜀、秫、大麦、蕎麦等，在交纳时，俱依米为折算标准，凡粟谷糜黍大麦蕎麦二石、稻谷蜀秫二石五斗、粳稗三石皆准米一石，小麦麻豆与米等<sup>③</sup>。

明初对于屯军，一般是官给耕牛农具，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屯种去处。合用犁铧耙齿等器，著令有司搬官铁炭铸造发用，若木植，令卫军于出产山场自行采办造用”<sup>④</sup>。二十七年，遣官往光州等处买耕牛给洛阳护衛屯田军士<sup>⑤</sup>。同时，还“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谕，誅侵暴之吏”<sup>⑥</sup>。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柘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而明初对屯粮的征收。往往缓以年岁，然后才量地起科，如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命辽王府校尉军士屯种自食，与定辽等卫屯卒俱俟十年后始收其租”<sup>⑦</sup>。正由于以官方力量解决了农具耕牛问题，规定农副业生产和晚征屯赋，才有力地促进了明初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恢复。

在军屯制度建立不久便逐渐遭到败坏。首先是将校侵暴屯卒，使得军士大量逃亡。其次是豪右的霸占屯田，如宣德六年三月，“山西巡按御史张助言：大

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sup>⑧</sup>；“明史”也同样提到，宣宗之世，屡发各屯以征戍罢耕及官豪势要占匿者，减余粮之半”<sup>⑨</sup>。再其次，本来屯田有肥瘠之不同，数量之不一，而屯军本身条件也有差别，因此容易发生分化，宣德时“分辽东各卫屯军为三等，丁牛兼者为上，丁牛有一为中，俱无者为下”<sup>⑩</sup>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同时，宣德十年正粮免盘的规定，又进一步地助长了军屯的崩溃，因为“正粮纳官，以时给之，可以免贫军之花费，可以平四时之市价，可以操予夺之大柄。今免其交盘，则正粮为应得之物，屯产亦遂为固有之私，典卖迭出，頑鈍叢生，不可收拾，端在于此”<sup>⑪</sup>。正粮免盘后，军屯的特点随之消失，而屯军则与一般农民无异，因之原来就在进行着的分化、兼并便加剧起来，自然军屯也就日益败坏了。

### 三

商屯是明初的创举，所谓商屯，就是政府利用食盐专卖权，诱使商人运粮到边地去换取盐引支盐，其名为“开中”。后来有些商人为了减省运费多获盐引，便私自募集破产农民到卫所边地去垦荒生产，以生产所得粮食入仓换取盐引，这就叫商屯。

纳米中盐的办法，开始于洪武三年，当时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二百斤），商人纳米后，持引目赴所在官司兑盐。这样，既省转输之费，又使军储充足。因此，以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sup>⑫</sup>。

要多少米才能换盐一引，并无统一规定，而是由道里远近、时间缓急、米值高下、中纳者利否等情况来定其多寡的。洪武四年定了一条中盐例，即“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荊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诸仓，计道里远近，自五斗至一石有差”。以后虽时有增减，大体上仍与这个标准接近。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减轻，如洪武十三年正月，因商人纳粟靖州崇山

① “明洪武实录”，卷一八五，卷二一六。

②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田制。

③ 同上。

④ “明会典”卷二〇二，屯田清吏司。

⑤ “明洪武实录”，卷二三一。

⑥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田制。

⑦ “明洪武实录”，卷二三四。

⑧ “明纪”，卷十二。

⑨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屯田。

⑩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户部二，屯田。

⑪ “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

二衛中盐者，每米二石給准盐一引，米貴盐輕而商人稀少，故减旧則四之一以便之。二十二年九月，用兵西南，因“道里險远，餽运弗繼”，乃將川盐由每引二石减为一石五升以致商人<sup>①</sup>。使“开中”法更好地为軍事服务，对商人和政府都有好处。

按照規定，“开中”的办法是，“編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粮畢，書所納粮及应支盐数，資赴各轉运提举司照数发盐。轉运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数給与”。实际上有的商人在納粮以后，并未如数支盐，有时祖孙几代都在“守支”。宣德三年，戶部尚書郭敦說：“洪武中中盐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sup>②</sup>可見开中法实行不久就出毛病了。

根据一些材料看来，并不是凡有納米中盐的地方就有商屯，如洪武十九年正月，云南左布政使張統言：“旧例商人納米于金齿者，每一斗給盐一引，以谷准米者听，以是商旅輻輳，儲備充溢。其后有司不許輸谷，由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同时，納米中盐的地方也不固定，如洪武三十一年便決定：俟大宁、开平二衛軍儲已多时，則令商人輸粟于东胜、西河<sup>③</sup>。朱棣即位后，“以北京諸衛粮乏，悉停天下中盐，專于京衛开中。惟云南金齿衛、楚雄府、四川盐井衛、陝西甘州衛开中如故”<sup>④</sup>。另外，即使納了米也不一定能及时而如数地支到盐。因此，納米中盐虽能充实边儲，开发边地，減輕人民轉輸之劳……可是对商人却不便利，无怪乎后来他們宁願多出一点錢，也不願納米，因为这对商業資本的活动无疑地会起着束縛的作用。

#### 四

移民就寬乡、或召募、或罪徙，叫做民屯。

民屯以移民为普遍，而移民地区，很多是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地方。如：洪武三年六月，徙苏、松、嘉、湖、杭五郡民之无田产者四千余戶往临濠开种；二十一年八月，迁山西澤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諸处閑广之地置屯耕种；二十二年四月，命杭、湖、溫、台、苏、松諸郡民无田者往淮河迤南濠和等处就耕；二十五年二月，徙山东登萊二府貧民无恒者五千六百三十七戶就耕于东昌；二十八年二月，又徙青、兗、济南、登、萊五府田少之民于东昌开垦閑田<sup>⑤</sup>。明初移民的規模也是相当大的，如洪武时一次就“徙江南民十四万戶于凤陽”，直到朱棣“罷太原、平陽、澤、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sup>⑥</sup>以后，移徙的才少了。迁移无地或少地农民于荒蕪之区开垦，适当地满足了

他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便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移民外，也有自願应募屯种的，如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因为当时山西地狹民稠，有許其民分丁于山东河南曠土耕种的命令，于是山西沁州民張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戶便自願应募屯田。朱元璋命戶部賞从整等鈔，分田給之，并命从整等再回沁州召募居民<sup>⑦</sup>。一般說来，召募屯田并不像移民那样的規模大、次数多。

至于徙罪囚屯田，絕大多数都集中在凤陽一地，洪武八年二月，“宥杂犯死罪以下及官犯私罪者，謫凤陽輪作屯种贖罪”<sup>⑧</sup>。在明初的極端君主專制統治下，正如叶伯巨所說：“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sup>⑨</sup>所以在凤陽輪作屯种的罪囚是数以万計<sup>⑩</sup>。到了永乐初年又規定：“除人命、十惡死罪、强盜伤人者依律处决，其余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种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后录为良民。”<sup>⑪</sup>使罪囚輪作屯种贖罪，然后录为良民，对劳动力的利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民屯的扶持，当时的統治者是比较注意的。首先是遣官买耕牛給屯种之民，洪武四年二月，命工部遣官往广东买耕牛以給中原屯种之民；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命戶部遣官于湖广江西諸郡县买牛二万二千三百余头，分給山东屯种貧民；二十八年正月，命戶部以耕牛一万头分給东昌府屯田貧民<sup>⑫</sup>。据明会典統計，天下屯牛共有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四只，并且，洪武二十六年还規定：凡屯种合用牛只，設或不敷，即便移文索取，若官廩数多，差人发遣，若果路途遙远，此間地方出产，可以收买，务在公私兩便，就給官价<sup>⑬</sup>，因此牛只的供应是比较充分的。其次，在移民屯种时，一般都賜鈔备农具，并規定免税几年，如洪武二十一年，“徙澤潞民无業者垦河南北田，賜鈔

① “明洪武实录”，卷六十一，卷一二九，卷一九七。

② “明史”，卷八十，食貨四，鹽法。

③ “明洪武实录”，卷一七七，卷二五六。

④ “明史”，卷八十，食貨四，鹽法。

⑤ “明洪武实录”，卷五十三，卷一九三，卷一九六，卷二一六，卷二三六。

⑥ “明史”，卷七十七，食貨一，戶口。

⑦ “明洪武实录”，卷一九七。

⑧ “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⑨ “明臣奏議”，卷一，叶伯巨：“应星变求直言疏”。

⑩ “明史”，卷一三九，韓宜可傳。

⑪ “明永乐实录”，卷十二。

⑫ “明洪武实录”，卷六十一。

⑬ “明会典”，卷二〇二，屯田清吏司。



备农具，复三年”；二十二年，“徙江南民田淮南，赐钞备农具，复三年”<sup>①</sup>。所有这些措施，对民屯的生产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每份屯田是多少，并无统一规定。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大率每户给地十五亩，另给地二亩种蔬菜，有余力者则不限顷亩<sup>②</sup>。洪武初规定：复业人民，见今丁多而田少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验丁拨附，如见今丁少而旧田多者，不许依前占护，只许尽力耕垦为业。基本上是验丁授田，既保证了屯垦，又抑制了兼并。

民屯田每亩纳税多少，无明确记载。不过，从一般官田的税额每亩五升三合，以及洪武二十六年令开垦荒蕪官田俱照民田起科的规定看来，民屯田每亩税额比起私租七八斗、甚至一石以上来，那是较轻的，这与明初立法多抑富右贫的恢复生产的措施是一致的。

## 五

凡是屯田都是官田，不过，国家最关心的还是租税，对屯田只不过保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已<sup>③</sup>，因而实际上屯田军民便把屯田看作自己的私产。所以，在这种土地占有关系下的屯军和屯民，可以说相当于个体经营的小自耕农，因之，在客观上使大批失掉生产资料的农民（有些是穿上军装的）满足了对土地的要求，再加以国家有意的扶持，于是便刺激了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耕地面积的迅速增加。根据洪武实录的记载，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共垦田一百八十万三千九百余顷，几乎是洪武十四年天下官民田三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零二顷的二分之一<sup>④</sup>；而明初屯田额为八十九万二千七百零二顷，相当于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面积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零二顷的十分之一强。由此可见，明初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屯田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其次是屯田农业产量的日益增加。最初有很多屯军不能自给，每月还要领月粮，可是到了洪武中叶以后，屯军不不仅能够自给，一般地还能缴纳余粮，如延绥卫，当时有屯田三万七千七百五十六顷，粮草数盈至十多万<sup>⑤</sup>。至于民屯，最初也是比较困难的，后来也提高了生产量，如洪武二十六年，后军都督府僉事李恪、徐礼从彰德等地视察后回京报告：“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民，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所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又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右军都督僉事陈春言：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顷，屯租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十九石，棉花五百二万五千五百余斤<sup>⑥</sup>。从上可见，屯田的生产是日益向上的，屯田生产

量的增加，正是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标志。

再其次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具体体现在明初人口的不断增加<sup>⑦</sup>，残破的地方经济的迅速恢复，以及国家增收税粮的逐年递增各方面。例如叶旺、马云在镇守辽东时，“剪荆棘、立军府、抚辑军民，垦田万余顷，遂为永利”<sup>⑧</sup>；原来残破不堪的风阳，在洪武八年时便因户粮数增多而升成了上府；庄浪、河州、洮州、岷州、西宁、凉州、宁夏、临洮等八卫，原为荒凉贫瘠的边地，在洪武二十二年时却变成了米多价日减的富裕地区了<sup>⑨</sup>。正如明史所描述的：

“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这种宇内富庶的原因，明史上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即所谓“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俸餉不仰借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sup>⑩</sup>。如果没有广泛推行屯田，以“纾民力、足兵食”，使“兵农兼务，国用以舒”，要想在短时期内由残破荒凉的景况达到富裕繁盛是不容易的。

明初屯田和“开中”的实行，使元末极端尖锐的阶级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失掉了土地的农民能够重新回到农业生产岗位，为统治者的赋税提供了保证，而且对于保证军饷的供给和减轻人民赋税负担，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从而巩固了明初政权。明初养军很多，内外官军总数应在二百万左右。如果每军月粮以一石计，则全年约需粮二千四百万石，而洪武二十六年全年征收税粮不过三千二百多万石，似此，军饷就将占去十分之八，这样又怎能办到“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呢？好在“明初各镇皆有屯田，一军之田足贍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sup>⑪</sup>。朱元璋也曾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sup>⑫</sup>，

（下转第28页右栏）

①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

② “明洪武实录”，卷五十三。

③ 参阅“大明律”，户律二，田宅条例。

④ 参阅“明洪武实录”每年年终所记载之上田数字。

⑤ “明会典”，卷二十八，会计田。

⑥ “明洪武实录”，卷二二三，卷二四三。

⑦ “明洪武实录”卷一四〇载，洪武十四年有五千九百八十余万人；“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户口载，洪武二十六年有六千零五十四万余人。

⑧ “明史”，卷一三四，叶旺传。

⑨ “明洪武实录”，卷一〇二，卷一九五。

⑩ “明史”，卷七十八，卷七十七。

⑪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

⑫ “明书”，卷七十，戎马志。

## 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選輯(八)

### 关于拜占庭的农村公社

### 拜占庭帝国的农业法

耿淡如译注

“农业法”有两种俄译文：一种由李普什次(Е.Э.Липшиц)译出，刊在“拜占庭社会经济史文献汇编”，莫斯科，1953年，页103—108。另一种译文，见格拉青斯基编“中世纪史文献”卷一，莫斯科，1953年，页190—198。本译文是根据前者重译，但是遇有出入很大的条文，则根据后者加注，以资比较。

拜占庭封建关系进展的过程，是从第七世纪中期延续到十一世纪末期。这一时期可分成两个阶段：(1)从第七世纪中期到第九世纪中期，即自由农村公社占优势的阶段，当时封建制度还只是在形成的阶段，封建贵族政权还没有十分巩固，足以消灭自由农村公社；(2)从第九世纪到十一世纪末期，即封建关系充分发展的阶段，那时，封建关系已成为拜占庭的统治制度。拜占庭的农村公社维持得比较久长，反抗大领主的掠夺，也比较有力。其原因是，当拜占庭农村公社正在开始崩溃的时候，斯拉夫部族侵入，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带来了自由农村公社制度；这有助于当地农村公社的维持和巩固。所以，农村公社成为第七世纪到第九世纪时期的拜占庭农村经济生活的基本形式。

下引“农业法”并不是一种由政府制定的法律，而是拜占庭人和斯拉夫人关于农村公社的习惯法；它的出现时期约在第八世纪中期(也许在第八世纪后半期)。它是关于第七—九世纪拜占庭土地关系史的最重要资料，反映出拜占庭农村公社的生活情况，从这里可看出耕地是在公社的自由农民手里，所有未分“公地”和磨坊仍属于公社所有。农村间发生疆界争执时，公社出面进行诉讼。同时，农民有交换份地之权。土地所有者不得拆除别人在其土地上所建造的房屋。土地在收获之后，可作为牧场。另一方面，在公社里农民阶级已开始瓦解，财产已不平等。有些农民由于无力耕种而放弃自己的份地，有些农民耕种别人的土地，向土地所有者缴纳什一税。同时公社的富裕农民不仅有牲畜、劳动工具，而且有奴隶。此外，农业法中还列举各式各样的违法处分和罚款。从这法典中我们也可找到关于拜占庭农村广泛流行的谷物种植、葡萄园、园艺和畜牧等等的资料。——译者

1.凡耕种自己田地的农夫应该公平正直，不得侵犯邻人的田界；如果有人擅自侵犯邻人的份地，那么，如果他的侵犯是在开垦新地时期，就该丧失他所垦的新地；如果他的破坏疆界是在播种时期，那侵越界线的农夫就该失去种子、耕作及收成。

2.如果有农夫没有通知土地的主人擅自开垦新地播种，那么他不但不能获得在开垦新地方面所费劳力的补偿，而且不能获得所播种的收成，甚至所撒播的种子。

3.如果有两个农夫在两个或三个证人面前互相协商交换土地而获得完全协议的，他们的交换应认为是合法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

4.如果有两个农夫在播种时期商定交换土地而后来一方要退出，那么，如果已经播种，不得解除合同；如果尚未播种，可以毁约。如果退出的一方尚未开种新地，而其对方已经开种，那么，退出的一方应

即开种，然后解除“合同”。

5.如果有两个农夫交换土地，不管暂时的或永久的，而后来发觉一块土地少于其他一块，又如果关于这点未有协议，多土地的一方应以相应数量土地贴补少土地的一方；如果已有了协议，完全无须贴补。

6.如果有农夫对于正在争讼的田野(田地)，没有通知播种者而擅自去收割者，那么，如果他所提出的要求是对的，不应获得其中的任何东西<sup>①</sup>；如果他所提出的要求是不对的，应加倍缴出所收割的果实。

7.如果有两个村落对疆界或田野(田地)，发生争执，让内行人(法官)去调查，并应承认权利应归属于那占有时期较长的一方；如果有老界线存在，那么，老的占有权，认为是不可动摇的。

8.如果划定的界限，对某些人在分配上和位置上

<sup>①</sup> 另一译文作：“不应让他蒙受任何损失”——译者



有不公平情况，这项划界线可以作废。

9. 如果农夫——什一租戶<sup>①</sup>——沒有通知出租土地者而擅去收割并收集其禾捆，那末，作为小偷論，应丧失他的全部收成。

10. 租戶的份額是九个禾捆，出租土地者的份額是一个禾捆，如果不是这样分配，应受天誅地灭。

11. 如果有人从无力播种的貧农方面取去土地耕种，并經過協議，約定只开种新地和分成办法，应照合同办理；如果还有关于播种的協議，那項合同也应予以維持。

12. 如果有农夫取去土地来对分耕种，而到适当时候并不去开垦新地而只把种子撒播在地面上，他不应获得收成中的任何部分。因为他存心欺騙，糟蹋了主人的土地。

13. 如果有农夫从任何无力耕种的貧农方面領去葡萄園来对分耕种，而并不照例去剪割，也不去挖松泥土，也不去用籬笆圍上，那么，他不应获得收成中的任何部分。

14. 如果有人从离开当地的貧困的（无产者）农夫領去田地来对分耕种，而后来他改变主意，不去耕种这块田地，应繳付双倍于收成的数量。

15. 如果有人領去田地来对分耕种，而在耕种时期以前改变主意，通知田地的主人，說无力“耕种它”，而田地的主人置諸不理、那分种的农夫不应負責。

16. 如果有农夫領去葡萄園或土地耕种，并和主人協議，收取定洋，着手工作；但因为离开而放弃它、他应放弃田地上的价值和田地給主人。

17. 如果有农夫去耕种另一农夫的長着樹林的士地（森林地），那么，在三年之內他可享受土地上的收获，此后他应把土地交还给主人。

18. 如果有农夫因沒有本錢来耕种自己的田地而逃匿到外地去，那么，讓那些向國庫应負繳稅的責任者<sup>②</sup>来收集果实；后来，如果那个农夫回来，他不得向他們追索任何东西。

19. 如果有逃亡离开田地的农夫每年应付國庫特別稅的，那么，收获者和使用其田地者，应負担双倍責任<sup>③</sup>。

20. 如果有人伐除人家的樹林而沒有通知它的主人，并在那里耕种播种，他完全不应获得收获。

21. 如果有农夫在別人的荒地上建造房屋或种植葡萄園，而后来它的主人回来了，那么，后者沒有破坏房屋或拔除葡萄園的权利；但应取得一塊等值的份地，隨便要在什么地点。如果那居住在或种植葡萄園在別人土地上者拒絕給予等值的份地，那么，土地的主人有权拔除葡萄園或破坏房屋的权利。

22. 如果有农夫在耕种的时候，偷窃种子或鋤头而后来被認明，那么，他应繳付每天十二“福尔”<sup>④</sup>的罰款。在同一时候，偷窃花园刀者，或在收获的时候，偷窃镰刀者，或在伐木的时候，偷窃斧头者，应受同样处分。

23. 如果有牧人早晨牽去农民的牛并把牛放諸畜群中，又如果发生牛被狼咬死的事情，他应把死牛交給牛主人看，而他本人应認为无罪。

24. 如果放牛的牧人失去（牛），而在失牛的同日并没有向牛主人报告說：“我看見这条牛到某某地点去，至于发生什么事故，我不知道”；那么，他应負这条牛的责任。如果他已报告过，他可不負責任。

25. 如果牧人早晨牽去农夫的牛，而这条牛因为落在畜群的后面，走入耕地或葡萄園而发生損害（踐踏田野）事情，那么，牧人可不丧失雇用工資，但須賠償所有的損害。

26. 如果牧人牽去农夫的牛而这条牛变为杳无消息，那么（牧人）应对神发誓，說沒有虐待过这条牛，也沒有参加过杀死它；于是他可不負損害的责任。

27. 如果牧人早晨牽去农夫的牛，当时这条牛很健而完全无恙，后来发生这条牛受伤失明事情，牧人应发誓，說沒有虐待过它；于是他可不負損害的责任。

28. 如果牧人已經发誓，說对于牛的死亡、受伤或失明事情，他沒有过错，而后来有兩三个可靠証人揭发他曾把牛杀死，那么，应割去他的舌头并要他賠償牛主人的損失。

29. 如果牧人用其手里的木棍把牛打死、打伤或使它失明，那么，应（認为一原注）有罪，并应負損害責任；如果用投石而造成这种事故，他应認为不負責任。

30. 如果有人截去牛或羊身上的鈴而被認知，作小偷論，加以鞭撻；如果家畜因此失踪，那盜鈴者应付賠償。

31. 如果树木長在耕种的份地上（另一譯法：村落里）。又如果附近的份地是花园而在花园里罩着附近树木的影蔭，那么，樹主人应砍去樹枝；如果那里沒有花园，就无須砍掉。

① 什一租戶（МОРТИТ）是繳付收获的十分之一給土地所有者的租戶。——譯者

② 按拜占庭农村公社对繳納賦稅，負連帶責任，那放弃的土地的稅款，也由公社負担。——譯者

③ 另一譯文作：“如果农夫从其土地上逃亡出去，讓那些收获者，就是使用其土地的人，每年付稅于國庫；如果不付，应向他們双倍征收”。——譯者

④ “福尔”（Фолл）是拜占庭最小單位的貨幣名。

32. 如果树木原由某某人种植,而后来由于划界关系归到别人的部分内,除种树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有处理它的权力。如果份地的主人呼吁说,我感到这树的不方便;那么,他应该以另一棵树给予种树者,作为交换,而取得它。

33. 如果有看花园人在其所看守的地点进行偷窃而被捉住,那么,他应丧失其工资,并应受痛打。

34. 如果有雇佣牧人瞒着牲畜的主人,挤乳出售〔牛奶〕而被捉住,他应挨打,而其工资应被取消。

35. 如果有人偷窃人家的麦秸而被捉住,他应加倍归还麦秸。

36. 如果有人牵去牛或驴子或其他任何牲畜,没有通知它的主人,而出去做生意,应付双倍租用费。如果发生牲畜死亡在路上事情,不管怎样,应以两赔一。

37. 何果有人牵牛去做工而牛死去,那末,让内行人〔法官〕去调查;如果牛死在它应该担任的工作上,(牵牛去的人)不应受罚。如果死在其他工作上,他应以一头完全壮健的牛作为赔偿。

38. 如果有人在葡萄园或田野或其他地方看到牛〔驴或羊——译者加〕在践踏田禾时,并不把牛送交其主人,来要求他付给损害果实的赔偿,而把牛杀死或打伤,那么,他应以牛赔牛,以驴赔驴,或者以羊赔牛。

39. 如果有人在密林中砍伐树木的时候,没有留心,树干倒下把牛或驴子或任何其他牲畜压死,他应该以一头赔一头。

40. 如果有人在砍伐树木的时候不小心地抛下斧头,杀死别人的牲畜,他应付给赔偿。

41. 如果有人偷窃牛或驴子而被揭破,他应赔偿所盗的牲畜及那些牲畜所应做的全部工作①。

42. 如果有人企图盗窃牛群中的一条牛,因而被驱散的牛群被野兽吃去,那犯罪人应受挖去眼睛的处罚。

43. 如果有人出去赶回自己的牛或驴子而在驱赶时把人家的和自己的牲畜赶在一起,但并不把人家的和自己的牲畜一道赶回,因而发生人家的牲畜死亡或者被狼咬死的事情,他应该以一头对一头赔偿那牛主人或驴主人。如果他已通知并指明地点,说明他实在没有办法来保持这牲畜,那么,他不应负这损害的责任。

44. 如果有人在密林里捉住一条牛,杀死它并把死牛占为己有,那么,他应受割断手的处罚。

45. 如果有奴隶在密林里杀死一条牛或羊,或猪,那么,他的主人应赔偿这牲畜。

46. 如果有奴隶为要于黑夜偷窃勾当,把羊棚内的羊赶走,又如果因此发生羊的死亡或者被野兽吃去事情,那么,他作为杀人犯论,应处以磔刑。

47. 如果有奴隶常常在夜里偷窃牲畜,因而发生畜群死亡事情,他的主人作为知道奴隶犯罪者论,应负损害的责任。对于奴隶本人,应处以磔刑。

48. 如果有人看到践踏田禾的牛,并不把它送交其主人,而割去它的耳朵,或挖去它的眼睛,或割去它的尾巴,那么,牛主人不该收受它。而应取得另一条牛作为它的替代。

49. 如果有人找到小猪或者羊或者狗在践踏田禾,第一次他应交还这畜牲,此后,第二次交还时,他应向它的主人提出警告,在第三次发生同样事情时,他可割去牲畜的耳朵或杀死它;他不应该认为有罪。

50. 如果有牛为要走入葡萄园或花园而滚入葡萄园或花园沟渠中,因而死亡,那么,花园主或葡萄园主不应认为负有责任。

51. 如果有牛或驴子为要闯入葡萄园或花园而倒毙,在篱笆上,葡萄园主或花园主不负责任。

52. 如果有人〔在收集〕果实的时候设立陷阱,又如果有狗或猪跌入其中,因而死去,那么,那陷阱主人不负责任。

53. 如果有人在收取第一或第二次践踏田禾的补偿后,不把牲畜送交其主人以取得补偿,而把它杀死,他应赔偿所杀死的牲畜②。

54. 如果有人关住人家的猪或狗而杀死它,他应付双倍赔偿。

55. 如果有人把牧人的狗杀死而秘不报告,又如果发生野兽袭击牲畜圈事情,此后那杀狗的人被认知,那么,他应赔偿所有被杀的牲畜以及那狗的价值。

56. 如果有人放火焚烧自己的树林或田野,而发生火蔓延烧及住宅或生长果实的田野事情,又如果他不在烈风之下进行这事,他应不受处分。

57. 如果有人焚毁人家的小邱〔疆界〕〔另一译法:树林〕或砍倒人家的树林,他应付双倍赔偿③。

58. 如果有人焚毁葡萄园的篱笆,他不仅应受鞭笞和他的手应盖上烙印,而且应负加倍赔偿损害的责任。

59. 如果有人砍倒或“连根”拔去人家的生果实

① 另一译文作:“……他应双倍赔偿牲畜及其全部工作,并应挨打”。——译者

② 另一译文作:“如果有人碰到第一第二次践踏田禾事情,杀死牲畜,而并不把牲畜送交其主人以取得践踏田禾的补偿,他应付赔偿于被杀牲畜的主人”。——译者

③ 本条文末有一补语:“而且他的手将盖上烙印”。——原注。



的葡萄藤，他应受割断手的处分并负赔偿损害的责任。

60. 如果有人收获的时候闖入人家的田地内，偷窃（另一译法：收割）禾捆或禾穗或豆荚，他应剥光衣服遭受鞭撻。

61. 如果有人闖入人家的葡萄園和无花果林中为了吃食（果实）他应不受处分，但如果为了偷窃，他应剥光衣服遭受鞭撻。

62. 如果有人偷窃犁或犁头或牛轡，他应负损害的责任，从偷窃那天起，计算日子，每天须付十二“福尔”的罰款。

63. 如果有人焚毁或偷窃人家的車輛，他应付双倍赔偿。

64. 如果有人由于敌对报复投擲火把于打谷場内或草堆上，应把他投入火内焚燒。

65. 如果有人把火把投入堆于草或儲谷皮（麦秸）的小屋里，他应受割手的处罚。

66. 如果有人擅自破坏人家房屋或者損毀圍牆，以便自己筑造圍牆或房屋，他应受割断手的处罚。

67. 如果債戶为了支付利息把田地交出，而后来发觉債主享受这田地的收穫已在七年以上，那么，法官应进行核算这七年及以上的所有收益，并把其中的一半作为归回本金。

68. 如果有人在倉庫里偷窃人家的谷物而被捉住，他应受鞭撻，第一次一百鞭子并付損害賠償于被窃者，如果第二次被发现，他应被鞭撻并处以双倍贓物的罰款；如果再有第三次偷窃，他应被挖去眼睛。

69. 如果有人在夜里偷窃甕里或桶里的酒，他应受和上項相同的处罚。

70. 如果有人使用縮小的度量来衡量谷物和酒，作为背信論罪，他应受鞭撻。

71. 如果把牲畜交給奴隶牧畜，沒有通知他（奴隶——原注）的主人，而后来（另一译法：所以）奴隶把牲畜出售或用任何其他方法把牲畜弄死，那么，奴隶和他的主人都不負責任①。

72. 如果奴隶在主人知情之下，接受牲畜，无论什么方式，而后来把牲畜吃了，或用任何其他方法把它们消灭，那么，奴隶的主人应赔偿那牲畜主的損失。

73. 如果有人在路上遇到受重伤或被杀的牲畜，而由于惻隱之心，走向其主人报告，而主人怀疑这项損害就是这报告人所干的。那么，关于受伤的牲畜，报告人应赌咒发誓，关于死的牲畜，他不应受审讯。

74. 如果有人被查明曾杀死人家的牲畜，不管什么理由，他应赔偿牲畜主人的損害。

77. 如果有人用毒药杀死那看守畜群所必需的狗，他应被鞭一百鞭子并付双倍狗价給狗主人；又如

果后来发生畜群毁灭事情，那么，那凶手，作为杀死警犬論罪，应赔偿所有的損害。而且应查明狗种：如果它是一只猎犬，照上項規定办理，如果它是像我們尋常所看到的一只普通狗，那么，只〔应赔偿〕狗价了事。

76. 如果有兩犬正在打架，而其中一犬的主人用刀劍，或木棍，或石头打击其他一犬，又如果因此被打击的狗变为失明或者死亡，或遭受任何其他損害，那么，那凶手应付賠償給那条狗的主人。

77. 如果有人畜着一条凶狠的狗，而当它正在对其他的狗信发怒的时候，他就唆使这凶狠的狗去咬那些柔弱的狗，因此发生某一只狗受伤或死亡事情，那么，他应赔偿那条狗主人的損失并应受鞭十二鞭子。

78. 如果有人在邻人的份地尚未收穫的时候，先进行自己份地上的收获并放牧其牲畜，因而使其邻人遭受損害，那么，他应受鞭三十鞭子并赔偿受害人的損失。

79. 如果有人在很多果园里尚未摘下果实的时候，而在自己的葡萄園内采集果实，并放牧自己的牲畜，那么，他应受鞭三十鞭子并赔偿受害人的損失。

80. 如果有人正在和别人爭訟的时候，擅自砍去葡萄藤或任何其他树木，他应受割断手的处罚。

81. 如果有一个住在村庄里的人認為公社土地（直译：公地）适合于建造磨坊因而占有該地，又如果后来在建造工程完成之后，农村公社（另一译法：公社成員）通知磨坊主人說，他侵占公社土地（直译：公地）；那么，他們應該交还他一切应付的建築費用，并和原建造者一起成为共有人。

82. 如果有人在村庄土地划分之后找到在其自己的份地上有适合于建造磨坊的地方，并进行此事，那么，領有其他份地的农夫对这磨坊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之权。

83. 如果灌注入磨坊的水流破坏耕地和葡萄園，那么，（另一译法：插入磨坊主）应付損害賠償；如果不付賠償，应取消磨坊。

84. 如果耕地所有者不願水流經過其份地，他們應該享有这项权利。

85. 如果农夫在看到人家的牛正在踐踏別人的葡萄園的时候，并不通知它的（牛的）主人，而为要驅赶它，把牛杀死或使牛周身受伤，那么，他应赔偿一条健壯的牛②。

（譯自柯斯敏斯基編：“拜占庭社会經濟史文献匯編”，莫斯科，1953年，頁103—108）。

① 另一譯文作：“奴隶和他的主人应負責任”。

——譯者

② 上引的另一譯文，共有91条，本譯文只有85条。



# 讀史參考



## 花紋与实物史料\*

韓壽萱 寫文

陳長虹 插图

現代历史科学于文献史料之外还必须輔以实物史料，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关于文献史料，凡历史研究工作者或历史教学工作者，都了解它的重要性，都能予以重視，但对实物史料的重要性则还有些人認識不够，因之在研究上或教学上就不能給以足够的重視或运用，这是我們今天史学界必須改进的重要环节之一。

实物史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証史、补史与扩大文字的历史，苏联在这一方面的先进經驗就是有力的說明。在苏联，考古学已成为历史科学的組成部分，并已列为历史系必修課程。苏联历史学家这种重視和运用实物史料的先进經驗，是值得我們很好地學習的。

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馬迁，在他的旅行里，經常注意参观历史文物和历史遺迹，为他的历史著作打了良好基础。宋代的历史学家鄭樵在他的“通志”里特列了图谱略，这是他重視实物史料的具体表現，他在“通志”里曾扼要地指出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的关系，他說：

“图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图植物也，書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須而成变化。見書不見图，聞其声不見其形；见图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图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書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書；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sup>①</sup>

近人王国維也曾指出两种史料的密切关系，他說：

“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

文字古器之学，与經史之学实相表里。”<sup>②</sup>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認識到实物史料的重要性，在研究上与教学上都不容忽視。因此，學習实物史料的門徑，便成为很迫切的問題了。

实物史料的研究，實質上是古器物的研究。古器物的研究，不外形制与花紋兩者的學習問題。形制的學習一般說来还没有什么困难，而花紋的學習則比較复杂、比較陌生。因此學習花紋是了解与运用实物史料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性問題。

我們在花紋的學習上是有困难的，这种困难是由于史籍文献中缺乏图谱所造成的。鄭樵曾着重地指出过这一点：

“汉初典籍无紀，刘氏（即刘歆刘向）創意，总括群書，分为七略，只收書而不收图。艺文之目，遞相因襲。故天祿閣台，三館四庫，内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图，自此萎地。后之人慕刘班之不暇，故图消而書日盛。……至今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書具在，而图无傳焉。”<sup>③</sup>

史籍中缺乏图谱这仅是造成我們今天學習花紋的困难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历代知識分子本身脫离生产、脫离实际，專为統治階級服务，对于劳动人民所創造的花紋，不感兴趣，而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點来看一切。我国本有極其丰富的資料

\* 本文完成后，承史樹青同志在百忙中校閱一过，并有正是处，謹在此致謝。

① 鄭樵：“通志”卷七十二，万有文庫本，第837頁。

② 王国維：“海宁王靜安先生遺書”第十二册。“觀堂別集”卷四，第2—3頁。

③ 同①。



和左圖右書的優良傳統，但他們不肯學習、不願接受。例如過去的研究者多限于銘文方面，因此以往关于金石圖錄一類的書籍，对于實物的花紋很少注意，就是不重視花紋的具体表現。自解放以後，这种情况已開始好轉，不过限于時間還仅仅是一些資料的收集或在論文里涉及而已，对花紋系統地、概括地、總結地進行研究，須待我們今后的努力，在這篇短文里，只是談談個人对于花紋的一些体会和學習的方法。

### 一 花紋的重要性

實物的花紋，有的称之为“文樣”也有用“圖案”的名称，再古典地來說，便有“紋鏤”或“綉繪”等不同的名称。它的应用最广，常見于陶器、銅器、漆器、織物、石刻、磚瓦、瓷器以及竹木等。总的說來，花紋是适应人們生活的需要。我們的祖先对于这点早已提到，荀子說：

“彫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sup>①</sup>

呂不韋也曾有同样的意見：

“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sup>②</sup>

我們的服飾、用具以至建筑等，随时都可看到花紋，可見花紋和我們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一切花紋都是結合生活上的需要。同时我們还必须指出花紋的产生，都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實踐里，由于生产工具的逐步改进，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之后，用他們的智慧創造的，他們积累經驗，逐步提高，日趨完善、純熟，終于发展成为裝飾艺术。而花紋本身則反映了人民文化生活的逐步提高，社会生产水平的逐步上升，以及一定时代的社会思想意識。因此只有对花紋有了認識之后，才能充分地認識和深刻地了解实物史料的意义，从而結合文献史料，更好地研究和揭示历史的发展規律，使历史成为生产者的历史，劳动人民的历史。

实物花紋所反映的这种事实，已在我国历史里得到了充分的証明。在我国的原始社会里由于当时的生产工具——打制石器——得到了改进，成为磨制石器，生产力提高，我們祖先在生产實踐中才能創造了陶器，才有了彩陶，而原始花紋因之出現。这些花紋总的說是属于几何图案的范畴，不外是由直綫、曲綫、平行綫、方格紋、斜方格紋等組成，而有关于植物、动物和人首的花紋，則是極少数的。到了青銅器时代，生产工具得了进一步的改善，生产力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青銅器、白陶和骨器、玉器等都出現了。这时的花紋，也有了新的发展。在几何图案方面，有了雷紋、圓渦紋、圓帶紋、鱗紋、瓦紋和环紋等較為复杂的花

紋，更重要的是饕餮紋、夔紋、蟬紋、龙紋、魚紋、鳥紋、凤紋，以及鹿紋等<sup>③</sup>。这些花紋，反映着人类在生产實踐中对自然的認識和对周圍生物的接触，都有了扩大。春秋时期，鉄器出現，到了战国便有了鉄質生产工具的鑄范，可見战国时期鉄工具普遍使用，生产力得到了一大跃进。在傳統的陶器、銅器、玉器之外，出現了琉璃器、漆器和瓦当等新器物。这时的器物不但在形制上起了变化，花紋也起了急遽的变化。在几何花紋方面，有斜方格点紋、浪花紋、陶紋、貝紋、三角窃曲紋及圓花紋、三角云紋以及斜方花紋等，还有新出的蟠虺紋、兽紋、蝠紋等<sup>④</sup>。更重要的是在这时的末期，出現了車騎紋、狩猎紋以及反映舞蹈、宴会及建筑等生活情况的花紋。总的說來，这时的花紋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向着写实方面迈进<sup>⑤</sup>。这就更具有史料的价值和意义了。汉代由于冶鉄的发达和牛耕的普遍使用，生产力又得到了一个大跃进。这时期的器物，除了銅器、玉器、漆器之外，我們还看到大量的絲織物、画像石、画像磚以及新穎的釉陶。这时期的花紋，繼承了战国以来的傳統，更向着写实的途徑发展，例如：車騎、狩猎、人物、建筑和鋪首等更为普遍了；四神羽人等花紋也产生了；而文字在这时的图案化則又起着裝飾花紋的作用。关于神話、傳說、历史故事、社会生活以及当时生产等画像磚石，更是汉代的宝贵史料，而几何式的花紋当然也是更为丰富多采了。汉代以后的花紋，也不外这一規律。从此可見花紋對我們了解实物，認識实物的巨大作用，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通过花紋来理解实物史料，更进一步与文献結合，以說明历史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們还必须指出花紋是劳动人民的艺术創造，是我們艺术遗产的宝库。我們必須尊重它，研究它，經过去粗取精，发揚光大，以改进我們的工艺品，提高我們的民間艺术，在我們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設中要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从这点來說，我們也不能忽視花紋的重要意义。

### 二 关于花紋的特性

我們既認識到花紋的重要性，那末我們就必须學習它、研究它，就应先求掌握花紋的特性，据个人的理解，有下列的三方面：

① “荀子集解”卷十三，“勸學篇”。

② “呂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覽”。

③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99—135頁。

④ 同上書，第135—156頁。

⑤ 商承祚：“長沙出土古代漆器圖案集”，序文。

### (1) 花紋的共同性

如前所述，花紋既是反映一时代的生产水平，既是反映一时代的社会意识，那末一时代的花紋就一定表现有它的共同性。我们知道花紋在一定程度上，虽受到所用工具、质料以及制法的影响，而各有特殊的风格；但在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却存在着共同性。殷代的白陶、铜器与骨刻，是三种不同的质料，而它的花紋，却有着共同性，如雷紋、饕餮紋见于铜器，也见于白陶和骨刻，波形雷紋和三角雷紋见于铜器，也见于白陶器。周代的新兴花紋如环紋，出现于鼎、匜、盘、簋及簠等各器物，而饕餮紋不只见于铜器也见于瓦当。到了汉代车骑的花紋见于良錯車馬漏壺、画像磚以及其他石刻如武梁祠和沂南古画像石墓等；而鋪首见于画像磚、釉陶器、铜鍾和画像石里。唐代的碑側每刻蔓草紋，而铜鏡的背面也有蔓草紋帶；铜鏡背面有宝相花，而敦煌的藻井也有同样的花紋。由此可见，一时代的花紋，因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社会意识的影响，必然有它的共同性。我们从这点不只可以鑑定古物的时代，同时也对于这类的实物有所了解，因之对于实物史料的意义也有了認識。

### (2) 花紋的繼續性

我们知道花紋是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凡是人民大众所喜见的就都有它的繼續性，即这一代人创造后，下一代的人繼承傳統，进而发扬光大，使它更完善，遂形成我们的艺术宝库。如龙的花紋，始于商代和周的铜器；到了汉代，龙紋见于武梁祠的祥瑞图，也见于瓦当；东汉末至六朝間，龙紋见于铜鏡；唐代繼之，铜鏡的背面也有龙紋，如唐龙鏡，唐云龙鏡等；宋代的龙紋，不只见于瓷器，在建筑上也有；元代龙紋也见于铜鏡；而明清兩代的龙紋，更广泛地使用，见于瓷器、漆器、服飾及建筑等，更是不胜一一举出。由此可见，龙的花紋，从商代至清代，迄未中断，是繼續发展的。凤鳥的花紋，大致与龙紋相同，也是起于商代，一直到了清代，有很长的历史，见之于铜器、漆器、瓦当等。魚的花紋，也是起源于商，“博古图录”里會有以下的說明：

“古之制器，以魚为飾者多矣，商有魚敦，周有魚尊，又有魚簠”①。

此外见于著录者尚有周魚額、周龟魚尊、周魚尊、周匜盘、周魚兽紋盘，容庚教授在周匜盘的解釋里說：

“銘魚形十三，环列腹内。盘承水之器，故繪有魚龙之紋于其中，汉洗多作双魚紋，盖导源于此。”②

实则双魚的花紋，已见于周代“博古图录”曾載有周双魚尊，以双魚为飾；战国时的双魚紋更进而見

之于陶器，如墨繪紋陶豆和水禽魚紋陶壺，可見魚紋的盛行；到了汉代，双魚的花紋每见于铜洗，也见于铜羽觴中；唐代的瑞图鑑的背面紋飾里有比目魚；1956年湖南長沙发现了宋代龙泉双魚瓷碟；明代瓷器的花紋有双魚、三魚等；清代对于魚紋常結合“吉庆有余”的图案而用之。可見魚的花紋，是多么受到人們喜爱，多么广泛地被人使用。

鋪首的花紋，又是一個例証。由于受人們的喜爱，在它出現之后，繼續发展，广泛使用，直到明清。据今日古物的遺存，鋪首的花紋，始見周仲競簋和周举伯敦；战国时期的



圖一 鋪首

摹自王振鐸著汉代画像集錄

见于長沙出土的云紋壺和武英殿旧藏的猪壺，輝县发掘时，也发现了不少的鋪首；到了汉代，鋪首的花紋开始广泛地使用，見之于铜器，如鍾、壺、觚、簠等器，而画像磚（画像磚）上也有鋪首的花紋，陶器也不例外。同时也见于石刻，且用之于門戶，門戶使用这种紋飾，直到明清，宋代李誠的“营造法式”里特別列出，永以为例。六朝到唐代的石刻里，都可找到鋪首的紋飾；宋代除了建筑之外，我們还能在瓷器里看到这种花紋，如龙泉窑兽首水丞、官窑兽耳方壺及蓮花龙耳兽环壺等，此外铜器上也有鋪首的花紋；明清兩代繼續了这种傳統，我們在故宫博物院里的門戶上如天安門和午門等，都可看到这种古老悠久的紋飾（插图一）。

以上举出龙紋、魚紋和鋪首紋三种常見的花紋說明花紋的繼續性，但这只是一般的來說。花紋的发展是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而发展，它經常有新的产生。另一方面也經常有旧的死亡。只有人們所喜爱的、艺术性較强的才有其繼續性。如饕餮紋盛行于商、周兩代，但汉以后除了仿制品外，便少見了。狩猎紋产生于

① “博古圖錄”卷二十六，第二十頁下。

② 容庚：“武英彝器圖錄”，第85—86頁。



战国,汉代盛行,唐代繼之,唐后便少見了(插图二)。宝相花的紋飾初見于唐代的銅鑑,宋代除了瓷器之外,还把它推广到建筑的彩繪上去,明代进一步用之于刻絲。八吉祥的綜合性的紋飾,盛行于明清,明代絲織物中有八吉祥綾,瓷器中有八吉祥高足括,清代絲織、木刻与瓷器中都用之。

总的說来,花紋是有它的繼續性,但在它的发展过程

中,一些花紋受到淘汰,同时又有新的花紋不断产生。即在其繼續中,而各时代仍表現其特有的風格。因之使这一座宝库日益丰富,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財產,今后我們应根据这一基础,經过研究,使我們对于实物史料有进一步的認識,还可推陈出新吸取精华,以发揚我們社会主义的新艺术。

### (3) 花紋的产生及其象征性

花紋的产生,既是由劳动人民在他們的生产过程中,根据他們向自然斗争与社会生活的經驗而创造出来的,那末它們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反映劳动人民对自然的認識,与社会意識的感受。但以时代的久远,已不易理解,考古学的資料,尚待研究整理。宋代的考古学者,虽有說明,但因限于历史条件,多所附会,不能适应我們的需要。茲就現在个人所能理解的,作初步的分析与解釋:

(一) 几何式的花紋,主要是由劳动人民对自然的認識而产生的,如云紋、雷紋、波紋等。还有他們在生产中对于所熟悉的产品,吸取精华,用之于花紋的,如繩紋、編織紋、方格紋、斜方格紋、三角紋等便是。这类花紋产生最早,由簡單漸趋于复杂,随着时代而变化发展。

(二) 动物和植物类的花紋,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与动物和植物的接触而产生的。由于人类的进步,接触而扩大,征服和認識的对象日多,这类花紋也逐步丰富起来。如蟬紋,魚紋、鳥紋、虎紋、鹿紋、羊



圖二 狩猎紋

摹自容庚著宝璽楼彝器圖錄

紋、鶴紋以及植物方面的四瓣花紋、樹狀紋、叶狀紋等,这类花紋,由少到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向写实方面发展。

(三) 人类的生活、历史故事、神話傳說的花紋,这类花紋,最早的就是战国时期新兴的狩猎紋,以及輝县出土的銅鑑和長沙出土的漆奩的花紋。到了汉代,武梁祠的画像石刻,不只有历史的故事,而且还有关于远古的神話和傳說。正如“文选”里王延寿的“魯灵光殿賦”里所說的:

“上紀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嬖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叙,惡以誠世,善以示后。”<sup>①</sup>

此外,还增加有本人的生平行事,类于后世的行述或哀啓,且有將生产情况如前述的农耕图等作为紋飾,都是最足珍貴的实物史料。

(四) 宗教的花紋,有起源于本国的,有随印度佛教傳入的,如汉代的西王母、东王公、羽人之类,皆由汉代的神仙方士之說,而反映于艺术。如蓮花、宝相花以及飞天等,都是因佛教而流行的。此类宗教的花紋,也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增多,唐代的花紋,特别是銅鏡的花紋,可以說明这点。

(五) 文字的花紋,实即文字图案化,用来作紋飾的。这种花紋最早的就是秦汉瓦当上的文字,也就是以文字而起花紋作用的范例(插图三)。此外如寿字、福字、囍字,不只流行于絲織物,而且見之于木刻、建筑等各方面。



圖三 汉長樂未央瓦当

摹自程敦著秦汉瓦当文字

① “文选”第四册,中华書局本,第12—13頁。

(六) 象征性的花紋，在封建社会里，統治階級为了追求“長生不老”、“長乐未央”等奢望来巩固其統治的特权，因之产生了象征性的花紋。这一类花紋，愈至近代而愈多，到了清代，可以說是达到了高峯，茲选择一些典型的例子，分述于下：

甲、文字方面的象征：双魚的花紋盛行于汉代，其后仍然繼續不断，直到清代，我們仍可在銅鏡的背面看到。它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到底它象征什么？“博古图录”对魚的解釋，有好几种說法，其中比較正确的一种說法是：

“……魚醢物之属，又为丰年众多之兆，故詩言众維魚矣，实維丰年，古之以多为貴者，莫不取此。”<sup>①</sup>

因汉人每喜通过假借轉注的手段，来象征其願望，当时的銅洗、銅盘等器物，飾以双魚，即象征其在私有财产上的倍加有余（插图四）。还有汉人在銅洗上喜



圖四 汉君宜子孙洗  
摹自端方著陶齋吉金錄

用羊的花紋，馮云鵬曾指出它象征的意義說：

“此器画羊，取吉祥之義，以为祝。”<sup>②</sup>这也是因为“羊”“祥”同音，而取羊做祥的象征。汉人还喜用鹿的花紋来象征他們“高官厚祿”的願望，我們可以在李翕胆池五瑞图和武氏石室的祥瑞图里看到鹿的形象<sup>③</sup>。唐人也有这样实物，如連生貴子鏡，它的背紋是双嬰立于蓮上，因蓮通連，取之以象征其“多男子”的願望（插图五）。至于宋代的实物，我們看到“太平有象硯”，这硯底刻有泰卦，下有一象，硯的形狀如瓶，泰太同音，而瓶与平又同音，下刻了象，合之則成“太平有象”的吉語<sup>④</sup>。宋代以

后，这类的花紋更多，如用月季花和二鶴的形象，以表示“月季双安”等，又如以蝠与福同音，遂以蝙蝠来象征福，如“五福捧寿”的花紋，便是一例（插图六）。这都是通过文字的同音，以象征其願望。



圖五 連生貴子  
摹自梁上椿編岩窟藏鏡補遺



圖六 五福捧寿  
摹自李杏南編小品織綉圖案集

乙、实物方面的象征：这种花紋，是通过一定的实物，象征某种階級社会的願望，如以牡丹象征富貴，

① “博古圖錄”卷十八，第14頁。

② 馮云鵬：“金索”，雜器。

③ 馮云鵬：“石索”二，碑碣；“石索”四，武梁祠下。

④ 項元汴：“历代名畫圖譜”，圖八。



石榴象征多子，桃代表长寿。汉代的四神，也属于这类，四神即代表四方之神，也就是东西南北四方位的象征（插图七）。



圖七 四 神

摹自岩窟藏鏡第二集四神規矩鏡

“汉書”“天文志”說：

“东宮蒼龙，…南宮朱鳥，…西宮咸池（按即白虎），…北宮玄武。”①

曹植的“神龟賦”里也說明四神代表四方：

“蒼龙虬于东嶽，白虎嘯于西園，玄武集于寒門，朱雀栖于南乡。”②

“三輔黃圖”里也有同样的記述：

“蒼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③

从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什么是四神的象征。这四神里的龙虎是我們所熟悉的，无須解釋，至于朱雀与玄武，梁上椿曾解釋說：

“朱雀一称朱爵或朱鳥，似即凤凰之流。玄武为龟蛇相配。埤雅謂龟无雄，与蛇相近，龟蛇合謂之玄武。說文亦謂龟与蛇之头形同，以蛇为雄。”④

这类花紋在汉代的銅鏡上、瓦当上常見之，唐鏡里也有四神的花紋，石刻中如墓志石也有四神的花紋，唐后仍有四神的花紋，可見其流行之久。此外我們再举佛教的八吉祥以示例：

佛教的八吉祥的飾紋成立于元初⑤，盛行于明清，可釋之如下：

- 一、法螺：佛說具菩薩果，妙音吉祥之謂。
- 二、法輪：佛說大法圓轉，万劫不息之謂。
- 三、宝伞：佛說張弛自如，曲复众生之謂。
- 四、白盖：佛說徧复三千，淨一切药之謂。
- 五、蓮花：佛說出五濁世，无所染著之謂。

六、宝瓶：佛說福智圓滿，具完无漏之謂。

七、金鈴：佛說堅固活潑，解脫壞却之謂。

八、盘長：佛說廻环貫徹，一切通明之謂。”⑥  
这类花紋見之于服飾，也見于木刻織造等，虽多产生于近代，而流行却广（插图八）。清代皇帝的衣服，有采取这些吉祥花紋的，在民間也乐于使用，形成了一种社会的風尚。



圖八 八吉祥

摹自李杏南編明錦

总之，花紋在实物史料上和民間艺术上，都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在旧社会里，知識分子一般地說來多是重視文献，忽略实物，对于与实物史料有着密切关系的花紋，更少注意。自解放后，旧史学的观点受到批判，而劳动人民所創造的花紋，也逐漸地引起重視，而花紋的收集，也逐漸增多，但系統地研究，还待开展，因此以上所述，只是个人的一些初步的不成熟的意見，作拋磚引玉的尝试。

① 班固：“前汉書”卷二十六，天文志第六。

② 曹植：“曹子建集”卷四，四部丛刊本，第1頁。

③ “三輔黃圖”卷一，平津館丛書本，第10頁。

④ 梁上椿：“岩窟藏鏡”第二集，中卷，第3頁。

⑤ 袁野道子：“明初9景德鎮瓷器”，第20頁。

⑥ 高木英彦：“支那綢緞考”，第61—62頁。

### 三 怎样学习花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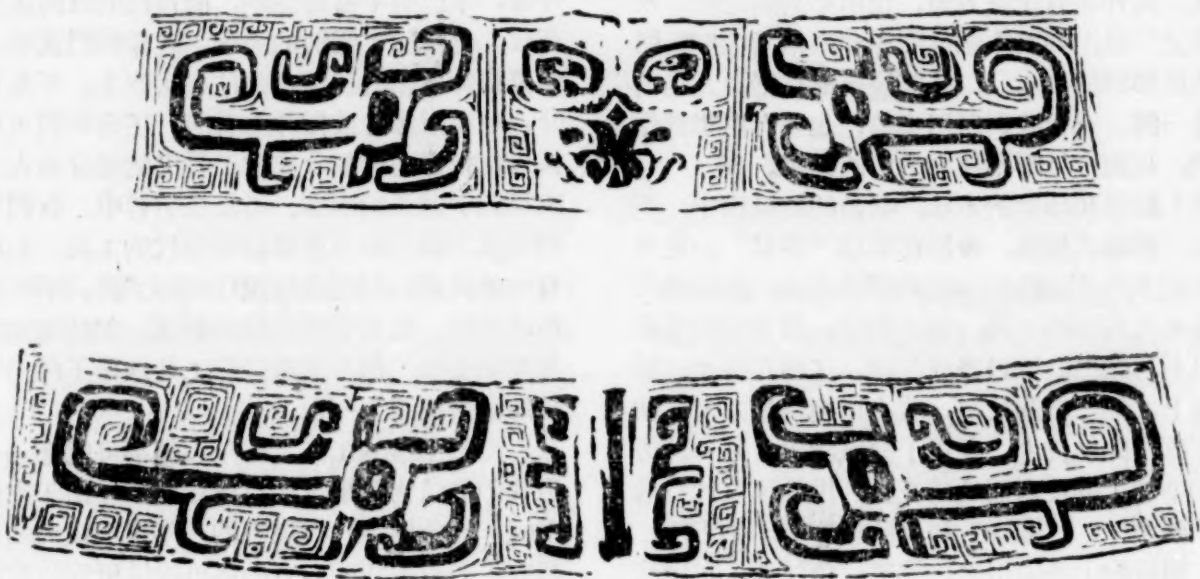
我們为了掌握实物史料，就必须学习花紋，茲以个人所見，分述于下：

#### (1) 花紋的單元

我們学习花紋，首先应找出这一花紋的單元，确定范围，才能从花紋的整体認識花紋。在古器物上，花紋有的不易認識，若不先找花紋的單元，更难辨

認，所以有必要先解决單元的問題。花紋單元的構成，虽然随着器物而有异，但却是有規律可循的，茲举例子于下，以示寻求單元的途徑：

在商代銅器里，有以稜分單元的，每一單元就是劳动人民創造花紋的面积。他們是在这一面积里，运用其智慧和經驗来設計的。有以兽头分單元的，如商周簋和卣等器，多以此分單元（插图九）；也有以圓渦紋为間，而分出單元的。汉代的銅鏡，每以乳紋



（下图以稜分單元）

圖九 以兽头分單元的乳簋花紋

摹自武英彝器圖錄

为間隔，来分出一單元，也有与規矩紋合而分單元的。到了唐代的銅鏡，又有以花枝紋或朵云紋为界，而分單元的。汉代的射猎琉璃鍾，用鋪首为界，造成一單元，而設計其射猎的花紋。宋代建筑的彩繪中，有以如意头、劍环和云头来構成一空間，做为—設計的單元。清代的瓷器，有以一空間为一單元的，也就是所說的“开光”。

此外还有以單綫，各种的花紋帶，实物的一面或一部分为單元的，此类的形式很多，只要我們在学习注意，不难看出。最后还必须指出單元有的是独立的，有的是对称的，有的是互相配合的，这在我們寻求單元时，应当予以注意。

#### (2) 花紋的制法与作用

我們在找出單元之后，再进一步的問題，便是認識花紋；要認識花紋，就有必要了解花紋的制法和它所起的作用，这样就会使我們易于認識花紋。

花紋的制法很多，茲略举下列的几种，以示其例：

（一）鑲嵌的方法：鑲嵌是制成花紋的方法之

一，在銅器里，商代有用綠松石嵌成花紋的，战国以来，用錯金良的方法制成生动的飾紋。唐代盛行以螺鈿和金良平脫等技术，造成極其优美的花紋。宋代以后，鑲嵌所用的資料日多，其形式也多，这就使花紋更丰富多彩了。

（二）彩繪的方法：彩繪花紋，是表現花紋的最普遍的方法，陶器、漆器、銅器、瓷器、壁画、建筑以及日用什物等，都用这种方法。远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了彩陶，这是我們所熟知的。战国时期，已出土了彩繪的陶鴨，到了汉代更是盛行。战国漆器的花紋，多是彩繪的，后代的漆器花紋，描繪的技术和所用的顏色，更是日益丰富，敦煌壁画里的一切花紋，都是属于这类。宋代李誠的“营造法式”里，把建筑的彩繪图样，特立專題示例至有兩卷之多。至于唐宋以来的瓷器，其花紋一般地說来，也是属于彩繪的范畴。这类花紋被广泛采用，流行至今，在我們的生活里，几乎每天都可看到。

（三）彫刻的方法：彫刻制成的花紋也很多，其技术也有种种的不同，最常見的是用浮彫或凹彫的技



术。而浮彫主要地有高浮彫和低浮彫两种。我們看到商代銅器上的一些花紋，总的說來是突起的，即高浮彫的范疇；春秋以后的銅器花紋，一般是平面的形式，即低浮彫的范疇。汉代的石刻技术也很多，武梁祠的刻法是一种平面陽刻的技术，而孝堂山的画像石，則是陰綫的刻法，而兩城山的画像石的刻法，則另是浮彫的一种。战国漆器的針刻，又是彫刻里另一种技术，較綫条的刻法更为細致。瓷器中的“貼花”，實質上也是属于浮彫的范疇。古代銅鏡的飾紋也多用浮彫制成。此外还有建筑方面，也用彫刻的花紋，在“营造法式”里，如石作制度图样和木作制度图样，都是以彫刻的技术，以裝飾建筑的証据。瓦当的花紋也是一例。至于我們所用桌椅，也多有用彫刻作为飾紋的，从而可見彫刻技术的广泛使用。

（四）紡織和印染的方法：我国的紡織物中，不論是毛織、絲織或棉織，多用花紋以“养目”。这类技术主要的不外是紡織和印染的两种方法：在紡織方面，其技术又有种种不同，总的說來，最常见的是在紡織时用不同顏色的原料織成花紋，这种在絲織、棉織和毛織上，都已普遍使用。其次用刺繡的技术，綉成各种花紋，此种技术，多用于絲織物中。另一种方法是以印染加工的技术而造成花紋，即我国汉代以后所說的“纈纈”、“纈纈”和“臈纈”等印染方法，在絲織、棉織物上多采用之。这些印染技术，在唐代尤为盛行，此类实物現在还有保存的，現在有些技术仍在西南民間流行。

以上所述只是三种主要的技术，此外如刻絲、戳紗、鋪絨和平金等方法，也在絲織中采用，制成花紋。

这些制法的了解，不只对于我們認識花紋有帮助，而且也是研究花紋必須掌握的一部分知識。

在花紋的制法之外，我們还应掌握它的構成。花紋在一單元里，有的不是由單一的花紋組成，往往是由几种花紋組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就有必要找出重点，分別主次，一般地說來，有主紋与地紋二种。商周銅器中，其主紋有饕餮紋、龙紋、凤紋、鳥紋、夔紋、蟬紋等都是主紋，也就是我們學習的重点；而各种雷紋，經常用作地紋。古鏡中的主紋，是四神、海兽、天馬、仙人、鸞凤等，而云紋每用作地紋。唐代的鏡鑑，有錦地蝴蝶鏡，所謂錦地，即以龟背紋为地，而使主紋——蝴蝶紋——突出；也有以云紋为地，使主紋双鸞、双凤等，不至孤立，而得到調和匀称之感。在絲織物里，如龟背龙紋加金錦，龟背紋是地紋，而龙紋起着主紋的作用。清代瓷器中，有“錦上添花”的花紋，實質上也是主紋与地紋合組而成的一种花紋。从此可見，除了單一的花紋之外，凡是复杂的花紋，其中总是有主紋和地紋之分，地紋为了不至喧宾夺主，它的組成，就取了細致或低淺的形式，以便襯托主紋，使之突出，这是規律。因此，我們在

學習花紋时，首先要分辨主次去抓主紋，否則我們便会迷失方向，这点我們在學習花紋时，必須予以应有的注意。

### （3）怎样开始學習花紋

我們在上面既已論述了有关花紋的各方面，下面再談談怎样开始學習花紋。學習的方法，首先是通过实物的本身來學習，在实物上，找出單元，分別主次，抓着主紋，先求認識花紋，然后結合文献，以求理解实物史料的意义。但花紋因資料不同和制造的条件等，本已有不易辨認的，而古代的花紋還有变体的花紋，更增加了鑑別的困难，这样我們就要求助于照像摹繪和傳拓的技术，往往在实物上，不易看出的部分，可在照像片或拓片上看清，还有我們可利用照像技术，把重要的部分或难于看出的部分放大，便可解决我們學習上的困难。当然在學習中，我們应充分地利用放大鏡，以至显微鏡等現代的工具，幻灯片更是有力的武器。利用这些現代化的工具，不只帮助我們辨認花紋，还可看出花紋的制法，如紡織物的經緯，雕刻的手法，都可借着这些工具求得了解，便可使花紋的學習更深入一步。

当然上述的工具，在今天还不可能都一一具备，但我們的博物館事業，自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視，欣欣向荣，在短短的八年里，較大的博物館，都有了系統的陈列，有的还可提供研究學習的資料，这对花紋的學習說來，是極其有利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們的基本建設，全面开展，而自農業发展綱要发表之后，農業的建設，也是在大跃进中，因此文物出土日益增多，实物史料空前的丰富，有关花紋的資料，也迅速地积累，这对实物的研究和花紋的學習，都提供了前此沒有的条件。因此，我們文物出版事業，也空前地繁荣，图录的書刊，愈来愈多，考古发掘报告，也是与日俱增，这些出版物所刊布的研究成果都是我們學習的最好資料，这是前人所未有的机会。只要我們有决心提高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教學的質量，便能克服困难，學習花紋，以求对实物史料的理解，而把历史科学向前推进一步。同时要注意的，我們學習花紋，不是为花紋而學習花紋，我們的學習，是为了使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教學走向健康的、現代化的大道，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也是必須始終貫徹的。

最后，我們必須指出花紋的研究，在今日还只开始，而系統的專題的研究，更是缺乏<sup>①</sup>。苏联專家曾向我們屢次提出要求，因此这一处女之田，急待我們的努力，使它在我們大跃进的社会里，也早日有奇花怒放吧！

① 孙作云：“我国考古学界的重大發現，信陽楚墓介紹”（見史学月刊，1957年十二月号），其中論及花紋与古代神話以及所引的論文都值得參考。

# 教 学 问 题

## 在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中进行社会主义 政治方向教育的体会

黑龙江綏化一中

李恩錫

“争取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我国人民在整个过渡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它将需要经过十年至十五年之久。”（1957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学历史教学如何为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服务，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目前，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里，我觉得我们在教学中首先应该向学生进行以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为中心的思想教育，也就是灭资本主义、兴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半年来，我在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中，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现把摸索到的点滴体会提出来，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 一 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我个人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教育，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在教学中，充分挖掘和阐发教材本身固有的思想性。

“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是讲述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和衰亡时期历史的教材，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兴无灭资”的思想教育内容。因此充分挖掘和阐发教材本身固有的思想性，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手段。我体会，在许多思想教育因素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及其政治上的虚伪性是最有意义的，这会使学生产生蔑视资本主义的思想，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树立。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虚伪性时，我着重说明了下列诸点：其一，使学生认识资本主义是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是增加了资产阶级的财富，而无产阶级的生活则日益贫困和痛苦，尤其当

经济危机来临时，广大的工人群众就要在死亡线上挣扎。其二，使学生认识资本主义是在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是死亡和破产。其三，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和“自由”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是剥削本国无产阶级的和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自由”，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种政治欺骗。

在揭露教材本身固有的思想性时，我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1）比较法。例如讲二十世纪初德国工人的贫困生活时，为了使更清楚地认识这是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体会教材所讲“在大战前的三十年中，德国的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工人的工资只不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等数字的深刻含义，特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十年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物价和工人工资的变动加以比较。

经 济 发 展 情 况	物 价 上 涨 比 例	工 人 工 资 增 长 比 例
铁 (1885-1910) 370万吨→1480万吨(四倍)	40%	25%
煤 (1871-1910) 2955万吨→10929万吨(三倍多)		
世界经济地位 由第四位提到第二位		

经过比较之后，学生对问题就会一目了然了，自己就可以看穿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

（2）补充一些材料来具体描述。例如在讲英国工业革命给工人所带来的痛苦后果时，为了使了解教材所讲“……工人的生活情况急速地恶化。工厂



主为了加强剥削，用大量的童工和女工来代替成年男工。工人每日的工作总是十四五小时”的具体情况，我引用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的一段描述。馬克思写道，州法官加尔登在諾亨汉市會議厅的會議席上，曾以主席的資格說：“从事花边織造業那一部分城市人口，忍受着世界任何文明地方的人所不知道的痛苦和貧乏。……那里，9岁至10岁的兒童，在天未亮的2点鐘，3点鐘，4点鐘，就从污穢的床上被拉起来，單單为了生存，而劳动到深夜里10点鐘，11点鐘，甚至12点鐘。他們的四肢是折磨坏了，他們的身軀是消瘦的，他們的面容是惨白的，他們的人性是完全僵化了，叫人想到害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7頁）这样的描述，比較具体、生动，給学生的印象也比較深刻，加强了原教材的說服力和感染力，避免了抽象的說教。

（3）朗讀課本里摘录的文学作品和解釋課本中的图画。

教材里，摘录了一些文学作品，刊载了許多图画。这些都是我們开发教材思想性的好材料。例如，在講北美独立战争后通过美国宪法的时候，我叫学生朗讀了課本所摘录的美国詩人菲立浦·法蘭諾的詩：

“当千百万人被剝夺了一切，  
在絕望中淌着眼泪，  
而寄生虫吮吸他們的鮮血的时候，  
我們怎能称政府是公正的呢……”

这几句詩揭露了资产階級民主的實質，通过朗讀，使学生認識资产階級国家从一建立起，劳动人民就处于无权的地位。

又如課本图72“冬季驅逐穷人图”（第159頁）是对十九世紀末俄国工人階級貧困生活的一幅显明写照，在講到这一段时，我除了叫学生仔細观察这幅图外，并根据內容作了一些解釋。我說：“十二月的天气，吹着刺骨的北風，飄着棉絮般的大雪，房主帶着打手来到工人季尔娃的家里。交不上房租的季尔娃无办法地跪在房主人的面前哀告着，小孩被嚇得无处可藏，鑽到老祖母的怀里，身体还在战慄着。房主对这痛苦的一家毫不可憐，威逼着說：‘交不上房租，立即滾开！’打手在往外抛家俱。宇宙是廣闊的，但在这严寒的冬季里，季諾娃的家往何处去呢？”这样，一方面使学生了解到当时俄国人民生活的痛苦情况，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学生对剝削階級的階級仇恨。

（二）联系社会实际，特别是反右斗争实际。

挖掘和开发教材本身固有的思想性，是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教育的第一步，只是使学生从理論上一般地認識了資本主义的實質。要想进一步使他們的这

些認識在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活中所發生的問題时，能起指导作用，就需要我們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識地联系社会实际、目前首先是联系反右斗争的实际，在联系过程中逐步培养这种能力。

这种联系，可以采取在开发教材固有的思想性时，直接批判右派言論的形式。例如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和教訓，提到公社的經驗“証明了只有在真正的革命政党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战胜敌人”时，我就联系批判了右派分子所提“民主党派輪流执政”的謬論，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保証，右派分子提出这一謬論的實質，就是想从根本上搞垮社会主义恢复資本主义。

有时，也可以結合教材、通过揭穿右派分子的兩面派手法来暴露右派言行的實質。例如講到“自从（第一国际）巴塞尔會議徹底粉碎了普魯东主义者以后，在公开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旗帜下反对馬克思主义，是不再可能了。因此，……资产階級代理人只能借革命口号和社会主义口号作掩护进行活动”时，我就联系我国目前的反右斗争，指出右派分子也知道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已經取得巨大的胜利，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是不再可能了；于是他們就在披着抽象地拥护社会主义的外衣下，具体地反对各项社会改革措施，在披着抽象地拥护党的领导的外衣下，具体地反对党对文教、衛生、艺术、体育、司法等各个方面工作的领导。他們的手法是一样的，他們的陰謀被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所揭穿也是一样的。

（三）联系学生思想实际。

使学生从理論上認識問題和結合社会实际来認識现实階級斗争中的問題都是很重要的。但还不够，我們應該帮助学生解决在他們的思想中存在的实际問題，使他們認識哪些思想是倾向于資本主义的，哪些思想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这就是說，在教学中我們有結合学生思想实际进行社会主义方向教育的必要。我校学生的思想問題中，有一般性問題，也有本質一致但表現上有特殊性的問題。目前最突出的是存在“农业合作化冒进”、“粮食不够吃”、“农民生活苦”等錯誤看法和生活上无組織无紀律等自由主义現象。为了解决这些思想問題，我就在教材本身固有的思想內容和学生存在的思想問題，實質上有一致性或有着有机联系的地方，联系学生的具体思想問題，試作了一些分析和批判。

例如，“粮食不够吃”这种說法，實質上是怀疑統購統銷政策的反映，具有这种思想的人的立場还没有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方面。为了解决这种思想問題，我在分析1848年德意志革命的原因，講到由于馬

鈴薯的病害和歉收，供应与需求之間发生矛盾，商人就乘机抬高物价，而造成城市居民的飢餓时，就向学生指出这种少数人发财、多数人沒飯吃的情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必然結果。也指出我国虽然地大人多，丰歉不均，但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因此就不存在这样的問題了。最后我問学生，你們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竞争造成少数人发财多数人沒飯吃好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統購統銷政策，保証人人有飯吃，保証社会主义建設順利进行好呢？經過这一段分析，学生对两种社会制度下的粮食問題就可以有比較正确的理解了。

再如，学生对組織紀律和“自由”的認識是很模糊的，并不懂得这些問題的實質，因而时有无組織无紀律等自由主义的表现。为了帮助他們正确地認識这些問題，我在講十八世紀法国資產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上所說“人类是生而自由的，并且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和“私有财产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权利”时，做了一些联系。我指出資產階級所說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在資產階級革命时期提出时，就是只限于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因为这种“自由”和“平等”是建筑在“私有财产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础上，他們要求的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自由竞争，而劳动人民則被排于享受这种权利之外。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是建筑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我們要求有計劃地发展社会主义經濟，我們的自由是有組織有紀律的自由，享有这种自由权利的是广大劳动人民。我們劳动人民反对那种无組織、无紀律、破坏集体利益的“自由”。

## 二 几点体会

(一) 有計劃有系統地进行准备，是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条件。这种准备工作，我觉得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 在全面地系統地研究教材的思想內容的基础上，按照“統籌兼顧、适当安排”的精神，来有重点地、有系統地进行教育。

所以要有重点地进行教育，是由于一課时教材的思想內容往往是多方面的，有时前后課时教材的思想內容又有某些重复的緣故。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多方面的思想內容中，找出最主要的，教育意义最大的，向学生进行詳細的深入的闡发，对次要的只能簡略地講一講，若前后兩課的思想內容重复，則前后应有所分工。例如講1848年法国和普魯士的革命原因时，都要講馬鈴薯的病害歉收和欧洲的經濟危机，当然這兩者都是必須講的。但在講法国时，就可以着重分析經濟危机給人民帶來的灾难，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而在講德国时，則可以突出分析馬鈴薯商人的投机活动，联系我們的統購統銷政策的优越性。

有系統地进行教育，就是說某些思想教育內容在許多課时許多問題中都要講，最后还需要總結概括，在講課时就需要有計劃地逐步加深学生的認識。例如前面所談資產階級要求“自由”的實質是要求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自由竞争。这一問題在各国資產階級革命史中都有表現，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反对国王的无限勒索和專賣特权，十八世紀法国資產階級反对国内关卡制度，十九世紀德国資產階級要求統一結束割据等等都是这种要求的反映。講完这些問題之后，我們在复習时可以指出它們的共同点，把資產階級自由的實質揭露出来。这时候，学生的認識就会比初接触时的認識深刻得多了。

(2) 在批判右派言論方面，不能只是形式上掌握右派言論，在課堂上进行簡單的批判；而是要掌握右派言論的實質，在課堂上进行有力的回击，指出他們無論怎样花言巧語，真正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3) 要掌握学生的思想情况，分析学生的思想實質。了解学生情况的最好方法是参加他們的辯論会。此外，通过团組織、班主任、学生骨干以及与学生交談，也能了解一些問題。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具体分析問題的性質，找出根源，否則效果不高。例如同样說农民生活苦，有的学生是由于出身富农家庭，現在生活比过去降低了一些，因而这样說；但有的学生是工人子弟，他們是受了道听途說的影响，一时分不清是非，而这样講的。这两种情况就不能用同一道理进行說服教育，因为前者是富农立場沒有轉变，后者則仅仅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

(二) 进行思想教育要有明确的目的，注意教育效果。

(1) 注意学生的年齡特征，从学生的知識水平和理論水平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越講使学生越糊塗。

(2) 培养学生學習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也就是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講課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观察学生的理解情况，适当时机可以提問学生。可以在講清条件的基础上，讓学生自己作出結論。可以先指出所要分析的問題的思考方向，然后再引导学生进行分析。也可以采取給学生布置联系实际的独立作業等方法。

(三) 做好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教育的关键是教师積極参加整風學習。

“教育者必須受教育”這句話，我从整風學習中才有了比較深一些的体会。通过整風學習，許多自己一向不懂的事情懂了，本来糊塗的事情不糊塗了，思想豁亮了，政治方向具体明确了。这就給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提供了許多有利的条件，使我明确了教育的具体方向，掌握了教育的具体內容。目前整風學習还在繼續进行，我們必須積極學習到底，为爭取更多的收获而努力。



## 我校开展“乡土研究小组”活动的情况 和辅导体会

苏州第九初中 陶俊升

我校学生曾经建立了乡土研究的组织，先后开展了多次的活动。我在辅导他们开展这一活动的过程中，感到这种活动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对于向学生进行爱家乡、爱祖国的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好处。现在把我们的活动情况和我的体会简介于下。

(一) 拟定活动计划：为了保证这项活动能够有效地开展，在一开始时，我们先将对这项活动有兴趣的一些学生组织起来（最初是二十余人现在已陆续发展到五十余人），正式成立了“乡土研究小组”。接着就确定了如下几项活动内容：(1) 搜集有关苏州的史料、掌故和轶闻，并举行座谈讨论。(2) 参观、访问和调查苏州名胜古迹，并交换心得。(3) 举办苏州历史故事会和历史讲座。(4) 举行对苏州名胜古迹和人物的写作竞赛。(5) 举办乡土研究活动的写作展览，出版墙报和专刊。

我们规定每周活动一次。活动的日程，在学期开始时就先安排好。例如，研究小组初建立时，是在学期的中途，因此我们决定在那半个学期中只进行两次采访活动，并将研究小组的活动日程作了如下的具体安排：(1) 第十周，第一次采访活动前的讲解报告。(2) 第十一周，第一次采访活动。(3) 第十二周，讨论第一次采访活动的小结。(4) 第十三周，苏州沿革讲座。(5) 第十四周，第二次采访活动前的讲解报告。(6) 第十五周，第二次采访活动。(7) 第十六周，讨论第二次采访活动的小结。(8) 第十七周，整理采访活动的记录材料。(9) 第十八周，总结采访和研究活动。在稍后一学期，也是按照这样顺序安排的。

(二) 具体活动情况：两学期来我们曾按照预定计划先后进行了四次主要的采访活动。第一次采访活动的地点是“环秀山庄”和“唐伯虎故居”（淮提庵）。目的是瞻仰奇特的假山和唐伯虎书画的石刻，加深学生对劳动人民和古代艺术家的崇敬。第二次采访活动地点是“五人墓”和“葛贤墓”。目的是激发学生对于封建统治的仇恨情绪，从而增强他们对新社会的热爱。

爱。第三次采访活动的地点是开元寺的“无梁殿”。目的是使学生认识我国劳动人民的丰富创造力和他们在建筑学上的独特成就，借以巩固学生爱劳动、爱科学、爱祖国的信念。第四次采访活动地点是整修后的玄妙观。目的是用具体的事物感染学生，增进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喜爱，并提高他们对爱护名胜古迹的责任感。在每次活动的出发前，均由辅导老师向学生介绍有关的史实。在采访的当天，又随时结合所见所闻予以说明，事后并分别听取他们汇报心得和申述感想。这种作法收效很大。有些学生在参观五人墓的时候，很详尽地将那里所有的碑记一字不漏地抄写下来，给我们研究周文元等五人的事迹以莫大的帮助。

为了使学生们对苏州历史获得系统的概念，提高他们的研究兴趣，首先邀请对苏州历史较为熟悉的教师作了一次苏州沿革的报告。后来，又为了配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加强学生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理解，又请江苏博物馆征集组负责人来校作“太平天国在苏州的史实”的讲演。两次专题讲座，听讲的学生都极为踴躍，除参加“乡土研究小组”的学生以外，另有许多学生临时参加。有许多学生自动作摘记，事后特请辅导老师予以校正。特别是“太平天国在苏州的史实”这一讲演，由于讲演人讲解生动，适合于初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并由于忠王李秀成的英雄故事深入民间，学生们比较熟悉，因此，无论在听讲时和听讲后，学生们的革命感情均因而很自然地流露出来。这对于增进他们对革命英雄人物的热爱，以及培养他们的革命意志，都具有一定的推动和鼓舞作用。

在举办“太平天国在苏州的史实”讲座后的一个星期，我们为了巩固这次讲座的教育成果和满足学生们的迫切要求，曾领导学生前往当年太平天国在东南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司令部——忠王府遗址进行参观。在参观的时候由辅导老师再结合讲座中所介绍的一些材料，对主要遗迹，逐一地进行讲解。学生们对于据说曾经作过忠王卧室的“见山楼”和忠王召开过军事会议的大殿，感到无限留恋，一再瞻仰徘徊，不

忍离去。这种情况说明凡是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人，将永远为人民所爱戴，他的英雄事迹也将永垂不朽。

当江苏省博物馆举办“江苏文物展览会”（馆址在苏州）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乡土研究小组”从事研究活动的大好机会，曾利用了两次课外活动的時間，前往参观。我们在事先作好了摘记和描繪文物的准备工作，参观时，就由辅导老师分别指导学生抄录和描繪了不少与历史教材有关的珍贵资料，事后并进行整理彙編，作为学生们研究和學習历史时的参考。以上这两次校外参观，都是在预定计划之外临时决定的。

此外，我们也按照预定计划开展了不少次的校内活动。内容有座談討論，写作竞赛，出版牆报和專刊等。这些活动大多是在十六周以后，接近学期总复习以前举行。关于写作竞赛的命题和体裁，由学生们自己选择决定，但必须以活动的收获作为中心。学生们写出来的文章是多种多样的，有报道、杂記、感想、心得和議論等各种形式。由于学生们的兴趣濃厚，领会深刻，其中有許多文章是可供其他同学观摩和参考的。所以每当学期終了前，辅导老师总要将审阅后的文章挑选一部分，送交全校性的課外活动成績展览会去展出，并刊行在乡土研究活动專号的牆报上。在經由校行政評定后分別給予榮譽獎或物質獎。

（三）开展活动的收获：通过多次的活动，在学生的思想方面和知識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由于直接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受到了较具体较深刻的劳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有的学生在自己的文章中說：“在祖国的历史上，千百万劳动人民在劳动中为我们创造了无穷的财富。不論在城市建設的設計上，或建筑艺术上，都显示出中华民族的独特風格。劳动人民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和高度的智慧所创造出来的功績，是不朽的，是值得我們青年一代學習的。”有的学生在“瞻拜五人墓感想”的文章中写道：“我們青年一代，应该以这些英雄人物作榜样，鍛煉自己成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反抗侵略的坚强战士。”有的学生在参观“无梁殿”的时候，看到“无梁殿”的破損景象，很擔憂它会毀廢。当他听到負責保管这一古建筑的同志說政府即将撥款兴修时，兴奋异常，后来在一次小組討論会上，他激动地說：“今天的社会确实和以前不同了，党和政府在千头万緒的国家事务中，能不放松人民心願中每一件細小的事情。仅以这几年对苏州名胜古迹的兴修來說，已够使我感动的了。現在正当我們憂心象征苏州文化的古老建筑‘无梁殿’行將毀坏的时候，听到这样可喜的消息，怎能不使我們感到党的偉大和可亲呢？”又如，有一次同学们曾以环绕玄妙觀今昔情况为中心举行写作竞赛。从参加这次竞

赛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热爱。他们用今昔对比的笔法，刻画出他们对解放前后两种社会的不同心情。詛咒旧社会的黑暗，歌頌新事物的出現，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成就而欢呼，为自己荣幸地生活在人民中国而自豪。其中有一位同学在他所写的文章結語中說：“今天的玄妙觀，給予人們的印象，是一种难以描繪的美丽和庄严。生長在苏州的我，一方面为玄妙觀的新生而驕傲，同时也为我的故乡祝福，因为它的生命伴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发展而越来越年青。”还有許多同学都認為通过多次的各种形式的活动以后，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增長了不少的新知識。并且通过采訪和研究活动，許多优良的品質也在成長，無論探討一个所見所聞的历史事物，或抄記古代建筑的特点和碑刻字句，以及描繪文物的形式和結構，他們都認真細致，以至忘却疲劳。此外，对历史科學的學習兴趣也日益增強。

（四）我对輔導工作的体会：第一，經過多次活动，我認為可以肯定“乡土研究小组”是一种为青年学生们所喜爱的課外活动形式。因为它的内容丰富多采，在情感上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应该把这种活动当作在課外对学生进行教育教養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第二，这项活动的順利进行，是与校行政的大力支持和教师同志的热誠帮助分不开的，他們为活动提供了許多便利条件，并經常給予很大的鼓舞，今后应该繼續主动爭取帮助。第三，关于活动的本身，我体会按照現有条件結合学科特点，拟訂切实可行的具体活动計劃，并坚持执行，是保証活动能够經常順利进行的基本条件。而辅导老师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起很大作用，必須爭取主动，不可有絲毫松懈情緒。对工作中优缺点需要及时檢查总结。学生的正确意見要予以尊重，并不断地改进領導方式和方法。在活动的內容和形式方面，应力求多样化，避免單調呆板。第四，在組織学生活动方面，必須慎重選擇小組各部門的領導骨干，要經常啓发他們的積極性，培养他們的独立工作能力，使他們在集体活动中發揮骨干作用。

根据前一阶段的小組活动的經驗总结，我們認為这些活动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但由于經驗不足，还有許多地方需要加强和改进。我們感到还应该多吸收一些有繪画能力的学生，以便在采訪时專門負責对名胜古迹和文物的描繪工作。此外，在活动內容方面，我們觉得还应注意以下兩点：（1）发动学生按照府志所載的古迹古墓进行訪查，加强抄录古碑文的工作，为考古工作人員提供綫索。（2）协助政府开展保护历史文物的宣傳活动，并发动学生在可能条件下参加协助修建名胜古迹的义务劳动。





問：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样結束的？康边停战協定的內容如何？

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奧、土、保的潰敗而告結束。其失敗主要原因是：（一）英法美三國的經濟資源與人力

遠比德奧充足，可以經常動用新的後備力量，在軍事上逐漸占優勢。（二）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影響和鼓舞下，德奧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高漲，奧匈帝國內部民族解放運動也澎湃地發展起來，而前綫的德奧士兵，看到蘇俄人民擺脫戰爭的實例，也渴望和平，許多部隊喪失了作戰能力。

八月八日，協約國聯軍在西綫大舉反攻，一舉消滅德軍十六個師團，從此，德軍節節敗退，九月二十九日，保加利亞被迫投降。這時，德軍最高統帥部認為已無法抵禦聯軍的進攻。為了挽救德帝國主義，不使德軍復滅，保全德國軍事生產機構，防止國內革命，必須迅速結束戰爭。在九月二十九日于斯巴德軍大本營舉行的所謂御前會議上，堅決要求改組政府，使它具有民主的外表，和立即向協約國請求締結停戰協定。十月三日，號稱自由主義者的巴登親王曼克斯被任命為內閣總理，組成對議會負責的新政府。四日深夜，正式向美總統威爾遜發出請求停戰的照會，接着，奧國和土耳其也送出了同樣的照會。

但是，威爾遜企圖拖長戰爭，以便美國壟斷資本多有賺錢的時間，一直拖到十月二十三日才答復德國，要求全面投降，并暗示廢黜德皇和太子為停戰的先決條件。英法政府不滿威爾遜獨攬與德國談判停戰事，不願讓美國在處理戰後國際關係上充當舉足輕重的角色，由于它們的要求，協約國最高作戰會議从十月二十四日起在凡爾賽開會，圍繞着與德國停戰議和的問題，帝國主義者間展開了激烈的外交鬥爭。

德國接到威爾遜的復文後，希望避免無條件投降，力圖掙扎，但又遭受到新的挫折，它的盟國土耳其已被潰滅，于十月三十一日向英國投降。奧匈帝國亦土崩瓦解，捷克及南斯拉夫人宣布獨立，奧地利和匈牙利本土均發生革命，十一月三日，奧匈政府向意大利投降。只剩下德國單獨作戰。這時，德國的革命也爆發了。十一月四日，基爾的海軍士兵發動起義，岸上的革命工人參加，占領了城市，組成工兵代表蘇維埃，起義的浪潮迅速地擴展到德國其他城市。在這種形勢下，德國政府才決定接受協約國提出的任何條件，停止戰爭，以便對付革命運動。協約國首腦在凡爾賽會議中也趕忙決定與德國進行談判，十一月五日

由美國國務卿藍辛通知德國，并說明停戰的具體條件另由聯軍總司令福煦元帥轉告德國。

德國政府代表團于十一月八日到达福煦元帥司令部列車所在地康邊森林，福煦命令部下宣讀了德國投降的停戰條件，并限于七十二小時內答復。十一月十一日簽署停戰協定，這就是通稱的康邊停戰協定。

康邊停戰協定共有三十五款。其重要內容如下：

西綫：（一）協定簽訂後六小時，停止陸地及空中的戰鬥。（二）德軍立即開始自比利時、法國、亞爾薩斯——洛林、盧森堡撤退，限于十四天內撤退完畢。德國在上述地區儲存的軍火與軍用物資須全部完整地移交與協約國。（三）德國交付協約國五千門重炮和野戰炮、二萬五千挺機關槍、三千門小炮、兩千架飛機。（四）德軍須在三十一天內，自萊茵河左岸以及科倫、美因斯、科布林士三城市周圍三十公里的萊茵河右岸之地退出，由聯軍占領，占領軍費用歸德國政府負擔。（五）萊茵河右岸十公里以內之地，自德荷邊境起，到德國與瑞士的邊境為止，劃為中立區域。（六）德國不得損壞任何鐵道、公路、水道及郵電設備，在十四天內交出五千輛機車、十五萬輛車廂、五千輛卡車。（七）所有被俘的聯軍官兵應立即釋放，聯軍管押的被俘德軍人員俟議和時再定釋放辦法。

東綫：（一）德軍立即自戰前屬於奧匈帝國、羅馬尼亞、土耳其的領土內撤退，至于駐在戰前俄屬領土內的德軍，一俟協約國考慮到這些地區的內部情勢認為已屆撤退的時機時，則應立即撤退。（二）德國取消布列斯特條約及布加勒斯特條約。

東非：所有在東非的德軍應于一個月內無條件地撤退。

一般性的條款：協約國除保留在將來提出要求的權利外，茲在原則上規定：德國造成的損害必須賠償。

海軍：（一）海上戰鬥立即停止。（二）德國交與協約國六艘戰鬥巡洋艦、十艘戰鬥艦、八艘輕巡洋艦、五十艘最新式驅逐艦和全部能航行的潛水艇。其餘艦艇應解除武裝，集中停泊在德國的海軍基地，交由聯軍監管。（三）對德國的海岸封鎖繼續執行，在停戰期間，協約國將考慮供應德國以必需的糧食。（四）協約國有權繼續捕拿公海上的德國商船的權利，德國以前捕獲協約國各國的商船須立即交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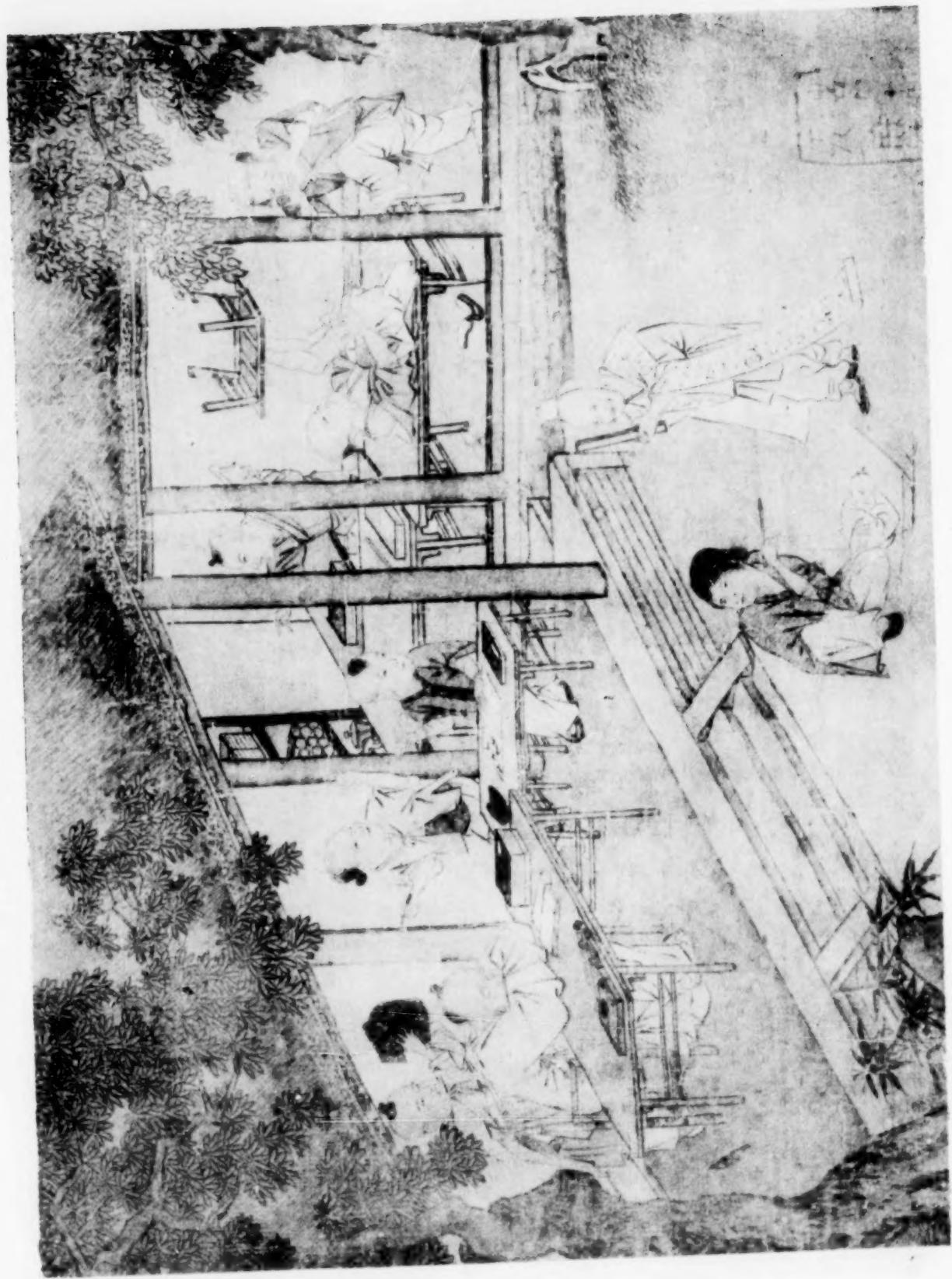
有效期限：停戰協定的有效期限為三十六天，期滿得再延長。

依照這個協定的規定，到1918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完全結束了。

（劉心昱）

## 中國歷史參考圖片(四十)

宋代的繪畫喜歡描寫人民生活，不再為宗教服務，發揮了古代的現實主義精神。



圖一 村童圖學圖

描寫鄉村小學里教師午膳時，一群學生嬉戲的情況，畫出了兒童的天真活潑可愛。



## 中國歷史參考圖片 (四十)



圖二 灸艾圖

十二世紀初期李唐畫。描寫一個鄉村間的醫師正在進行針灸療法，他的助手站在背後調膏藥。采自“故宮周刊”。

6

80